

铁流后卫

谢良



04907

2207.5
253-1

铁流后卫

谢 良

03
106-1



解放军文艺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记述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篇故事。

作者亲自据自己亲身经历地生活片断，从某些侧面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破坏革命的罪行；歌颂了毛主席中央革命根据地丰功伟绩；歌颂了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中央领导地位之后推行大长征。书中生动地描绘了我军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的革命英雄气概。

作品故事生动，战斗生活气息较浓。

封面设计、插图：董辰生

铁流后卫

谢 良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海军 4225 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 X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6 • 字数 108,000

1977 年 12 月第 1 版• 197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137 • 7711 每册 0 . 41

目次

一告别家乡	1
二突围西进	18
三黄平整编	36
四遵义光芒	51
五北渡金沙	73
六三过雪山	89
七草地折回	107
八高原风寒	133
九胜利北上	151
后记	179

一 告别家乡

一九三四年深秋的一天。

乌云笼罩着群山，雾霭遮掩着田野。从瑞金到兴国的路上，秋风瑟瑟，黄叶纷飞。我背着背包，大步流星地向前赶路。

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我刚从红军大学三期政治科毕业，分到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去工作。一路上，我怀着早日参加战斗、坚决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急切心情，走啊，走啊，从瑞金出发，经过雾都，整整步行三天，终于踏上了兴国县的土地。

提起兴国县，根据地的军民谁都知道，它是咱们毛主席表扬过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有名的模范县。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兴国县各方面的工作，不论是生产、支前，还是扩军都非常出色。全县二十八万人，有八万多参加了红军，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几乎没有一个留在家里。今年夏天，兴国县还单独成立一个师，称为“兴国师”。

兴国县是我的故乡。这里的一山一水，都留下过我的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我感到格外亲切我无限深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回想起许多往事。

早在一九二八年，我还是个十四岁的毛孩子，兴国县就闹起了革命。村里的叔伯、兄弟们纷纷参加了秘密农民协会，白天下地干活，夜晚聚集一起，商量如何扩大农协，如何同地主作斗争。第二年春天，乡亲们日夜盼望的救星——毛委员率领红军来到兴国。毛委员住在县城的潞江书院，在那里召开会议，接见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兴国

成立革命政府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毛委员亲自出席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从此，兴国的乡亲们扬眉吐气了，组织赤卫队、妇女会、儿童团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到处红旗飘扬，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我们大家来暴动，
消灭恶地生；
农村大革命，
打土豪，除劣绅，
一小不留情！
建立苏维埃，
工农来专政，
实行新制度，
人民大翻身，
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最后必成功。

革命活动搞得多么红火啊！最难忘的是，一九三〇年七月，毛委员和朱军长又一次率领红军来到兴国。七月十一日，在城北的一个大!场上召开了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万人大会。那天，周围几十里的群众都赶来了。会场上红旗如林，歌声似潮，气氛非常热烈。毛委员和朱军长登上了主席台。毛委员头戴红星帽，身穿灰军装，扎着腰带，打着绑腿，那么英俊，那么威武，又那么和蔼可亲。他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示我们要发展工农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他说：乡亲们，为什么你们过去种田没有饭吃，织布没有衣穿？那是因为都叫地主豪绅剥削去了。我们穷苦人要翻身，就要拿起枪杆子，成立赤卫队，扩大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巩固红色政权。正是在毛委员的伟大号召下，兴国人民热烈欢送大批子弟当红军。十月初，我们村有一百二十多名青年组成一个连，集体参军；我也就在那个时候，离开家乡，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

可是今天，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幅情景：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和闷雷似的炮声；大路上一群群男女，扶老携幼，挑着行李、粮食，急匆匆地

迎面而过。我见一个老婆婆艰难地走着，便上前问道：“你们往哪里去？”她打量了一下我，说：“同志，白军要来了，往山里跑反哩。”

“跑反？”形势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啊！虽然在瑞金的时候，我听说中央根据地只剩下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很少几个县了；但是，我没料到敌人已经逼近兴国县城，这儿的乡亲们也在跑反。

我加快脚步，来到县城，只见昔日热闹的大街，到处都有碎砖烂瓦，断垣残壁。人们正在忙碌着，有的转运伤员，有的输送粮食，有的收拾东西很多店铺都关了门；而西大街的兴国中学，烧焦的梁柱正冒着青烟，很多人在那里抢救。一打听，原来一小时以前，三架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找不到军事目标，就在学校上空盘旋扫射，投下两颗炸弹后飞走了。

见到家乡遭难的情景，我胸中燃起怒火，真恨不得马上参加战斗，去消灭这班强盗，为父老乡亲们报仇。我穿过县城向东北方向的塘石村走去。路上遇到百十多人，扛着担架，拿着梭标、土枪，急促地前进着。那个带队的人穿一身蓝布制服，扎着腰带，打着袈腿，挎一支驳壳枪，姿态英武。走近一看，原来他是我的一个堂哥，叫谢毓清。一九三〇年我们两人曾在一个班当战士，他是连里有名的特等射手。在一次战斗中他左眼负伤，退伍回家后，在塘石乡当乡政府主席。真想不到我们在这儿又遇上了。我问他上哪儿去，他指着从身旁走过去的民工队伍，自豪地说：

“上前线！配合主力，消灭白军！”

我笑着说：“嘿！你这个老兵又重上战场啦！”

他关切地问：“当前的形势怎样？咱们什么时候能够打破敌人的“围剿？”

我怎么回答他呢？形势是严重的，仗打了一年，敌人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战火已经烧到了家门口，这样下去，能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都是问题。但是我愿让他增加思想负担，所以只好说：“前面的仗打得很艰苦。我们要上，要坚决战斗，保卫家乡，争取胜利！”

“好！”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用力地摇晃着，“我们共同战斗，保卫

家乡!”

这时，民工队伍已经走远，我们顾不得多谈，他说了声“胜利后再见”，就撵队伍去了。

我继续疾步前进，没走多久，就要到兴国东北十里的塘石村了。老远，我就看见那棵高大的老枫树，树叶红得象一团火；枫树下有两间旧瓦房，那是我的家。走进村子，村里静悄悄的，没有遇到一个人。原来，村里的人有的上前方考了，有的挑着粮食到山里去了，剩下一些老人、小孩，也大都在家掩埋东西，坚壁清野。我走到家门口，一眼看见母亲正弯着腰在拾掇东西，便叫了一声：“妈！”她直起身来，仔细地端详了一阵，认出是我，急忙走上前来，高兴地叫着我的小名说：

“石泉！你回来啦，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呢？”

父亲和三弟毓丰也都闻声出来了。他们把我接到家里，问我这次从哪儿来，怎么有空回家的，能在家住上几天。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从红军大学毕业，组织上分配到五军团工作，这次是顺路回家看看，一会儿就要走。三弟插嘴说：“你要到五军团工作？要是早几天回来就好了，军团部就在我们村里，我们儿童团天天给他们站岗、放靖。军团长我也认得，他姓董，叫董振堂，对我们可好哩！”

父亲一边抽着山烟，一边问：“仗到底打得怎样？为什么火线越来越近？”他老人家已经六十多岁，头发花白，额上增添了很深的皱纹，比四年前我在家时显得苍老。

我回答说：“从咱们的报上看，虽然前方消灭了不少敌人，也打了一些胜仗，但这次敌人用的是堡垒政策，一步一步往根据地推进，我们红军却放弃了过去毛主席的打法，打的不是运动战，而是什么‘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如今打了一年，越打越困难，越打越被动。眼看根据地一天天缩小，大家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哩！”

“那你们为啥不照毛主席的办法打呢？”父亲不解地问。

“是呀，我们也想不通，可有人硬说，那是什么游击主义现在是国家

对国家，应该打阵地战，正规战。”

“怪不得情况不好罗！”他吸了一口烟，“咳！眼看白军要把我们根据地都占了，老百姓心里难受啊！”

我见父亲着急，便说：“爹，你放心！蒋该死*可能会猖狂一时，根据地人民也难免遭受些痛苦，但是敌人想彻底征服我们，消灭我们，它永远也办不到。”

父亲点点头：“这个，我完全信，不过乡亲们都盼望你们能早日把白军赶走啊！”

母亲从房后地里挖出一块腊肉，一只腊鸡，做好两个荤菜，端了过来。吃饭时，远处的炮声、枪声，紧一阵，松一阵，似乎在催促我赶快动身。我吃完饭，起身要走，母亲又拿出两双草鞋，塞在我的背包上。他们把我送出家门，母亲难过得哭了，父亲说：“你去吧！等打完了仗，再请假回家来看看。”毓丰也天真地说：“哥哥！多捉几个白军回来啊！”

我走出村子，跨上大路，回头一看，见他们三人仍站在那棵火红的老枫树下，远远地望着我；三弟毓丰还不断地向我挥手

*指蒋介石。

二

军团部设在城北五里亭一座小山上的庙宇里。这里离前线不远，枪炮声听得更真切了。一些参谋人员低声地交谈，轻声地走路，秩序井然地工作着。

一位参谋拿着我的介绍信进到里屋。不一会，军团长董振党、政委李卓然同志从里屋走了出来。军团长身躯高大而魁梧，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衣，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有三十多岁。政委的身材较胖，白白的脸上有些连鬓胡子。他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你来得正好，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工作。”

我们面对面地坐下。军团长先问了我一些在红大学习的情况，接着就简要地向我介绍说：“我们面前的敌人是国民党的五师、十三师、二十八师、九十六师、九十八师和九十九师。敌人这六个师，从泰和打到兴国，两百多里，攻打两个月了。仗打得很激烈，也打得很艰苦。”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些不悦，停了一会才继续说，“我们的伤亡大，消耗大，基本上没打缴获，也没有补充。部队一年多没有下火线，在战壕里吃，在战壕里睡，节节后退，一直得不到休整的机会。”后来，军团长是故意回避对整个第五次反“围剿”形势的分析，设后，只是嘱咐我说：“目前，大家都憋了一肚子气，有急躁情绪，因此要注意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政委问我入学前在哪个部队工作，是哪儿人当知道我的家就在兴国塘石村时，他高兴地说我们在那儿住过，村里的群众对咱们部队非常热情，你这次真是在家门口打仗了。”

第二天天不亮，我由一个通信员陪同，到三十七团去。第二次路过家门口时，敌机在村子上空狂叫着钻来钻去，全村老幼都蹲在防空洞里；三十七团正在塘石村东面五六里的山上同敌人激烈战斗着。我们出村向东走，离前线越来越远。一路上，支前的乡亲们，男男女女，有的抬担架，有的运弹药，有的送饭送水尽管枪弹在头顶上呼啸，敌机不停地扫射、投弹，但他们沉着、镇静，一个个都象久经考验的老战士，毫无惧色，紧张而有秩序地执行着自己的任务。

“石泉！石泉！”有人大声喊道。我扭头一看，原来是谢毓清。他从担架队伍中走过来，满头是汗，一身泥巴，手里提着一支驳壳枪，边走边说：“上前边去吗？前面打得可激烈啦！”

“你们辛苦啦！”我说。

“只要打败那班狗强盗，辛苦一点又算啥？”他一边擦汗，一边说。

“彩号多不多？”我问。

“不少。全都是好样的抬都抬不下来，一个个都打红了眼，说要回阵地和敌人拼！”他说完，又赶忙照顾担架上的伤员去了。

我和通信员顺着山路朝前走。从山后翻到山顶时，一股硝烟味扑簌而来，眼下便是二营的阵地。只见二营长饶子健同志头部负伤，缠着绷带，仍在指挥战斗。我们顺着战场往前走，来到前沿最突出的一琴阵地。见到一营长彭少青同志时，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新的攻击，我便伏在彭营长的身旁，用驳壳枪瞄准冲上来的敌人，一枪一枪地射击起来。

打退敌人的冲锋以后，我在山头上的一个简易工事里，找到团指挥所。团长刘佩都同志是个高个子，瘦长脸，一看就知道是北方人。他见到我，热情地说：“好伙计，你来得太好了！他奶奶的，敌人上有飞机，下有大炮，猖狂得很，想一口吞掉我们哩！”

“胃口倒不小，可它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笑道。

接着，他简要地向我介绍了全团的阵地配置，以及对面敌人的主要情况。我接过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见远处有一片树林，树林后面是敌人的碉堡群，还有几辆卡车正往这边运送物资，看来敌人还打算构筑新的碉堡。

“他奶奶的，敌人走到哪里就把乌龟壳背到哪里。”刘佩都同志说这里，突然眼睛一亮，自豪地说，“不过，这什么！在一个月前的竹篙山战斗中，我们的二营顶住敌人两个师，打了一个星期，敌人没敢离开它的乌龟壳一步！”

的确，三十七团是一个能攻善守的部队。用当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的话说，打起仗来能够“上得去”，也能够“站得住”。哪怕是放一个班在那里”只要有人在，阵地保证丢不了。在上次反“围剿”战斗中，他们打了不少漂亮仗，得到上级的赞扬和友邻部队的好评。然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部队连续作战一年多，节节抗击敌人，一直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虽然在防御中不断给敌人以重大的杀伤，但本身的伤亡也很大，减员很多，各级干部都不齐全，战斗力有很大削弱。当前，部队是多么需要有一个好好休整的机会啊！

我们在这山上打了整整一天，击退敌人六七次进攻，阵地巍然不动。

下午，突然接到师首长的命令：天黑以后，部队撤出阵地，到兴国城南十五里的洪门村待命。

夜幕刚刚降临，敌人就缩进乌龟壳里去了。前沿阵地上，死一般地沉寂。我坐在山头的一块大石头上，凝视着黑沉沉的夜空，禁不住心潮起伏，思绪翻滚。我想起过去几次！反“围剿”，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红军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积极主动地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打得多么痛快！一九三〇年年底第一次反“围剿”，我跟随部队在兴国一带执行牵制任务，当龙岗前线传来全歼敌军九千余人，活捉敌人师长张辉瓒的胜利消息时，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九三一年四月，第二次反“围剿”时，毛主席指挥我们打运动战，十五天中，走七百里，连打五仗，仗仗取胜，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把敌人打了个稀巴烂。同年七月，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坐镇南昌，亲自督战，三十万敌人气势汹汹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毛主席镇定自如，从容不迫，指挥红军穿插于敌军之间，避开主力，击其虚弱，弄得敌人疲于奔命，到处被动挨打。三个月内，消灭敌军三万余人，攀获枪支两万余支，不仅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而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也同样取得了胜利。可是自从去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敌人采取了堡垒政策，大筑乌龟壳，而我们有的人却一味地强调和蒋介石是什么两国、两党、两军的决战，要“全线出击”，要“不丧失寸土”，要“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遭受挫折。如今，又分兵把守，到处防御，和敌人以堡垒对堡垒，搞什么“短促突击”，今天退三里，明天退五里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是啊，这一次，毛主席为什么不来指挥呢？为什么偏要同蒋介石硬拼呢？为什么要采取“以阵地战对阵地战”的打法呢？如今不逃越打越被动吗？！到什么时候才能粉碎敌人的围攻？

这时，刘佩都同志布置完撤退计划走过来，打断了我的沉思。他见我一个人坐在这里凝神远眺，似乎猜到我的心思，坐下说：“他奶奶的，这仗打得真窝火，我们又要往后退了。眼看着乡亲们要受白军的糟塌，心里真

不是滋味啊！”

“是啊！不过，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我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坐在山头上谈了很久，他给我介绍战况，又谈对当前作战的一贯看法。直到出发的时间到了，我们才带着部队向山下走去。

三

到洪门村，已是后半夜。

乡亲们正准备转移，看到自己的队伍来了，忙问：“同志们，你们是路过，还是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战士们大声地回答说，“我们不走了！”

“那就好了，我们也不用走啦！”乡亲们高兴得叫嚷起来。

“快回去吧！快回去给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那些扛红缨枪的赤卫队员，很快向村子四周派出了岗哨，有的抢着帮战士们背背包，余东西。不一会儿，洪门村到处灯光闪烁，笑语喧哗，又热闹起来

第二天上午，战士们刚吃过早饭，村里的青妇队员们三五成群，到班里抢战士们的脏衣服洗。有经验的老战士早把脏衣服藏起来了。她们不甘心，就自己动手翻起来。不一会儿，洪门乡的工农政府主席领舒长长的队伍，打着红旗，锣鼓，抬大肥猪、大白菜、花生和几百双草鞋，兴高采烈地向团部走来。

刘佩都同志迎上前去，握住乡政府主席的手，笑着说：“村里今天办喜事吗？谁家娶新媳妇呀？”

“是啊，”乡政府主席笑道，“我们全村都在办喜事，新媳妇嘛，就是你们三十七团！”一句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突然上级又指示我们，要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并给我们调整了干部，补充了新兵，每个战士补足了二十排子弹和四颗手榴弹，每挺轻

机枪补足了一千发子弹，重机枪是两千发。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天气并不冷，却把棉衣和夹裤也发给了大家。

“老谢，这次早早地发下全副冬装和这么多弹药，究竟是怎么回事？”刘佩都同志悄悄地问我。

团长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如今根据地缩小了，部队显然要到白区去打仗。但以往到白区打仗时，总是动员部队轻装，尽量少带东西，因为在白区打了胜仗后，要往根据地带粮食、布匹、药品、食盐可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部队象要大搬家似的。难道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今后还回不回来呢？当时我思想上也有这些疑问，只好含糊地说：“看来，仗是有打的，但要准备多跑路。”

果然，那天下午，上级通知营以上干部到军团部去开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当时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他身躯高大，四方脸膛，带副眼镜，操着很重的四川口音说：“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叫打仗，叫‘滚仗。本来么，‘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是用兵的常理，可劫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象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刘伯承同志的这一生动比喻，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眼！戎争的形势，会场里顿时活跃起来，许多同志连连点头，小声交谈着。

刘伯承同志继续说：“任何军事家都懂得，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和蒋介石打仗，是弱军对强军的作战。蒋介石几乎控制了全国地盘，有几亿人、几百万军队；而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只有三百万人口，十几万红军。可是有的人就是不承认这个现实情况，不顾条件地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和人家打正规化的阵地战，这样，实际上是把主动权送给敌人，使自己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一年来的战争实际证明，我们红军的！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听到这里，我和刘佩都同志相互递了一个眼色，感到总参谋长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是呀，同样的部队，同样的武器，为什么过去几次反“围

剿”总是打胜仗，今天反“围剿”却打败仗呢？就是战略战术有问题呀！

“现在，我们要到外线去作战，要想办法调动敌人”邓也承同志突然收住话头，没有再说下去。会场里一阵掌声过后，开始了热烈的议论：要真能这样就好了，多么盼望能有这一天啊！最后，刘伯承同志说部队打这么长时间的仗，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要抓紧时间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从军团部开会回来，我们把首长讲话的精神向部队作了传达。干部战士听说要打到敌人的后方去，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报仇雪恨，用积极行动保卫红色根据地。

晚上，谢毓清同志突然找到团部来了。没日没夜的劳累，使他眼眶下陷，眼睛熬得通红。他看了看我，神情严肃地问：“石泉，队伍就要转移吗？”

“你怎么知道？”我反问了一句。

“这点还看不出来？县委也作了布置，要我们在队伍走后，上山打游击，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他沉默一会，又问，“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说不上，也许几个月，也许时间会更长，上级没有讲，但从眼前的情况看，这次行动和往常不大一样。”

“你们放心去吧！不管你们走多远，走多久，我们一定坚持斗争，就是牺牲生命，也不能让革命的红旗倒下！”他睁大眼睛，非常激动地说。

这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后，我再也没见到谢毓清同志。过了十多年，全国解放后我才知道：就在我们离开根据地后没多久，他带着赤卫队上山打游击，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被俘。敌人对他进行严刑拷打，打得浑身是伤，要他说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哪里。他怒目而视，始终不说一句话。敌人拿他游街示众，乡亲们见他衣衫褴褛，满脸是血，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蹒跚而行，很多人都哭了。他却昂首挺胸，大声说道：“乡亲们，别难过，要坚持斗争，红军一定会回来的，革命的红旗决不会倒下！”就这样，他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英勇就义了。

没过几天。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傍晚，也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嘹亮的军号声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弦，部队集合就要出发了。洪门村的男女老幼拥在大路两旁，打着灯笼、火把，欢送自己的队伍。青年们抢着替战士背东西，坚持要送一程；那些老婆婆拉着战士们的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嘱咐说：“你们消灭了白军，要赶快回来啊！”“你们一定要再来看我们啊！”战士们也都安慰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吧！”儿童团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村口路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儿童团欢送红军歌》：

鼓声咚咚，红旗飘扬，
战士们好英勇！
我们在此立正敬礼唱歌来欢送，
祝你们前方去消灭敌人大显威风。
瞄准了放，放放放！
勇敢地冲，冲冲冲！
向前去杀，杀杀杀！
革命胜利乐融融。

多少叮咛语，一片别禽情。许多同志的眼圈红了，声音哽咽了，和乡亲们紧紧地握手，久久地道别。有的把老乡的孩子抱起来，亲了又亲，孩子天真地笑着；有的接过老乡送来的茶水，一饮而尽，觉得味道格外甘美，可是心里的滋味，谁都知道，不一般哪！今天，革命根据地的一切，大家都觉得更加可亲、更加可爱。因为，根据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开创的，这里的每一块土地，都浸染过革命烈士的鲜血；这里的父老兄弟姐妹，都是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与亲人。眼看就要离开这里，真是难舍难分啊！队伍离开村庄已经很远很远，但晕，大家还频频回头张望，见洪门村的村头上，仍然灯光闪烁，人影走动，似乎儿童团清脆、嘹亮的歌声还在耳边萦回

我心里说：“再见吧，故乡！再见吧，乡亲们！根据地人民的子弟兵不

论走到哪里，总有一天要回来的，一定要回来的！”

然而没有想到，这次出发，前面等待着我们的征途竟有两万五千里。我们团参加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就从这时开始了。

二 突围西进

—

每天，白天宿营，夜晚行军，遇到敌人就打仗，没有敌人就赶路，这样的生活有一个多月了。

时节已是初冬。一连数日，天阴沉沉的，铅灰色的天空时而落下一些雨点，西北风一吹，很有几分寒意。山峦和田野上的枝叶已经枯黄，唯有山坡上的松柏还保持着翠绿的颜色，象一排排战士那样，挺拔而威武，显得很有精神。

自从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五军团一直是全军的后卫，担负着掩护任务。这时，红军的队伍经过赣南、粤北、湘南，已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是，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实行战略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部队不仅携带了大批笨重的辎重，还要掩护庞大的后方机关，象大搬家似的向西突围。因此，行动十分攀慢，一路上损失很大。我们在后面被敌人紧紧咬住屁股，七分昼夜地行军、打仗，吃不好，睡不好，也补充不上，更是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十一月下旬，红军进入了!西省。一天上午，我们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拗，又和追敌湖南军阀李云杰的二十三师打了起来。我们匆忙占领大路两边的山头，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顽强地守了两天一夜。第三天中午，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袁子钦同志突然来到阵地，带来了军团首长的命令:三十七团已完成阻击尾随敌人的任务，立即撤出战斗，于十二月一日拂晓前在界首渡过湘江。

这时刘佩都同志已经调走，新来的团长是王彦秉同志。我们急忙打开地图看了行军路线，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从这里到湘江，整整一百六十华里，而时间，只有十八个小时。部队从早晨和敌人打到现在，还没有吃上饭，大家身上带的干粮已经不多，有的一点也没有了。况且，白天行军，

一定会遭到敌人飞机的骚扰。这样，部队半天一宿能不能走完一百六十里，按时赶到湘江呢？

“是啊，任务是很紧急，但目前的情况更危急！我们自从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又调集四十万大军，分成三路，前堵后追，千方百计想消灭我们。”袁子钦同志指点着地图说，“你们看，在我们的背后，就是正在和你们交手的湖南军阀李云杰的部队，左侧灌阳县是桂系军阀，右侧全州是周（浑元、薛（岳纵队，他们正从两边夹击我们，而横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还有一条宽阔的湘江。蒋介石一再命令他的部队，要利用湘江这一天然障碍，也就是他们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全州、灌阳、兴安之间一举消灭我们！”

听了袁子钦同志的介绍，我们感到情况非常严重。他却好象以为我们对险恶的形势还认识不足似的，又补充说：“部队必须马上转移，向西走，如果被敌人截断，能冲就冲过去，不能冲就绕道过去，反正是向西，太阳往哪儿落你们就往哪儿走，争取把所有的部队都带过去，即使被冲垮了也要大家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往西去找部队。”

他的这些话，象一块重石搁在我和团长的心上，压得我们简直透不过气来。我们简草地交换了一下意见，当即决定：三营的七连、八连留下，继续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再走，其余部队迅速转移！部队很快就出发了，一口气赶到文市。这时，袁子钦同志已带着一个班，站在文市街外的小土岗上等着我们。部队一到，他们就大声喊道，同志们，今天是急行军，要走一百六十里，必须轻装前进，除了枪支、弹药外，其余的东西统统丢下！”

于是，同志们不得不停下来，把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时随身携带的书籍、笔记本、旧军衣等，都轻装掉。袁子钦同志便指挥几个战士就地烧毁那些文件、书籍。那时候，我身上还带了一本《共产党宣言》，一本《政治经济学》，还有一本《中国革命运动史》。这都是在红军大学学习时发的，要丢！掉，实在可惜。警卫员李云同志见我舍不得，便说：“政委，书还是留下吧，我能拿！”说着就把书接过去，塞进他的挎包里。

“政委，锅可不能丢啊！”我正在清理文件，突然有人喊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连的炊事班长老刘，双手护着一口行军锅，身后站着一个负责检查轻装的战士。那战士要收他的行军锅，直叨叨这是上级规定，除了枪支、弹药以外，什么也不能留。这时老刘把眼一瞪，气呼呼地说：

“小伙子，我问你，战士的任务是什么？炊事员的任务是什么？”那个战士被问得莫名其妙只得说：“战士的任务是打仗，炊事员的任务是做饭呗！”

“我再问你，战士余什么打仗？炊事员拿什么做饭？这行军锅是不是我们炊事员的武器，老刘象连珠炮似地贵问道，“战士的枪支、弹药不能轻装，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行军锅轻装掉？”

老刘的话虽然不错，但是目前情况紧急，上级要求宁丢东西不丢人，前面有的部队连没有弹药的破枪烂炮也都丢下了，何况这笨重的行军锅呢？我便向老刘说明情况，劝他还是把锅丢下，接着又说：“炊事班挑油盐担子的任务就够重的了，将来打了胜仗还怕弄不到一口锅吗？”他听了之后，无可奈何地把锅交给那个战士。可是这时候，这个年近半百的老同志，竟心疼得哭了起来。

部队轻装以后，继续向西前进。走出文市不久，两架敌机发现了我们，又扫射，又投弹。那时我们没有高射武器，敌人飞机非常猖狂，俯冲下来时几乎是擦着树顶，部队只得停止前进，疏散隐蔽。半小时后，敌机飞走了，我们又继续赶路。可是走不到呈四里，天边又出现两架敌机的影子，有的战士开玩笑说：“当心帽子，别叫敌人的飞机摘去了。”不一会儿，敌机又肆无忌惮地俯冲扫射起来，部队只好又开、隐蔽。就这样，敌人的飞机轮番地轰炸、扫射，我们走停停，停停走走，走的时间没有停的时间长，两个小时走了不到十里路，很多同志急得直嚷嚷：“这怎么行呢？这样走，三天也到不了湘江呀！”

正在焦急的时候，我们远远地看见一个小个子，腰间扎根皮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小手枪，手里撑着一根“长的竹棍，站在路旁。谁呢，原来是

师长陈伯钧同志。他见了团长和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我们看。这信是党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写的，大意是：现在的情况十分危急，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冲出敌人的包围，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我们看完信，心情十分沉重。陈师长本是个有名的乐天派，平时一说话就笑，而且喜欢哈哈大笑，可是这一次，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他指着行进中的部队，不满地说：“这样的速度，明天拂晓前是过不了湘江的。过不了湘江，就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接着，又指着左前方和右前方说，“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

枪炮声！非常比集的枪炮声！这说明在我们的左前方和右前方，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兄弟部队正在全力顶住企图合围的优势敌人，正在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开辟着一条狭长的通道，让我们能够冲出去。

“可是，敌人的飞机尽捣蛋！”王彦秉同志愁眉不展地说是啊，怎么对付敌人的飞机呢？我们站在路旁，一时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对策来。陈师长挥动着手里的竹棍子，踱来踱去，突然停下，果断地说：“我看，敌人飞机来，我们就打，边打边走，这样才会加快速度！”

陈长的话音刚落，王彦秉同志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说：“行，打！狠狠地打！看谁硬得过谁！”说完，就向部队作布置去了。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敌人飞机再来的时候，各连的特等射手、机枪射手一齐向敌机开火，前前后后枪声大作，大路上顿时升起一道火墙。那些胆小怕死的敌机驾驶员，再也不敢俯冲扫射了，高高地丢下几个炸弹，也大多落在路旁的稻田里。这时我们的战士头都不抬，迈开大步，照样向前疾进。

傍晚，部队在一个大村子外边的禾场上停下休息。炊事员进村烧了开水，大家整整一天才吃了第一顿干粮。利用这个时机，各连都召开支委会，号召共产党员在这次急行军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强团结互助，不让一个人员掉队，保证大家按时渡过湘江。会后，干部又向所属人员进行思

想动员。一营教导员彭嘉庆同志大着嗓门说：“到湘江还有一百二十里，路不算近，可是在我们红军的铁脚板下也不算远。时间只有一个晚上，大家加把劲，明天拂晓前一定能过湘江！”

天色暗下来，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村庄和田野都消失在黑暗里；在头顶上骚扰了半天的敌机也无影无踪。但是，左右前方的枪声、炮声，却越来越激烈了。

部队踏上大路，便以营为草位，组成五路纵队，向前开进。那不是走，而是在奔不是在行军，而是在赛跑。只听得一片嚓嚓的脚步声、呼呼的喘息声和武器的磕碰声，一股汹涌的潮水，顺着灰白的道路，向西，向西，向西直冲而去。有的人走不动了，旁边的同志马上接过他的武器，挽着他的胳膊，架着他前进；有的人鞋底跑掉了，别的同志立即从背包上解下自己的新草鞋，叫他——不，简直是命令他立即穿上，继续跟上队伍。大家不说，不笑，不知道累，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一千多双腿，象一双腿似地跨步前进；一千多双眼，象一双眼似地注视前方；一千多颗心，象一颗心似地跳动着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迅速前进，明天拂晓前渡过湘江！

下半夜，我们第二次遇见了师长陈伯钧同志。他没有骑马，而是和师部侦察连便衣排的同志们一起徒步行军。我便上前问道：

“师长，你的牲口呢？”

“啊？”师长抬起头来，看看潮水般从身旁涌过去的队伍，用手揉揉眼睛，笑道：“队伍都上来了吧！哈哈！这么大的声音，我还以为是到了湘江边哩！”

“师长的牲口让给别人骑了”旁边的警卫员不满意地嘟囔道。

陈师长笑着说：“小鬼，别光想到自己么！病号走不动，让他骑马难道不应该吗？”

“那你”警卫员噘着嘴不服气地说。

“我吗？哈哈！好办。”陈师长笑道，“开动4号汽车，直达湘江边呀！”

师长的话引得大家直笑。

离湘江五六里时，东方已现出微明，只见前面有一片乌黑的树林，树林中闪烁着点点灯光。响导告诉我们：那就走江边！这时大家的劲头更足了。“快到江边了！”“加油呵，前面就是湘江！”这些话象电流似地迅速从队伍的前头传到后头，大家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加快起来。终于，在朦胧的晨光中，部队一口气赶到了江边。随后，战士们脱掉鞋袜，挽起裤管，一涌而下，踏着冰凉刺骨的江水，向湘江对岸徒涉过去。

二

早晨，湘江在茫茫的白雾中闪着亮光，湍急的江水哗哗直响。沙滩上，铺了很厚的一层霜。每个人的帽子上、衣服，上和背包上，也都结满了晶莹的霜花。但是，大家涉过江后，一点也不觉得冷，有的用江水洗把脸，有的拍去身上的尘土，然后三三五五围坐在一起，分吃着剩下的一点干粮。

休息片刻以后，部队又继续西进了。可是当我们刚离开江边不久，对岸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显然，在东岸担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没有来得及过江，就和合围的敌人接上火了。枪炮声一阵猛似一阵，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不安。大家都为兄弟部队的安全担心，突破重围，摆脱险境，安全渡过江来。可是，第二天，传来了不幸的消息：三十四师被敌人包围在江那边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因为，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三十四孤军作战，一定是凶多吉少啊！

前面的道路，是漫长的；大家的心情，是沉甸甸的。没有歌声，没有笑语，战士们的神情都异常严肃，队伍默默地向西开进，向西开进

部队离开湘江，走了四五天，前面有一座大山挡住去‘路。这座大山，地图上称越城岭，老乡都叫它老山界，是一座；上山三十里、下山十五里的高山。从山脚向上望去，只见峰峦重叠，巍峨险峻，满山黑压压的松柏中有一条羊肠小道，顺着山沟成“之”字形蜿蜒上升，那时正赶上兄弟部

队上山，远远看去，象有一条长长的乌龙在山林间曲折地游动。

十二月六日，为了掩护兄弟部队过老山界，我们团奉命从山脚下的千家寺出发，向南去担任警戒。我们顺着大路走出十多里，突然从东边小路上插过来一股敌兵，这时走在最前头的一连迎上前去，很快就把敌人打跑了。但是，一连指导员却在战斗中负了伤。于是我们一面命令部队继续向东面搜索敌人，一面派三个战士把一连指导员送回千家寺去。

一连指导员他们一路四个人，走得很慢，到千家寺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们刚走到街口，突然听到一个哨兵喝道：“什么人？口令！”他们感到不对头，怎么会！西口音呢？

这是什么部队？是友军，还是敌人？这时，一个战士机灵地把指导员猛往后一推，大声答道：“自己人，掉队的！”可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是江西口音，一下就露出了破绽。“砰”的一声，敌人哨兵开枪了。这时另一个战士赶忙拉着指导员往回跑，剩下两个战士一边后退，一边掩护。千家寺的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有的盲目打枪，有的拼命叫嚷：“共军来啦！共军来啦！”

一连指导员他们四个人，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回到部队，见到团长王彦秉同志，报告说：敌人已经把千家寺占了！

“什么？你们看清楚没有？”王彦秉同志大吃一惊。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太突然了。上午军团部还在镇上，我们出来是执行警戒任务的，怎么这么快就被敌人占了呢？如果敌人真的占了千家寺，那我们的退路就被截断，全团就要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所以，这消息刚开始大家都不敢相信。可是听了一连指导员他们的详细报告，我们又不得不感到这一严重情况是真实的。

怎么办呢？显然，继续呆在这里警戒已毫无意义，必须立即赶回去翻过老山界找部队。于是我们决定，以团侦察排为核心，成立一个精悍的突击队，由他们为前导，趁天黑，敌人立足未稳，来个猛打猛冲，冲过千家寺去。组织突击队时，一连指导员和那三个战士都要求参加，他们说：“我

们走了一趟，情况熟悉。”

我担心一连指导员的伤势，说：“你负伤，还是跟部队一起定吧！”

“没关系，轻伤不下火线嘛！”

“好，让你参加。”站在我身旁的主彦秉同恚见他要求得恳切，便说，“突击队就由你来带队，怎么样？”

“坚决完成任务！”一连指导员响亮地回答。

不一会儿，一支五六十人的突击队，在一连指导员的带领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整个部队随后跟进。当我们赶到千家寺附近时，只见镇子里火光通明，一片混乱。敌人大声喧哗，到处都是“吊你拉妈灰”的谩骂声，似乎大部队刚到，正在休息，做饭吃。我们根据这一新的情况，临时决定从千家寺南面的树林里穿过去，不和敌人正面硬拼。说来也很可笑，我们一个团的队伍从镇子外面插过去，街里敌人叫骂、说笑的声音都能听见，可他们竟没有发现我们。直到我们的队伍过完，突击队给他们一个突然袭击，敌人才又惊慌起来，向镇子外乱打枪，乱放炮，一个劲儿地折腾。

过了千家寺，走不多远，我们就遇上军团部派来和我们取联系的同志。他们告诉了我们事情的经过：原来就在我们顺着大路向南去笪班的时候，敌人从小路偷袭了千家寺，军团部连忙退出镇子，没有来得及把情况通知我们。



王彦秉同志听了笑着说：“要不是一连指导员他们报信，现在我们还在为千家寺进行！”

这时，千家寺的敌人还在起劲地“鸣枪欢送”，而我们已经迈步登山，开始征服老山界了。

三

我们顺着山沟里的小路爬山。

最初，大家都鼓足劲，准备一口气登上山顶，或者至少也要爬到山腰。可是鹬与愿违，前面的部队行进的速度很慢，走了一里多路，干脆走不动了。问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不清楚，他们前面的部队走得就慢。”没有办法，只得耐着性子等！二十多分钟以后，前面才开始走动，我们也跟着走，但走不到半里路，又走不动了。以后一直是这样，走几步停一停，停几十分钟再走几步，走到半夜，只走五六里路。战士们跑了一天，没有吃上饭，又饿又累，都站着打瞌睡。看到这个情况，我和王彦秉同志，决定部队干脆停止前进，在路旁休息一下。路旁都是石头，战士们坐下以后，把毯子往身上一架，很快就睡着了。

我睡得正香的时候，被冻醒过来，睁眼一看，天正下着毛毛雨，毯子、衣服都湿了。山风一吹，浑身直打寒蝉。这时前面不远处有一堆篝火，几个人围坐在那里低声谈话，我一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团长王彦秉、一营长彭少青和左手吊着绷带的一连指导员。便问道，你们没有睡一下，

“刚睡着就冻醒了，这鬼天气！”王彦秉同志叫我坐下，接着又说，“前面部队是怎么搞的？有时叫我们拼命赶路，现在又走得这么慢，这哪象鬼行军打仗的样子呀！”

“从江西出来，还不一直就是这样！”我坐下说，“敌人走大路，我们走小路，前面部队还抬着笨重的机器，怎么走得快呢！”

“所以就苦了我们后卫部队。”王彦秉同志不满地说。

“不仅苦了我们后卫，听说前面的同志也都为那些机器吃尽苦头了。”彭少青同志补充道。

“我看，建议上级干脆把那些机器扔掉算了！”一连指导员插了一句。

“不行啊，有人说了，这是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什么都得带走！”王彦秉同志越说越生气。

这时，我们又很自然地回想起毛主席领导我们红军反“围剿”的情景。那时，红军部队去似疾风，来似流水运动非常神速，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蒙头转向。

第三次反“围剿”时，敌人采取比集包围姿态接近我军，我军却从敌人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跳出了包围圈，等到敌人发觉再掉头追来时，我们已休息半个月，以逸待劳，一下就消灭敌人一个师和一个旅。这和眼前的被动局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

“首长，我们炊事班到前面给大家作点饭吃吧！”我们正在闲谈，听到旁边有人说话，回头一看，原来是一连炊事班长老刘。他顶着毯子，斜靠在一块石头上，焦急地说：“同志们一天没有吃上饭了，我越想越睡不着。”

我猛然想起，在过湘江前，他的行军锅已被轻装掉，到如今也没有补充上，在这荒山野林里拿什么做饭？老刘似乎猜出我的心思，忙补充说：“没有锅，我们有脸盆，有大缸子，只要用两块石头一架，就能煮饭。”

我们虽然同意老刘的意见，但是现在天黑，大家又在休息，只好等天明了再说。不一会儿，前面来人联系，叫部队继续前进，于是大家站起来揉了揉眼睛，抹了把脸上的雨水，又一步一步地往前赶起路来。

天渐渐亮了，我们便叫供给处长带领各连的炊事员，到前面去给大家做饭。战士们听说前面有饭吃，都催促快走，可前面的部队仍是走一阵，停一阵。不一会儿，敌人飞机来了，嗡嗡地在头顶上兜圈子，有时盲目地打一阵机枪。在茂比的山林间，我们根本不理它，有时它飞近了，便稍为隐蔽一下，它一飞远，又继续爬我们的山。

早晨，我们来到一片大竹林子旁边。这里有僑民住的几间又矮又小的草屋，炊事班已准备好了饭。吃饭的时候，我们打听离山顶还有多远，僑民老乡说，远得很哩，和山顶比起来，这里还是山脚！”

吃过饭，我们又继续前进。可是越往前卑，山越陡，路越险，前面的人一不小心，碰动脚下的石子，就会掉到后面人的头土。尽管这样，同志们仍旧抓住石头缝里的野草、小树枝，艰难地往上爬。直到半山腰，部队实在疲劳了，才停下来休息。

这时，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打瞌睡，刚刚睡着，朦胧中听得有人叫我的名字，睁眼一看：一个头发、胡子长得很长的高个子战士站在我的面前。我愣了一下，猛然间想不起他是谁来。他笑嘻嘻地说：“石泉，你不认识我啦？”

听声音，我才认出他是我一个房叔，名叫谢顺山。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奇，问道：“顺山叔，你怎么到这儿来的”“没有想到吧！说来话长呢。”他在旁边拣块石头坐下后，便把他怎样参加红军，怎样离开家乡，以及在兴国师当炊事班长后怎样掉队的经过，向我说了一遍。

“兴国师？不是抬机器的部队吗？”一直坐在旁边听得入神的王彦秉同志插嘴问道。

“是啊，兴国师和瑞金师，两个师的部队全是抬机器的！”

我便问：“到底抬些什么机器什么机器都有，印刷厂、被服厂、兵工厂，好几个厂的全套设备，都抬着走！有些机器的大部件可沉呢，三四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抬不动。”他一边说，一边摸自己的肩膀，“那些小伙子肩膀压肿了？有的累病了，都不吭声，照样抬着机器翻山越岭。就是走得慢，有时还要出危险，如果不小心，连人带机器一起翻到山沟里去，那就没救了。”

王彦秉同志气愤地说：“机器，机器，为什么硬要抬着这些死家伙走呢？蒋介石是个运输大队长”我们只要打胜仗，武器弹药、装具被服，还愁蒋介石不给‘送来？何必拿这些重包袱呢？”

我又问顺山叔：“你怎么掉队了呢！”“这两天受了点风寒，太累了。”他

神情不安地说“终你说实话，如今不象毛主席领导的那个时候啦上头们走呀走呀，到底走到哪里去，走到何时为止，没有哪里不痛快，身上又有病，就掉队了。”

顺山叔的这些话，使我联想起很多事情。我想起以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毛主席领导我们每做一件事，或执行一项战斗任务，总是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把任务交代得清清楚楚，充分发挥干部、战士的革命积极性。那时候，再苦再累，大家心甘情愿。可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特别这次离开中央根据地以来，确实再也听不到毛主席的消息了，现在部队究竟要到哪里去？我们谁也不知道。天天行军，天天动员，翻来复去一句话：坚决跟着走，一定能够胜利。一个多月来，通过赣、粤、湘、桂四省，行程好几千里，部队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特别是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死拼硬打，损失更为严重。我们五军团只有十三师和三十四师两个师，如今三十四师没有过得了江，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象顺山叔这样的思想，一定会更加普遍，对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休息以后，队伍继续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前进。山路狭窄，只能一人攀登，挑担的无法转身，牵牲口的更是困难。顺山叔要求留下替我看马，团长同意了，我见他牵匹牲口吃力地走着，很是不安，但是他却说：“这比抬机器强多啦！”

部队前进着。据说，前面有一座雷公岩，地形十分险恶，很难走过去。开始我们还不很在意，等走到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只见一座刀削似的峭壁，挡住去路，真象被雷劈过的一般，峭壁上有一条宽不过尺的石梯，很陡，几乎是直竖在这里。部队通过时，只能一个挨一个小心翼翼地过，挑担子、牲口过就更加困难了。我想起前面抬机器的部队一定是克服重重困难，才抬着笨重的机器寸步维艰地爬上这个危岩的，不禁肃然起敬，感到昨晚因行军速度慢而责怪他们太不应该。

下午三点钟左右，我们终于登上老山界的顶峰。大家虽然疲劳，但十

分活跃，有的说笑，有的唱歌。我站在山顶，了望远处，只见山连着山，岭连着岭，重重叠叠，一望无际；漫山遍野的树木、竹子，郁郁葱葱，在斜阳的照射下，色彩斑斓，非常好看。我情不自禁地想：从江西出发以来，我们翻过了多少高山，渡过了多少大川，祖国的河山多么壮丽，又多么富饶，将来革命胜利了，建设社会主义时，把这些资源都开发出来，使它造福于人民，那该多么好啊！

下山时，山的坡度仍然很大，但行军的速度突然加快，一直是跑步，一口气几乎跑了八九里。路两旁的风景极好，松柏参天，绿竹夹道，泉水淙淙，鸟雀飞鸣。但是我们无心欣赏，只是顺着山路直冲下去。“到宿营地了前面传来了消息。这时，大家跑得更欢。同志们经过一天一夜的山地行军，多么需要好好地休息啊！但到山下一看，宿营地原来在一条小河边的树林子里，没有一间房屋，只是在树杆上贴着“一营”“二营”的纸条，算是指定的宿营地点。

深夜，我在树林里检查完部队露宿的情况，躺到自己铺位上，看着老山界巨大的黑影，仰望天空明亮的北斗，回想起过湘江以来行军作战的情况。一时思潮格，久久不能入睡。我想：此刻，毛主席在哪里宿营呢？中央首长在哪里宿营呢？部队这样艰难地跋山涉水，他们一定知道吧！我们多么希望象过去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那样，经常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由他来领导我们胜利进军啊！

三 黄平整编

—

十二月下旬，我们到达了贵州的黄平县。黄平是一座山城，象贵州的许多县城一样，座落在山坡上，四周都是山峦，几乎没有平地。但是市面却很热闹，街道上人来人往，各式各样的店铺也很多，人们可以买到贵州的名产茅台酒也可以买到一些有地方风味的零食。我们那些吸烟的同志，买到了烟卷，更是兴高彩烈，如获至宝。因为我们从江西出发，虽然经过粤、湘、桂、龄等好几个省，但大多是住乡村、走小路，住在城市的机会焉很难得的，所以同志们买到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都很细，心地保存起来。

那天下午，我和团长王彦乘同志也在街上转了一圈，买了一些东声，然后到军团部去请示工作。军团长住在城内一家很普通的民房里。院里静悄悄的，我们走进门，迎面走出来逛振堂同志的警卫员。王彦乘同志问道：“军团长在家吗？”

“首长在洗衣服。”警卫员回答说。

“啊！洗衣服？”我很诧异，接着就责怪警卫员说，“首长工作这么忙，还让他自己洗衣服，你们怎么不帮帮忙呢？”

“请团长、政委去说服一下首长吧，我们正对他没有办法呢！”他说得那样认真、恳切，同时对我刚才的责备感到有些委屈。

我们走进屋，只见军团长蹲在地上，袖子卷得老高，双手浸在洗衣盆里，用力地搓洗着衣服。他见到我们，立即站起身来，一边笑着向我们打招呼，一边擦去手上的肥皂沫。”我说：“首长要考虑咱们全军团的事，工作这样忙，还自己洗衣服，为什么不叫警卫员他们帮帮忙呢？”

他让我们坐下，笑着说：“洗衣服是一种很有益的劳动嘛，既可以休息脑子，又可以锻炼身体。再说，我自己也有一双手，何必要麻烦警卫员他

们呢？他们既要行军打仗，又要站岗放哨，也很辛苦啊！”

军团长的这番话，使我很受感动，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王彦乘同志笑着说：“老谢，你来五军团时间不长，还不大了解咱们军团长。多年以来，军团长从来都是衣服破了自己补，衣服脏了自己洗的。”说到这里，他把刚才从街上买来的两包炒米花往桌上一放，说，“军团长，吃炒米花吧！我请客。”

军团长笑着说：“这些是小孩子吃着玩的吧！”但他还是走过来坐下，和我们一同吃起来。他一边吃，一边问：

“部队的粮食够吃不？”

王彦采同志汇报说：“刚才碰到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的同志，他们说这次打了几家大土坎，保证部队吃得饱，份好，现在已经给我们送粮食、猪肉去了。”

军团长听了高兴地说：“贵州的老百姓穷得食不饱腹，衣不蔽体，可那些土坎家里却粮食堆得发霉。我们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那些穷苦人，他们高兴极了，有的背着粮食走过来对我们的同志作揖道谢，说，红军先生，你们救了我们千人的命罗！”

“红军先生，先生还能扛枪打仗？真有意思！”王彦乘同志笑着说。

军团长接着又问：“你们那里病号多吗？”

我回答说：“现在各个连都有一些病号，几乎全都是打子。这种病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大，有的同志已经病得走不了路了。”

“趁我们正住在城市里，要设法多买些药品，给这些同志医治。少数实在身体虚弱的，要想办法寄在乡下老百姓家、里，因为我们前面还有繁重的行军、作战任务。”军团长沉思了一会，又问道，“战士们有些什么想法呢？”

“希望休息一下，哪怕是几天也好。”王彦乘同志说。

“是啊！从江西出发，两个多月了，走了好几个省，部队一直行军、打仗有休整的机会，特别是你们三十七团，一直担任后卫，够疲劳的了。”

军团长站起身，在室内走了几步，又停下说，“不过，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刚才接到军委的电报，要我们在这里休息三天，进行整编。”

“整编？”我们两个都感到意外。

“对，整编。”军团长点头，兴奋地说，“听说这是毛主席的总见。”

“这可是个好消息呀，你们看吧，只要毛主席来指挥，咱们准保打胜仗！”王彦秉同志越说越激动。

“毛主席，我们多么想念您啊！”我情不自禁地心里说。

“是啊，毛主席真是想到我们心里去了！”军团长点点头，又补充道，“这次整编提得多及时呀！两个月来的事实不是掖清楚吗？我们的部队不够战斗化，不能适应当前的情况，携带东西太多，什么坛坛罐罐都背着，象一次大搬家似的，走不动，不能有效地集中兵力，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当然就要处处挨打”

王彦秉同志十分赞同：“对呀！不说别的，就说抬了那么多的机器，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哪象是打仗的样子？过湘江，过老山界，我们为这些家伙吃了多少苦头！”

“三十四师最近有什么消息吗？”我不禁想起还没有过湘江的兄弟部队。

“没有。过老山界前，还收到他们的电报，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这时候，我真后悔刚才又提起这件使军团长感到痛心的事。我知道，由于三十四师未能渡过湘江，军团长曾经焦急得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如今时间虽然过了近一个月，但一提起这件事，他的心情还是十分沉重的。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后来还是王彦秉同志站起来谈。“三十四师没有过得了湘江，我师，也是由于我们舍不得坛坛罐罐的结果。不集中兵力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极避战，搬家逃跑，就只有被动挨打，使自己遭受损失。”

“对！这是血的教训。所以现在军委才决定整编部队。”

军团长又坐到自己的椅子上，给我们解释道，“听说上级原来计划，让中央红军向湘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妄图一口吃掉我军，调集了十五个师，四十万人，在靖县、绥宁、城步、武冈一线，布成一个口袋阵，只等我们红军去钻。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毛主席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坚决主张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不和敌人硬拼，改道向敌人力位薄弱的贵州进军。毛主席一路上找人谈话，做了大的说服工作，并坚决主张召开军委扩大会来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后来中央军委在湖南通道召开了扩大会议，

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主张得到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部队才进军贵州，攻克了黎平。前些日子，党中央在黎平开了会，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毛主席的看法，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行不通的，也是不适宜的。”

“咱们怎么整编呢，王彦秉同志性急地问道。军团长告诉我们：“军委按照毛主席的想法，决定撤销五军团师一级的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并把八军团和五军团合编，两个团并成一个团，两个连并成一个连。这样，每个连队将有一百五六十人，战斗力又会很强了。”

“那太好啦！”王彦秉同志高兴地说。

“那今后我们又要恢复老传统，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打运动战罗！好哇，把这个决定的精神给战士们一讲，大家一定是举双手拥护！”我笑着说。

“那还用说，准比吃炒米花香！”王彦秉同志乐滋滋地开了一句玩笑。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刚才只顾说话，早把吃炒米花的事忘了。王彦秉同志抓了一把，笑着说：“来来来！快吃呀！”他那个高兴劲儿，简直象一个天真的孩子。一向比较肃静的军团长卧室，这时洋溢着我们的高声谈话和爽朗的笑声，使屋外的警卫员也惊奇得探身张望了。

二

第二天，根据军团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向干部和战士传达了部队进行整编的决定，同时告诉大家，八军团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就要来了。

当天，五军团象办喜事一样，干部、战士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刚听完报告就回去腾铺位，准备慰劳品，上街买糖果和香烟，炊事班的同志们忙着杀猪，改善伙食。大家都说，“要好好地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

吃过午饭，司号员吹起嘹亮的军号，战士们穿戴得整整齐齐，武器擦得乌黑锃亮，在坪子上集合。部队刚刚坐定，就互相拉唱歌子。一时间，歌声此起彼落，笑声与掌声整个部队朝气蓬勃，生龙活虎，气象焕然一新，昨天长备军后的那种疲惫情绪，已无影无踪。

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同志——撤销师级机构后，他就调军团部工作——看了非常高兴。他笑着说：“哈哈！今天象个样子，这才是红军，才是五军团！他又指着几个战士脚上的草鞋说，“要知道部队情绪高不高，只要看战士脚上的草鞋：草鞋打得好，部队情绪高；打得马虎，准是有点问题。你们看，今天那几个小伙子的草鞋不但打得漂亮，鞋头上还缀着一个小红球呢！”

我仔细一看，果然不少战士的草鞋上，都有用红绳子做的小绒球，远看象是一朵朵小红花。我一边佩服陈参谋长观察问题精细，一边笑着说：“参谋长真特别。人家说，情绪高不高要看脸面，看眼睛，你却看脚上的草鞋。”

“不，有道理！有道理！”王彦秉同志接过去说，“红军战士三天一双草鞋，这可是一本没有字的帐啊！”

我们正在热烈地谈论着，团作战股长前来报告：八军团六十七团的同志们来了。我们一齐向东边的大路上望去，只见一支红军队伍，约五六百人，成四路纵队，打着红旗，精神抖擞地向这边走来。我们立即迎上前去，和走在队伍前头的领导同志们——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这时，场上响起了宏亮的口号声：

“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

“向英勇的八军团同志们学习！”

喊完口号，又热烈地鼓掌。六十七团的同志们在掌声与口号声中走进！场，他们也纵情高呼：

“向五军团的同志们学习！”

“向五军团的同志们致敬！”

接着，合编工作开始了。按照预定计划，六十七团的同志们有条不紊地编入我团的各个连队。这时，战士们互相介绍、问好，抢着背背包，背武器，场上又喧闹起来。

我正陪着陈伯钧参谋长检查部队合编的情况，突然有个战士迎面跑来，大声叫道：

“指导员！指导员！”

“小鬼，你认错人了吧？”陈伯钧同志瞅了瞅那个小伙子，见他长长的头发，上衣破了几个窟窿，背着一支驳壳枪顿时怔住了。

我却惊喜地说：“你是王玉山”

“是啊！指导员，我是小王。”他笑着答道。

陈伯钧同志恍然大悟，说：“怎么，你们认识？”

“我过去在七军团五十九团三连当指导员的时候，他是连里的通信员，我们是老熟人了。”我告诉陈参谋长。随后又握住王玉山同志的手，高兴地说，小王，几年不见，你长高了！你是怎么到八军团的？”

他说，自我离开三连后，他一直在五十九团工作，今年春天生病住院，后来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他没有赶上，出院以后就分到八军团来了，现在在团部当通信排长。

陈伯钧同志听了我们的谈话，笑着说：“巧啊！你！军团分开，到五军团会面，老战友又在一起战斗了。”接着，他又问道，“怎么样，八军团同志们对合编有些什么看法？”

我见他瞅了瞅陈伯钧同志，便介绍说：“这是咱们军的陈参谋长。”他

马上向陈伯钧同志敬了个礼，说：“大家都很高兴。昨天动员以后，讨论得可热烈哩。同志们说，上级的决定是正确的，早该这样做了。我们六十七团从江西出来，一千多人，现在只有五六百人，说是一个团，实际不顶一个团用，但也是一套团的机构。只有进行整编，精简机构，充实连队，才能加强战斗力，更好地完成今后的战斗任务。”

陈参谋长赞许地点点头，说：“同志们的认识不错嘛！”

王玉山同志说：“大家听说五军团老同志多，思想、作风好，打仗有一套，合编过来可高兴啦。”

“小鬼，你高兴吗？”陈伯钧同志问道。

王玉山同志笑笑说：“合编到五军团，又见到老指导员，我是喜上加喜，当然比别人更高兴啦！”一句话，说得我们都笑了。

当天晚上，各连都开了欢迎会。因为驻地分散，大多是以班排为草位举行的。在晚会上，大家互相介绍情况，交谈战斗经验，有的还表演了文娱节目，情绪十分活跃。我来到三连，由连长陪着，参加一个班的会。我们去时，战士们正聚精会神地听他们的班长讲五军团的战斗故事哩！我们悄悄地坐下，可是还是被班长发现了。他说：

“政委，您来讲讲吧！”

我对班长笑了笑，说还是你继续讲吧，我们也听听。”

“好，我接着！等会儿听政委的。”班长清了清嗓子，又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我们估计敌人只有三个团，实际上他们是九个团，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十分猖狂。怪得很，虽然我们是攻，他们是守，可是我们冲锋，他们也冲锋。就这样硬打硬拼，一连打了两天两夜，没有攻下来。第三天，我们上去两个连，每人手里提着一支驳壳枪，背后别着一把大刀，腰里插着几颗手榴弹”

“听说他们豁出来了，把上衣全都脱掉，是不是？”一个战士插嘴问道。

班长同志点点头说：“可不是么，他们有的脱掉上衣，光着膀子上。冲

上去以后，先是用驳壳枪扫，接着离敌人越来越近，他们就用手榴弹拼。不一会儿，手榴弹打光了，冲到了敌人的跟前，他们就抡起大刀直往敌人头上砍！砍得敌人哑牙咧嘴，哇哇乱叫，那血呀，顺着刀把子直往下流，连刀把上的红绸子都在滴血呢！敌人一看这情景，顶不住了，一个个象兔崽子似的撒腿就逃，可狼狈啦！”

“这是一九三二年的！东水口战斗，也是一九三一年赵博生、谢振堂同志领导我们举行宁都起义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可惜的是，赵博生同志在一九三二年的黄狮渡战斗中牺牲了。”三连长补充说。

班长的故事讲完后，大家又欢迎八军团的同志们讲。八军团的同志也讲了他们的一段战斗经历。最后，我高兴地说：

“我们两支兄弟部队，都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军。今后我们要互相学习，紧比团结，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作风，坚决完成今后上级交给我们的的一切战斗任务！”

班里的欢迎会，到这时简直开成一个战斗动员会了。

三

部队整编后，虽然还没接到上级有关出发的命令，但那（些有经验的老战士根据某些迹象进行分析，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估计部队大概快行动了。到第三天早上，军团的设营队一出发，他们就说：“做好准备吧，咱们今晚准保动身。”

于是，大家忙着擦拭武器，赶打草鞋，缝补军衣，归还向老乡借的东西做好行军前的一切准备。

只要军号一响，就可整队出发了。然而，一些病情较重的同志，却不安起来。虽然昨天晚上领导上对那些决定留下的同志，分别进行了动员、说服，可是他们对部队的感情是多么深啊！一听说要离开红军，简直心都要碎了，哪里舍得呀！后来经过组织再三解释：前面行军的路程更长，更艰

险，作战任务也更繁重，为了红军的胜利，要顾全大局。他们这才表示同意、服从组织的安排。但现在听说同志们马上就要走，许多伤病员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难得哭起来。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和大家一起继续战斗啊！

顺山叔就是其中的一个。最近，他打摆子打得很厉害，面黄肌瘦，浑身没劲，走起路来歪歪斜斜，两条腿一点也不听使唤。所以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送到城外一个山沟里的贫农家里去。那家只有一个老婆婆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孙女，对咱们红军可热情啦！部队去联系时，老婆婆说：“你们放心，那位哥子住在我家，只要有吃的，就有他吃的；我们豁出命来，也要把他的病养好。”昨晚上，顺山叔听到组织上的决定和安排后，终于也表示同意。他说：“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咱们红军，我愿意留下，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怀。”可是，今天警卫员李云同志跑来告诉我，早上给顺山叔送饭时，他打听部队什么时候走，一边吃饭还一边掉眼泪。

上午，我听完六十七团领导同志介绍部队的情况，又到各连看望了要留下的病号，最后看顺山叔时，见他已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李云同志正在帮他收拾东西。顺山叔见到我很高兴，说了声：“石泉，你来啦！我不能跟你们走了。”说着又笑了一下，可怎么也掩饰不住难舍难分的神情。

我连忙又安慰他一番，接着问道：“给你留下一些钱了吧？”他告诉我，领导上给他十块银元，还有一些准备送给那家老乡的东西。他感动地说：“现在革命这样艰难，为我花这么多的钱，真是过意不去！”

我说：“这是党对每个同志的关怀，是为了让你能够安心养病。等身体好了，再来找部队吧！”

这时他眼睛一亮，很有信心地说：“听同志们说，咱们要在这一带开辟根据地，那我的病一好，就去找你们。”他又转过身去，嘱咐李云同志：“小李，我不在，你要好好照顾首长啊！咱们那匹牲口，你也要多操心，要让它吃饱，夜里起来多喂几次，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你就放心吧。”小李点点头说。

临走的时候，顺山叔坐在担架上，握住我的手说：“石泉，你们放心去吧！有咱们党的领导，革命一定能够成功！我希望咱们红军永远前进，永远胜利！”他紧握一下我的手，坚定地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他的这些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在长征的路上，每当我回想起贵州的这段生活，就想起顺山叔的这些话，以及他说这些话时的神情。可是，给时没有料到，过了十五年之久，我们果然又真的见面了。

那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九五〇年我请假回家探望母亲，一到家就听说顺山叔还活着。不一会儿，他来看我了，人未进门，就大着嗓门嚷道：“石泉啊，我再给你喂马，嫌不嫌我老哇？”我赶紧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说：“哎呀！顺山叔，我们真有见面的一天啊！”

我叫他赶快坐下，讲讲分别以后的情形。

他说：“你们走后，我就住在老乡家。那老婆婆对我可真好，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她们自己吃包谷窝窝，可总要熬点稀粥给我吃，还给我买药治病。不到三个月，病就好了。我谢了老婆婆和小姑娘，就动身去找咱们部队。可是，跑了好几天，也打听不到一点确实的消息。有的说红军进四川了，有的说走得还要远，上北方打日本鬼子去了。我心里想，家乡还有党的组织，还有游击队，可以继续闹革命。于是，我就回家乡来了。”

“你哪来的盘缠呢？”我惊奇地问。

“我就靠两条腿走哇！饿了，向沿路老乡家讨口吃的；累了，找个地方借住一宿。组织上留给我的十块银元，除了五块叫老婆婆买药花了，剩下的五块，我一直带在身上舍不得用。有时我也想：这么远的路，恐怕走不回去了吧！可一想到咱们红军是怎样艰苦行军打仗的，我虽离开了队伍，还是一个红军战士，这点困难就不能克服？这样整整走了六个多月，总算到家了。”

我母亲在旁边笑着说：“他刚回来时，头发又长，衣服又破，你婶子都不敢认他。他对我说嫂子，我是和石泉在一起的，一路上打了好多胜仗，

现在毛主席领着他们到北方打日本鬼子去啦！当时我还有点不信哩。”

顺山叔笑呵呵地说：“我到家后，那些有亲人在咱们部队上的，那些打心眼里惦记着红军的，都偷偷地跑来找我，有的从几十里外赶来，要我讲讲咱们队伍长征的情形”

“那几个月，他在我们乡里简直成了一个秘比宣传员啦！”母亲笑着插了一句。

“这作用可不小啊！”我笑着说。

当然，上面这些是后来的事情。当时——那天中午，同志们用担架把他送走以后，我心里确实好一阵子难受。走到那匹牲口跟前，见那牲口？默默地站立着，不时地踏着蹄子，喷着响鼻，似乎也为见不到它的亲比主人而难过呢。

傍晚，队伍出发了。夕阳的余辉染红了山峦，抹红了树梢。我和王彦秉同志站在黄平城外的一个小土岗上，看着整编后的三十七团，有一千五六百人，威武而整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个个战士昂首阔步地从面前走过去。这时，一种渴望投入新的战斗的强烈愿望，在我心头不禁油然而生。

四 遵义光芒

—

乌江在晨曦中奔腾着。两岸的悬崖峭壁象刀削似的，直挺挺地刺向蓝天。几只山鹰，迎着灿烂的朝晖，伸展着矫健的双翅在高空飞翔。

这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在乌江北岸的工事里，我和新来的团长李屏仁志肩并肩地站着，面对着滚滚东去的江水，透过江面上的薄雾，观察对岸敌人的动静。忽然，替卫员李云同志气喘吁吁地从团部跑来，报告说：“军团首长来了，叫你们马上回去。”李屏仁同志听了之后，转向我说：“首长连夜从军团部赶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况。”于是，对江边值勤的干部简草地交代几句，我们两个就回团部了。

军团长董振党同志见到我们，亲切地和我们握了握手，十分兴奋地说：“你们辛苦了！我是来报告好消息的！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毛主席又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了！”

“这是真的？那太好了李屏仁同志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一拍手说，“毛主席终于又回来掌舵了，这可是我们日日夜夜盼望的呀！”

“快给大伙儿传达吧，同志们都在等着好消息呢！”我一听心里也乐开了花，连忙又补充一句。

原来我们三十七团自从渡过乌江，刚拆掉江上的浮桥，就接到今江边担任警戒的命令，同时听说中央正在遵义举行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虽然大家对会议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只是凭经验猜测，中央的会议一定讨论全军的大事，讨论中国革命的大事。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热切盼望毛主席来领导我们工农红军，领导中国革命运动。连日来，咆哮的乌江响在耳边，我们的眼睛盯着对岸的敌人，不时地和敌人隔江射击着；我们的心，却早已飞到了遵义。大家是多么希望能早日了解到会议

的主要精神啊！

上午，全团的排以上干部集合在江边村子的一所院落里。大家听说要传达中央会议的精神，二个个眉开眼笑，喜气洋洋，互相问好，交谈，说笑。宽敞的院落里，洒满了和煦的阳光，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宣布开会了，会场里马上安静下来。董振堂同志慢慢站起身来，扫视一下全场，声音宏亮地说：“同志们！报告大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咱们了！”

“毛主席又回来领导咱们了！”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一个同志激动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同志们抑制不住无比喜悦的心情，一齐高声欢呼起来。掌声和欢呼声，象阵阵春雷，盖住了乌江的浪涛声。

我看着同志们一张张笑脸，内心非常激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红军战士日夜想念您呀！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战斗中，在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的漫长征途上，我们多少次思念着您，多少次盼望能听到您的声音，是多么希望您来指挥我们战斗啊！当我们过了湘江，眼看要钻进蒋介石布下的口袋阵的时候，是您的英明主张，才改变进军方向，挽救了我们红军的啊！今天，您又回到中央的领导岗位；从此，红军将在您的领导下向胜利进军，我们怎么能不欣喜激动呢！

过了好大一阵，董振堂同志见大家激动的情绪稍稍平静以后，才开始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

他说：“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敌人采取了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紧缩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这种情况下，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分，各个击破敌人，最后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对呀！”我一边听，一边心里说，“就象过去几次反‘围剿’毛主席指挥的那样打就好了。”

“然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说什么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采取了冒险主义的做法，以阵地战代替运动战，以消耗战代替歼灭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样一来，敌人的堡垒主义战略战术得逞了，我们的主力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最后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停了一会，董振堂同志又气愤地继续说，“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左倾路线领导者又把突围变成了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

这时，会场里有人小声地嘀咕：“可不是么，那时我们也悄悄议论过，红军要到哪里去？任务是什么？就是不明确呀。

“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就不可能进一步激发我们每个”红军战士的战斗热情和革命积极性。”董振堂同志眉头一皱，神情十分严肃，接着又说，“庞大的后方机关，大批的辎重物资，也给行军、作战带来极大的困难，使战斗部队几乎都成了掩护队，到处被动地打掩护，无法主动地消灭敌人，反而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由于部队得不到片刻休息，以致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时牺牲的许多战友，想起了被敌人截在湘江东岸的三十四师的同志们，想起了兴国师和瑞金师抬机器的阶级兄弟，以及顺山叔在老山界关于他如何掉队的那一席话想起这些，我不由深深感到“左”倾路线真是坑人，给革命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啊！

“同志们我们红军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带来的，是左倾路线领导者排斥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而造成的严重恶果！”

董振堂同志越说越激动，越说越愤慨。他的激愤情绪感染了大家，同志们这时有的圆睁两眼，有的紧握双拳，也都对这条使我们吃尽苦头的错误路线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随后，董振堂同志以极其坚定的语调说：“同志们！现在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周副主席号召我们，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一周围，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这次会议，

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以及二、六军团的胜利相配合，眼前的困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说到这里，他突然把手一扬，提高嗓音，信心百倍地说，“中国革命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我们誓北上抗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一定能够胜利前进！”

董振党同志的这些话，铿锵有力，扣人心弦。随着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我们心里越来越亮堂，长期以来思想上的疙瘩终于解开了。我们似乎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航船，由于毛主席掌舵，又拨正了航向，看清了航线，正乘风破浪，穿过迷雾，绕过暗礁，朝着光辉灿烂的明天胜利前进！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响亮的口号声，再一次震荡着乌江边的这座山村，在峡谷里激起巨大的回响，一直传得很远、很远

开完干部会，大家回去后立即把遵义会议的主一精神向战士们作了传达，连队顿时沉浸在一片喜悦和幸福之中。那天下午，李屏仁同志和我陪着军团长，到各个连队去，只见人人欢欣鼓舞，到处一片欢腾。每个伙食草位都宰了猪，买了酒，象过新年似的热烈庆祝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

最后，我们来到乌江边的阵地上，用望远镜向对岸看去，只见敌人在半山腰的村子迅来来往往，砍竹伐木，搬运东西，似乎在做架桥渡江的准备。我这时心想：几个月来，敌人从江西追到这里，那么猖狂，那么嚣张，现在，我们又有毛主席领导了，你们就等着再尝尝红军的铁拳吧！

二

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之后，我们便离开乌江渡口，经过遵义、桐梓，于二月间到达赤水附近。当时，中央红军原打算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由于敌人在长江两岸集结重兵，阻我北上，毛主席英明果断地决定放弃渡江的计划，挥师向东，在太平渡、二郎滩再渡赤水河，重新向敌人防守力量空虚的贵州进军。为了配合主力部队这一行动，我们团奉命南下，走了两天，赶到官渡河以南四五十里处待命。

一天下午，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际春同志带着军团首长的命令，来到我们团。他一到达，便要我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准备阻击从北面来的敌人。他还带来一部电台，供我们享接同军团、军委联系。

傍晚，在会团排以上干部会上，张际春同志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同志们！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第一次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我们要以运动防御的方法，阻击敌人，把它们引向东北的良村、温水一带。只要拖住敌人五天，就能保证主力部队迅速南下，重占桐梓、遵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相信，三十七团全体指战员一定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特长，打好这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

他的话简短有力，同志们听了十分振奋。

会后，部队连夜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团侦察排在排长王志雄同志带领下，出发到官渡河方向进行侦察。我们又留下各营营长、教导员，研究了战斗布署。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张际春同志和政治处主任张南生同志带着我们团的一个连队，先到良村一带打土窠、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去了。

一切布置就绪，已是深夜十点多钟，我们没有丝毫倦怠。李屏仁同志提议到阵地上去看看，我和孟焕电参谋长都非常赞同，说着，就离开了团部。

这是贵州地区少有的明月之夜。月光下，山影重重，树木森森，到处是一片叮叮当当构筑工事的声音。李屏仁同志拖着负过伤的左腿，在山路

上吃力地走着，我和孟参谋长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几次劝他回去休息，他都不肯。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坡时，他用手杖指阵地前面一条小村，兴致勃勃地说：“你们看，我们靠山临水摆下这个阵地，怎么样？”

我笑着说：“我看很好，敌人不来便罢，来了就自钻口袋！”

“哈哈！毛主席指挥了红军，敌人就有钻不完的口袋严他抢过去说着，又爽朗地笑了。

李屏仁同志虽然来三十七团时间不长，但我们很早就认识。他是江西宁武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暴动参加红军，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军事生活，使他一养成了不畏艰苦、豪爽乐观的性格。他来我们团接替王彦一秉同志的工作，正逢遵义会议召开，部队士气高涨，他那爽朗的性子更象是一盆刚添了柴的火，笑声一触即发，几乎整天不断。

我们走到一营一连的阵地附近，老远就听见一营长彭一少背同志大着嗓门呼喊道：“同志们，加油干！今天晚上多流汗，明天打个大胜仗！”

李屏仁同志不由得高兴地说：“彭少青的两条腿真快！一起开的会，这会儿，他又在阵地上干开了。”

我们走过去，见彭营长掉了棉衣，光着头，正在和战士们一起构筑重机枪掩蔽部。他见到我们，连忙放下手里的铁镐，擦了擦脸上的汗，说：“首长检查我们的工事。”

我们看了一下工事，李屏仁同志点点头说：“好！前面的射界很宽阔，明天敌人一来，就在河坝上点它的名。”他又用手比划着，告诉彭营长还要加厚胸墙，作好伪装，这样才能减少伤亡。

我们又顺着交通沟向前沿走去，见一班的阵地上有几个战士正在用树枝伪装，李屏仁同志问道：“你们的班长呢？”

“有！”战士中跑出一个人来，朝我们敬了个礼，精神饱满地站着。

“你们班负责哪个地段？”

“封锁前面那条河坝，等敌人冲到河坝这头，我们就狠揍，叫它有来无回！”他回答得非常干脆。

“好！很正确。明天要节约子弹，守住阵地！”李屏仁同志赞许地说。

“首长放心。班长领着我们都讨论了，这是我们遵义会议后的头一仗，保证打个漂亮的旁边一个小个子战士说。

我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笑笑说：“同志，你说得很对，我们要打胜仗向毛主席报喜！”

我们检查了各连的阵地，清楚地看到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部队士气大振，斗志旺盛，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回到驻地已是半夜，李屏仁同志从墙上拿下装满酒的军用水一壶，笑着说：“我这个毛病哪天才能改呀。”

我递给他一只杯子，笑道：“喝就喝点吧，预祝明天的胜利！”

次日拂晓，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星星，山林逐渐显出清晰的轮廓。侦察排在前面和敌人打响了。他们且战且退，一个营的敌人紧紧尾随而来。

“好！敌人上钩啦！”李屏仁同志站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了望着，大声地说。

过了一阵，天已大亮，前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侦察排的同志顺着田间小路，迅速撤过了河，回到自己的阵地上。接着，敌人分成两路，跑步赶来了。敌人接近河坝时，军官一吹哨子，那些士兵就象一群被赶着的鸭子似的往前拥，少数敌人已冲到河坝这头。李屏仁同志拿起电话筒，喊了一声“打”，正面和侧面的枪声突然爆发，手榴弹在敌群中炸起团团白烟。敌人遭到迎击，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掉头就逃。这时，我前沿阵地的指挥员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枪向敌人冲去，到处是一片震天动地的喊杀声。

“好！出击得正是时候！”李屏仁同志举着望远镜，瞄着最前面的两个战士，大声地说，“你们看，那两个战士多勇敢，简直是两只小老虎，跑得多快，和敌人拼上了！拼倒两个敌人”

“看到了，看到了，”我高兴地点点头，说，“那不是一连的一班长和他们班的一个战士么。”

当敌人的先头连大部分被消灭在河坝上时，李屏仁同一在指挥，呆不

住了，他一边朝外走，一边说：“好，这条鱼钓得好！老谢，上前面看看去。”

我们来到一连的前沿阵地。阵地上，弥漫着浓面硝烟，战士们正在擦拭武器，热烈地谈论着刚才的战斗，一见到我们，都站起身来。连长跑过来作了报告。

“你们打得好哇！一班长，你拼死几个敌人？”李屏仁同志大声问道。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一班长身上。一班长却不好意思起来，头一低，脸涨得通红。我们真没想到，这个战场上的小老虎，此刻竟腼腆得象个姑娘，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时，那个小个子战士替班长回答说：“咱们班长拼倒四个敌人。最后一个家伙真狡猾，从侧面向班长扑过来，我吃了一惊，心想，班长危险！可咱们班长早看在眼里，猛一闪身，叫那个家伙跌了个狗吃屎，摔出去一丈多远。那家伙刚要爬起来逃命，班长上去就是一刺刀，把他给报销啦！”

他说得大家都笑了。

李屏仁同志点点头，说：“对，打仗就要这样，要有勇，有谋，要压倒敌人，又要机智灵活，这样才能战胜敌人。”说完，又嘱咐连长，要大家抓紧时间修整工事，准备迎接更大的战争。

中午，敌人大批后续部队上来了。没过多久，接连组织了两次进攻，但除了在河坝上增加不少尸体外，什么也没有捞到。后来，他们便和我们隔河对峙，互相射击。

打到黄昏，我们还不清楚对面的敌人是什么部队，到底有多少人？李屏仁同志便对侦察排长王志雄同志说：“你们去捉个舌头来。”不到一个小时，侦察排就把“舌头”送来了。一问，才知道敌人是四川军阀刘湘的教导师，一共三个旅，九个团。大家听了非常高兴，都说：“好啊！我们把牛岛子牵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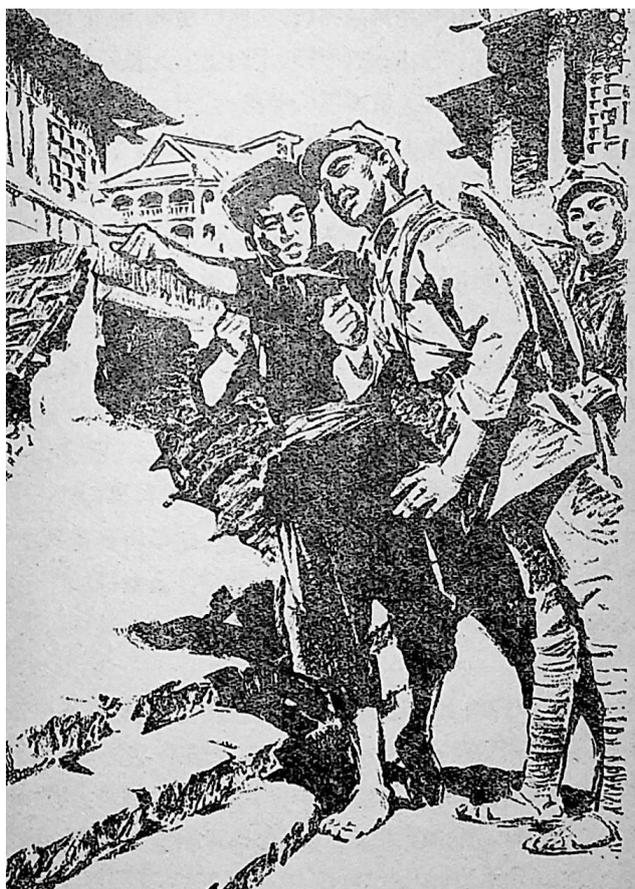
敌人白天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夜晚便分兵两路，点起火把爬山，企图从两翼迂回包围我们。我们站在阵地上，见敌人的火把好象几条火蛇，

在山林间曲折蠕动，前进的方向非常明显。李屏仁同志又爽朗地笑了”说：“哈哈，打仗不行，演戏倒挺卖力气，赏银二百五啊！”说完，就指挥部队撤出阵地，向第二线转移了。

敌人爬了一夜山路，以为这下可把主力红军包围住了，但天明合围时，却不见红军的影子，扑了一个空，只得又赶忙向东北方向追来。而我们已在二十里外的第二线，构筑好野战工事，吃饱了，睡足了，正耐着性子等候他们呢。第三天，仍然如此，敌人又跟进二十里。

就这样，在这几十里的山地里，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和刘湘教导师边走边打，牵着敌人的鼻子往东北方向拉。这时，张际春和张南生同志带着我们团的先行连队，沿着山路，正向良村一带开进；而红军主力部队已取道九里十三弯，昼夜兼程，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了。

张际春和张南生同志带着队伍在山路上前进着。一路上，他们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发动大家起来革命，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沿途的许多贫苦农民，穿着补丁补丁的衣服，打鞋赤脚，背着背篓，也都主动地跟着他们这支红军小分队来打土豪、分粮食。其中有一个高个子青年，边走边对张际春同志说：“红军，我是干人，我们村就在前面，那里有地主，你们跟我去吧！”



“是不是大地主？”张际春同志问。

“咋不是大地主？是个大恶霸地主，还当保长，老百姓都恨透他了。我在他家当过长工，他家的粮食藏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我领你们去。”

当张际春同志同意由他带路时，他高兴极了，把背上的背篓往上提了提，步子跨得更大。一路上，那个高个子青年问了许多问题：红军怎么和王家的人不一样？什么人才能当红军？我当红军你们收不收？张际春同志都耐心地一一向他作了解释，并且问他：“红军天天要行军打仗，你能吃得了苦吗？”

“苦？再苦还能比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只要不受绅粮的气，我多苦也不怕！”他回答得十分坚决。

“你叫什么名字？”

“叫刘德山。”

说着说着，他们进村了。村里那家地主门户紧闭，人早已逃走一空。张际春等同志便决定先在地主院里召开个群众大会。这时，那个高个子青年跑得更欢，到处招呼大家来开会，听红军宣传革命道理，分地主的粮食。不一会儿，院子里站满了人，张际春同志一看，都是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贫苦农民，于是便叫连指导员向大家宣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

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而奋斗！

红军所到之地，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对工人主张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钱；对农民主张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地主乡绅的压迫；对于白军士兵欢迎他们拖枪来当红军，参加工农革命；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食由营业欢迎工农群众报名当红军，帮助红军运输，抬担架，谋工农群众的彻底解放。

连指导员一边宣读布告，一边进行讲解。会场上鸦雀无声，群众个个听得入神。一些老年人不断地点头，表示赞同；青年人更是眉开眼笑，兴

高彩烈。当读到“欢迎工农群众报名当红军”时，那个高个青年突然大声地说：“红军是咱们干人的队伍，专打地主家的人，专打地主豪绅，我报名当红军！”他的话音刚落，群众就嚷了起来：

“好哇，小伙子，当红军打‘王家的人去！

“我也去！”

“我也去当红军！”

当场，就有十多个青年人报名。会场上情绪活跃，气氛热烈，群众和我们的心很快就贴到一起了。

接着，战士们把地主家的粮仓打开，把稻谷分给群众。张际春同志趁机又对大家说：“这些粮食是从哪里来的？那些地主肩不挑，手不提，冬围火炉夏打扇，成天盘算剥削咱们干人。这粮食是咱们干人一年到头面对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呀！我们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要打这些骑在咱们干人身上的地主豪绅，为咱们干人求解放！天下的干人都过上好日子。你们拥护不拥护？”

“拥护！”“拥护！”群众异口同声地喊着，有的热烈鼓掌，有的欢呼雀跃。随后，村子里又唱起了这首歌谣：

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

由军到，干人叫，绅粮笑；

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兄弟拖枪炮，

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

在三天时间里，他们一连打了三家大土豪，使几百户贫苦农民不仅分到粮食、衣服、盐巴，而且受到党的教育，先后有三十多个青年参加了红军。三天后，我们团到达良村一带，和他们会合。同志们看到我们从江西出发以来，第一次补充新兵，无论干部、战士，都打心眼儿里高兴，许多班排就在阵地上举行了欢迎会。张际春和张南生同志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经过，李屏仁同志听了感触很深地说：

“报春的燕子飞来了，这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个春天啊！”

三

第五天，我们终于把刘湘教导师这头野牛牵到了温水。可也就在这时，敌人突然发现五天来同他们周旋的并不是什么红军主力，仅仅是一个团的部队。这条野牛被激怒了，向我团阵地发起了一阵猛烈的攻击，而我们打得更加顽强，使敌人遭到迎头痛击。敌人奈何不了我们，只得在当天下午悄悄地撤出阵地，又从原路退回，追赶我军主力去了。

我军主力这时在哪里呢？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英勇的一、三军团早已南下桐梓，一路穷追猛打，在娄山关和遵义歼灭了敌人两个多师，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捷报传来，我们的阵地上一片欢腾。同志们高兴地说：毛主席指挥真英明，原来我们在这里“牵牛”兄弟部队在那里“宰猪呢！”

这时，军委又打来电报说：你团已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应立即南下，迅速归队。我们当时作了研究，为了避免在路上与敌人过多地纠缠，决定走小路，迂回经桐梓归队。

阴沉沉的天空，飘着牛毛细雨。队伍冒着雨在山间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前进。走着走着，大家的棉衣渐渐地全都湿透，水渍渍的裹在身上，又冷又重，脚下更是泞滑难行，特别是上了黄泥路，泥巴又烂又粘，很多人一脚下去，再提起来草鞋底就掉了，只好光着脚丫子继续朝前迈。经过一个村子时，有几个贵州新战士从老乡的草堆上抓了几把稻草，一边走路一边搓着草绳，而后把它缠在脚板上，笑嘻嘻地说：“这就是我们贵州的草鞋。”

天渐渐暗下来，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大家走了九十多里山路，又累又饿，本来应该宿营休息，但是我们的北面东面西边都有敌人，在这里宿营是危险的！于是，我们只停在一个河坝上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前进了。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听得山上呼呼的松涛声，沟里哗哗的流水声，路

上噼噼啪啪的脚步声，间或有人滑倒的声音。我和团通信排走在一起。黑暗里，听见通信排长王玉山和新战士刘德山一边走路，一边小声地说着话。

“怎么样，能走吧？”王玉山的声音。

“能走，摔两跤也不怕。排长，枪不会摔坏吧？”刘德山的声音。

“你注意点。来，枪给我背王玉山说。

“不，我自己能背。”刘德山回答。

“白天你们几个贵州的新同志那种做法可不好你！（要知道，不请假就跑出队伍，是不对的，大家都象你们这样，就不成个部队了。再说，随便拿老乡的东西，是违犯群众纪律的哟。”

“就一把稻草嘛！”刘德山申辩说。

“一把稻草也不行。红军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给你讲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这毛主席给我们红军制订的革命纪律，任何人都不得违犯。你是个新同志，还不大懂，以后可要注意啊！”

“好，我以后注意”可话没有说完，“啪”的一声，刘：德山又滑倒了。

王玉山扶起刘德山，说：“来，你拉着我的背包带，我走你也走，我停你也停，这样就不会跌倒了。夜行军是一种本事，多走几次就惯了，我也是摔出来的，不要怕。咱们团长的腿负过伤，还一样和大家走路，不怕摔跤哩。”

听着他们的谈话，我感到十分欣慰，心里想：多好的战士啊！自觉地克服困难，遵守纪律，是我们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似乎看到，个头高大的新战士刘德山，正紧紧拉着前面排长的背包带，一步不拉地走着，他的步子越跨越大，越迈越稳。

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条小河边，已是下半夜。许多人一边走路，一边打起瞌睡来。于是，我们停下来，又休息了一会儿。同志们就着河里的冷水吃些炒米，有的不炒就抓把生米吃。不少人的腿肿了，张南生同志正好背了一壶酒，就用酒给这些同志擦腿，不一会儿，一壶酒就擦得一滴不剩了。

拂晓前，我们终于抢在敌人前面，赶到石牛栏。一天一夜，在风雨交加的山路上行走一百四十里，战士们的脸上、身上都是泥巴，疲倦得很，但眼看要和主力部队会合，一个个兴致勃勃，有说有笑，叽叽呱呱地议论开来。

“这次行军跌跤的可不少呀，路实在是太难走了。不过，想起主力部队打的胜仗，这路走得值得，再来回走几趟也乐意！”

“走大路，走小路，为的是消灭敌人；走弯路，走远路，为的是革命胜利。离是一点也不错！要不，咱们能又牵牛又宰猪吗？”

“你们叽里呱啦快要把满镇子的人都吵醒了，可敌人现在还在后头睡大觉哩！”

上午，我们正在石牛栏休息，北边突然响起了枪声。原来是敌人的一支队伍从松坎顺着川黔公路南下，走到盘山公路时，遭到我北面警戒部队的抗击。那里公路缠住高山，曲折蜿蜒，拐来拐去，地形非常险峻，加上雨云弥漫，烟雾笼罩，在几十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楚。敌人挨了揍以后，简直成了瞎子，摸不着头脑，再也不敢冒进了。我们的警戒部队虽然兵力很少，但凭着有利地形，同敌人捉迷藏似地这里敲敲，那里打打，打得敌人蒙头转向，十分狼狈。就在那个地段，警戒部队同敌人整整磨了五六个小时，而我们团的大部队早已南下。

下午两三点钟，我们正沿着公路往桐梓方向前进，突然接到情报说，前面桐梓被从近路插过去的敌人占领，南下的路已被截断。怎么办？我们便停下来，向当地群众请教。不一会儿，终于打听到有一条小路可通娄山关以南的板桥，只有六十里路。我们判断，敌人虽已占领桐梓，但夜晚他是不敢前进的，我们今夜赶到板桥，一定可以摆脱敌人，胜利归队。

于是，我们又踏上泥泞的山路，开始了急行军。天渐渐黑了，又下起毛毛雨，为了加快行军速度，我们干脆打起火把走路。可是走不多久，雨越下越大，火把被雨水淋灭，大家只得再摸着黑走。下半夜，雨总算住了，山路仍然很滑。这时队伍里不时有宣传员进行鼓动工作：

“同志们，加油啊！兄弟部队已经追到乌江边上了，我们走慢了，就赶不上参加战斗啦！”

快走啊！赶上前去，消灭王家烈的“双枪兵！”

有个同志大笑着说：“缴了步枪、机枪能打仗，缴了大烟枪有什么用？”

有人接过话茬：“你不用愁，王家烈的兵你喊，交枪不杀，他就喊‘烟枪留下’”

接着就是一阵哄笑。在这样愉快气氛中，行军的速度加快了。天将明时，我们赶到了板桥。

在一个大坪子上，部队停下休息。云迷雾散，一轮红日从东方徐徐升起，染红了远近的山峦、树林，也染红了战士们一张张笑脸。各连的文艺骨干在指挥着拉歌子、唱歌，部队的情绪十分活跃。

大家正在闹闹嚷嚷的时候，不知谁叫了一声：“军团长来啦！三十九团来啦！”

我们抬头一看，只见南边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开来一支队伍，身材魁梧的董振堂军团长和三十九团的董团长，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李屏仁同志马上通知全团集合，迎接军团首长和兄弟部队。

军团长走近了，张际春同志、李屏仁同志和我一齐迎上前去。李屏仁同志向军团长敬了个礼，报告说：“三十七团完成任务，全部回来了。”

“好啊，你们回来啦！部队的伤亡大不大？”军团长关切地问道。

“几天来有一名排长牺牲，一名战士负伤，五名新战士掉队，却补充了三十多名新战士。”李屏仁同志回答说。

军团长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走到大坪子上，脱下军帽，擦去额上的汗水，双手叉着腰，看着面前整齐威武的队伍，满意地笑了。过了一会，他手一扬，大声地说：“同志们！大家辛苦啦！这次你们打得很好，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在你们牵制敌人的时候，主力部队重占了娄山关和遵义，消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把残余敌人赶过了乌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充分证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挥我们红军的特长，就能处

处主动，就能打胜仗。让我们紧跟毛，主席，继续前进吧！”说完，军团长在全团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向我们交代了继续南进的任务，就带着三十九团往娄山关方向去了。

部队又向南开进。同志们满怀战斗的豪情、胜利的喜悦，唱着红军歌曲，昂首阔步地前进在通往遵义的大路上。这时，我们接到军委发来的电报，大意是：你们正确执行了，遵义会议确定的以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一个团吸引住敌人九个团，以极小的代价换得重大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重占桐梓、遵义的战略行动，军委特予表扬！接到这封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我们全团指战员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的啊！

五 北渡金沙

—

四渡赤水以后，敌人把兵力都集中到贵阳附近来了。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却向贵阳虚晃一枪，趁滇军入黔，云南空虚之际，突然甩开敌人，大踏步地向云南前进，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敌人阻拦。

连日来，我们夜行晓宿，一天不是八十里，就是一百里，真象插上翅膀一般。同志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一次，我一边行军，一边问一个战士：“怎么样，大家对天天走路有什么意见？”

那个战士笑笑，说：“红军战士不怕打仗，就怕打不上；不怕走路，就怕走冤枉路。”

“不过，如今冤枉路全都让给敌人走去了，是不是？”我接过他的话头，笑道。

“是的，我们再也不会走湘江和老山界的老路了！”他边走边说，不时地转过头来看看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遵义会议之前，部队到处被动挨行自胃那种情况，如今再也不会出现了，便朝他点了点头，说道：“可我们要北上抗日，路还远着哩，你这两条腿能吃得消吗？”

那个战士回答说：“要在几个月前，说不定我也早就培了，那时心里没有底呀！如今有毛主席领导，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浑身都是劲，就是走到天边，也没有什么吃不消的！”说着，他注视着前方，步子迈得更大、更快。

我们一进入云南，所见到的景色和贵州截然不同。满山是树木、鲜花，尤其是那盛开的茶花，一团团，一簇簇，火焰般地耀眼。许多村子的周围，长满了高大的芭蕉，叶子翠绿可爱，有些人家的房前还搭了遮阴歇凉的藤

萝架。

“云南老百姓比我们贵州富啊！”行军的时候，一个新战士触景生情地说。

“云南的地主富，你们贵州的地主也不穷呀！要说老百姓，我看都差不多。”一个老战士不同意他的意见。

“这里田地多，出产好嘛！”新战士不很服气。

“那地主、军阀吸穷人的血，一定更加凶狠！”老战士十分肯定地说。

那个老战士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快要到曲靖的时候，接受了“围城三天，让兄弟部队迅速通过”的任务。部队把曲靖围起来后，敌人吓得不敢出城，我们便决定打几家土豪，把周围的群众好好地发动一下。打土奈时，我们就发现这里的地主变着法地搜刮穷人，真是花样繁多，心毒手狠。有一次，我们打开一家土豪的一间屋子，不禁吓了一跳。屋子里黑沉沉的，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火腿，足一百多只。《封神榜》里说纣王为妲己大造过“酒池肉林”，那只不过是故事。这里才真是一片肉的林子哩！李屏仁同志笑着说：“哈哈！这老地主存放了这么多的火腿，专等咱们来吃的吧！”我们仔细一看，发现火腿上都有用毛笔写的字，大都是：某年某月佃户某某进呈。李屏仁同志看了后，气愤地说：“看来，云南的地主一个个都是土皇帝，还要农民进贡呢！”我点了点头，说：“这倒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材料，它说明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封建剥削到处都是一样残酷。应该让战士们也来看看。”李屏仁同志非常同意，于是便让团政治处通知各连，派代表来参观。正好那个认为“云南百姓富”的新战士也来了，他一边参观，一边说：“哟！这里的地主老财们真的是比阎王老子还厉害呀！有了这班杂种，穷人还能有好日子过？”同志们看了以后，也都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消灭狗地主，推翻吃人的剥削制度，天下的工农才能得解放！”

就在我们包围曲靖的时候，兄弟部队浩浩荡荡地顺着曲昆公路向昆明挺进。第二天，李屏仁同志从军团部回来，一到就笑得合不拢嘴。我问：“什么事把你乐得这个样子他似答非答地笑道：“敌人准是乱套啦！”

“怎么啦？”我更觉得莫名其妙。

原来是这么回事：昨天我们包围曲靖以后，先头部队向西走了二十余里，迎面驶来一辆国民党的军用汽车，战士们上去把它截住，车门一开，从汽车里大模大样地爬出一个敌人军官，两眼一瞪，刚要发作，早有几支枪对准他的胸膛：“不准动！举起手来！”敌人军官一看情况不对，顿时吓得脸色发白，两腿发软，几乎瘫在地上。原来此人是薛岳派到昆明去见龙云的一个随从副官。他刚见到龙云，薛岳又打电报！二给龙云，说是没有云南的军用地图，请龙云尽快派人送去。于是龙云趁这个副官要往回返，把薛岳所要的一切东西交给了他，托他带回。可是这个副官做梦也没想到在路上会遇到红军。我们的战士往汽车里一看，果然，放有云南军用地图，还有大批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和普洱名茶。这些礼，我们当然都不客气地收下了！

李屏仁同志讲完这件事情的经过，笑着说：“哈哈！这真是无巧不成书！三国时候刘备进川，有张松献地图，如今！红军龙云也乘献地图了。”

这时龙云在昆明城里，正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半个月前，他把滇军主力调去增援贵阳，后方十分空虚。如今，红军突然入滇，接连攻破了霏益、马龙、寻甸、嵩明等城，先头部队离昆明只有三十余里。龙云唯恐我军进攻昆明，抄掉他的老窝，慌忙命令全省的民团集中到昆明城内，加强防守；同时四处告急，央求派兵来援救昆明。

但是，我们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并不是真的要攻打昆明，只不过是为了调动和迷惑敌人，以便寻找机会北渡金沙江。

我们团完成包围曲靖的任务后，又成为全军的后卫，随着大部队日夜兼程向西挺进。五月一日，我们赶到团街附近。那天下午，天空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丝风，太阳象一团火似的烤人。大伙正走得唇干舌燥，汗流浹背，突然发现前面路旁山坡上有一座鼓动棚。走近一看，只见军团部的六七个宣传队员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嘴对着喇叭筒大声喊道：

“同志们！好清息，好消息！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干部团在早晨

枪渡金沙江成功了！”

“干部团已经抢渡金沙江了！”这消息飞快地向后面传去。大家听了，就象一段清凉的泉水流到了自己的心坎里，觉得特到舒坦，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红军渡江胜利万岁！”

宣传队员们也都大着嗓门，和大家一齐欢呼着。正在这时，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同志走了过来，一个宣传队员喜不自禁，笑着喊道，“参谋长，你好！”

陈伯钧同志一边笑着，一边走上前来答道：“同志辛苦啦！大家这么高兴，你怎么不编个节目拿出来！”

队员伸了伸舌头，但仍嘻嘻笑着：“我也太高兴啦，只顾凑热闹，什么每忘了。”

陈伯钧同志却认真的说：“你们应该随时随地做好宣传工作嘛！”

部队继续前进着。当天晚上，我们到达离江边九十余里的石板河，接到军团首长的命令：就地选择阵地，构筑工事，准备阻击尾随敌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二

石板河，是昆明经绞车渡通向四川的驿道上的一个小镇。镇子里有十几户人家、两家客栈和几家铺子，房屋都是用石头垒的墙，石板盖的顶，坚固而美观。镇子的北面靠着山。南面有一条小河，把驿道割断了。河上没有桥，只有一些石头砌的台阶，人马车辆要过河就得涉水。同志们说：“石板河，有河没有桥，只有一片石板房啊。”

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我们团在石板河南面，沿着河岸构筑起工事来。

我和李屏仁同志来到一营阵地检查工事的构筑情况，遇见了营长彭少

青同志。没等我们开口，他就先开了腔：“我们这次的阵地又是靠山临水，和在黔北打刘湘教导师的情况差不多，看来，又有胜仗打啦！”

“当然罗，仗，我们不打则已，打就要打胜。”李屏仁同志提醒他说，“不过，这次任务不同啊，可不能大意。”

“对。那时我们是要牵着敌人的鼻子走，牵得越远越好，布的是口袋阵，等敌人钻进来再扎紧口袋嘴消灭它。这次，我们是要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在这里筑上一道铜墙铁壁，敌人要来碰，就叫它碰个头破血流！”彭少青同志一口气说了下来。

李屏仁同志满意地笑了，说：“这些话你向部队讲了没有？要向每个战士讲，让大家清楚地了解这次任务的意义。要告诉同志们：干部团抢占了金沙江渡口，我们一定要在三天三夜之内坚决守住阵地，保证中央纵队渡过江去。”

然而，随着整个战场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们的任务越来越重了。起初，军团首长命令我们：坚守阵地三天三夜。第二天却来了新的命令，要我们坚守六天六夜。第三天，情况又变了，我们的任务不是坚守阵地六天六夜，而是九天九夜了！

“这是怎么回事？”有的同志迷惑不解，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要坚守九天九夜，这担子不轻啊！”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就在五月五日这天，毛主席、党中央特地派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一同志从金沙江北边的会理返回石板河，来传达、解释中央的命令了。

在军团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李富春同志介绍整个渡江的形势时，指着墙上的军用地图说：“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虽然从驿江渡过去了一个团，但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了，不能继续渡江。一军团在龙街渡佯作渡江准备，吸引了不少敌人，加上江面太宽，容易受到敌人飞机的袭击，也不能在那里渡江。如今只有绞车渡一个渡口能够通船。因此，中央决定全军的千军万马，都要从

绞车渡一个口渡过江去！”到这时候，我们才弄明白，原来上级一再加重我们的掩护任务，是这么个情况啊！

李富春同志又指着地图上的绞车渡继续说：“这唯一的渡口，情况又怎样呢？江面有六百余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江心旋涡很多，渡江也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最大的困难还是渡船太少。我们只有七条船，大的能坐三十个人，小的只能坐十一个人。全军几万人马就要靠这七只小船渡江，即使日夜抢渡，也不是一两天或四五天可以渡完的。所以中央考虑，不能不一再加重你们后卫的掩护任务！”

“我们五军团一定坚决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代表大家说。

“是啊，你们的任务的确光荣而且艰巨！”李富春同志看了一下大家，然后又说，“九天九夜——已经过了五天，还有四天四夜，但这也是个不短的时间。你们只有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敌人的兵力可能比你们多几倍。可是同志们必须坚守九天九夜，保证全军胜利渡江。”李富春同志说到这里，突然挥着手，以高昂的语调，大声说道，“毛主席要我转告同志们，中央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希望同志们发扬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顽强战斗精神，为革命建立新的功绩。”

李富春同志讲完话，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站起身来，代表五军团再一次表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并对大家说：“北面就是金沙江，南面就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作战，任务完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大家回去告部队，一定要坚决守住阵地，人在阵地在，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证党中央和全军胜利渡江！”

回到阵地，我们立即向部队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以及军团首长的决心。战士们明白了当前任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又知道了毛主席派李富春同志亲临前线来作战斗动员，战斗情绪空前高涨。决心书、保证书象雪片似地飞向团部。一致表示：“坚决守住阵地，坚决完成任务！”“不要说再守四天四夜，就是再加十天十夜也守得住！”

当天傍晚，李富春同志在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同志陪同下，来到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到一连的时候，见几个战士正坐在工事里小声地唱着什么，李富春同志便走过去，笑着问道：“你们在唱什么呀？”

战士们唰地一下站起来，其中一个答道：“首长，我们正在学歌哩！”

“学什么歌？唱给我们听听好吗？”董振堂同志说。

“我们还没有学会呢。”战士们说是这么说，可是还是迅速站成一排，满怀战斗豪情，高声地唱了起来：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
常胜的红军来渡江，
不怕水深河流急，
不怡山高路又长。
渡过金沙江，
打倒狗刘湘，
消灭反动派，
北上打东洋。

李富春同志听了后，点点头说：“这个歌很好，我们红军就是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阻挡不住，一定要渡过江去，要北上抗日，要胜利到达自己的目的地。”

一个战士大概猜到了这位由军团领导陪同的首长就是毛主席派来的代表，便赶紧说：“请首长转告毛主席，转告党中央：我们保证完成战斗任务，要唱着这支歌消灭来犯的敌人！”

“好，我一定转达同志们的决心。”李富春同志还讲了一些勉励大家的话。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满面笑容，眼睛里闪耀着兴奋而幸福的光芒。

三

一天上午，敌人突然一个劲地打炮。炮弹象雨点似的落在我阵地附近，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阵地上火光闪闪，浓烟滚滚，硝烟味直呛鼻子。

战士们蹲在战壕的猫耳洞里，根本不理睬它。等炮火，同志们一跃而起，眼盯着冲上来的敌人，枪口随着敌地移动，直到一群群敌人接近我前沿阵地时，指挥员然同时开火。大家一边射击，一边高呼：“扣天盖地向的时候到了。”瞬间，子弹、手榴弹铺也进不得退也退得敌人鬼哭狼嚎，纷纷肌在地上，冲锋号趁这时机，来了个反冲击。齐喊“杀”，跳出战壕，冲过前面的小河，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一看这阵势，什么也顾不得了，夹着尾巴掉头就跑。来不及逃的，赶紧举枪投降；少数顽抗的，身上不是中了子弹，就是挨了刺刀，横倒在驿道两边的野地里

反冲击结束后，各连都缴获了不少枪支，还抓回来一些俘虏。当时，二营有三个战士，押着两个俘虏，往回走的时候，每人身上还背了两三支步枪，简直心里乐开了花。回到阵地上，一个战士见俘虏哆哆嗦嗦地站着，便往石头上一坐，学着连长审问俘虏的口气，厉声问道：“过来！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长官，我们是十三师的。”一个俘虏点头哈腰地回答说。

“什么！你们怎么是十三师的？你们是冒充十三师的！”那个战士几乎吼叫起来。

俘虏吓坏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说到十三师，这位“长官”如此恼怒，连忙说：“我不敢说慌，是十三师的，师长叫万耀煌。”

那个战士原来以为敌人是冒充红军，因为我们原是红五军团十三师，他没有想到敌人的番号也是十三师。这时另一个战士在旁边忍不住笑了，说：“哈哈，红军的十三师遇上了白军的十三师，这真是‘冤家路窄呀！’”

那个战士忍住笑，继续对俘虏训道：“管你十三师也好，十四师也好，统统是我们红军的手下败将。连你们的总头头蒋介石，也得乖乖地听从我

们毛主席的指挥。我们牵着他的鼻子，叫他朝东，他不敢朝西；叫他向南，他不敢往北你们给他卖命，有什么好下场！”

两个俘虏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是！不我们不愿给他卖命”

俘虏被带走以后，战士们都捧腹大笑起来。从此，红军十三师南白军十三师的故事，就在部队里传开了。

敌人挨了这顿揍以后，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冒冒失失地向我阵地进攻了。但他们并没有死心，连夜在小河那边构筑起工事来，和我们对峙着。

从此，我们与敌人隔着石板河南边的这条小河，不时地互相射击着。金沙江边也不断传来鼓舞人心的消息：“中央纵队已经渡过江了。”“三军团已经渡过江了。”“一军团正在过江。”“一军团已经过完。我们五军团也开始过江了。”

一天傍晚，我来到前沿阵地，向敌人那边了望，只见黑乎乎一片，敌人的阵地死气沉沉。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阵地：哨兵警惕地守卫着，战士们有的修整战壕，有的擦拭武器，有的说着笑着，到处生气勃勃，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这时，不知是谁又唱起了红军来渡金沙江的歌子，很多人也都应和着唱了起来。这嘹亮的歌声，使我又想起几天前同志们向毛主席、党中央表达的决心。我感到无比振奋，心里说“我们不正是唱着这支歌消灭了来犯的敌人吗？”

第八天的早晨，军团部、二十九团开始向金沙江边移动，阵地上只留下我们团。敌人却越来越多，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云集山前，形势十分逼人。但是同志们都很沉着，准备着给敌人再来个迎头痛击。可是下午，我们突然接到军团首长的命令：撤出阵地迅速过江。紧接着，军团侦察连来到我们阵地接了防。这时，李屏仁同志以蔑视的目光瞥了瞥对面的敌人，随后转向我，兴奋地说：“哈哈，胜利啦，我们又胜利啦。”

不一会儿，各连陆续撤出阵地，通过石板河，顺着高低不平的驿道，展开了一场急行军。没走多久，天色突然昏暗下来。我们抬头一看，只见山后涌起大块乌云，迅速遮住了蓝天。瞬时，狂风大作，树林摇动，一道道

闪电划破云层，隆隆的雷声在山谷中回荡。接着，暴雨瓢泼似地倾泻下来。但是我们的队伍没有停留。大家顶着狂风暴雨，踏着泥泞的驿道，继续前进。

一口气走了四十余里，往前下山就是江边了。天色越来越暗，雨仍下个不停。我和李屏仁同志正走着，看见路旁有一座关圣庙，他朝那儿唠唠嘴，对我说：“怎么样，一起去喝点水。”

“行！”我说着，便和他一起跨进庙门。

一个老香火迎上前来，客气地招呼道：“红军先生，请坐请坐！”他看我们浑身上下水淋淋的，站了一刻地下就是一洼水，又说，“雨好大哇，这样的天气不能走路呀！”

“老大爷，有开水吗？”李屏仁同志问。

“有有有！”他忙哼身进里屋张罗开水去了。

我们坐下来，瞅瞅四周，整个大殿黑沉沉的，可是前面部队贴在几根粗圆柱上的“打土豪分田地”、“买卖要公平”等标语，却十分醒目。

“老大爷，到江边还有多少路？道好走吗？”我问道。

“这里到江边整五十里，道可不好走，下山路窄、坡陡路上尽是碎卵石，平时走都得带手杖哩！”他一边倒水，一边又感慨地说，“这几天来，我看你们成千上万的马从这里！经过到江那边去，真是了不起啊！”

“为什么？”我又问了一句。

“你们可知道，这条金沙江，古时候叫泸水，”他看了看我们，“三国时诸葛孔明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就是渡金沙江到云南地界来的。那时蜀将马岱带兵二千，涉水的时候中了毒，一下子就死了一千五！如今你们这么多人能平平安安地渡过江去，真是不容易哩！”

李屏仁同志见这老人很健谈，高兴地说：“老大爷，三国时候只有一个诸葛亮，我们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千万个诸葛亮嘛！”

“就是，就是，你们红军里面有能人！”老大爷不住地点头，又指着柱子上的标语说，“这些话，虽都只有几个字，可句句都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

里了！”

外面的雨仍哗哗地下个不停，我的喝了两碗热开水，顿时觉得暖和多了。我们要付开水钱，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便指着柱子上“买卖要公平”那条标语说：“这是红军的规矩，你要是硬不肯收，我们就犯纪律了。”他这勉强收下。

从这里到江边，果然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加上雨路滑，十分难走。很多人都摔了跤，李屏仁同志就跌倒了多次。他那两只手被锋利的石子划出一道道血口，血和雨水顺着手指一起往下流。但是，他毫不在乎，仍然嘻嘻地笑着说：“下吧！这样大的雨，敌人是不敢走路的，等明天天晴他们！赶来，我们已经离开云南，到四川罗。”

我们整整走了一夜，第二天黎明，赶到金沙江边，隐蔽在江边的矮树林里。

乌云消散，雨过天晴，江面上散发着浓重的雾气，滔滔的江水迎着晨曦向东奔流而去。兄弟部队的一些同志正在江边上等着摆渡。渡船一靠岸，战士们便排成一路纵队，秩序井然地上船。船离岸后，梭子般地穿过江面，向对岸驶去。我们远远地望着七只小船你来我往，空船来，满船去，快而不乱，心里十分高兴。

为了组织好这次渡江，李屏仁同志带着营长和连长们到渡口向兄弟部队取经去了。我和张南生同志召集营教导员、连指导员开了个会，布置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对前一段的战斗、行军进行小结，表扬本单位的英雄、模范事迹，学习渡河司令部颁发的《渡河守则》

我们终于开始渡江了。当我坐上渡船，船在波浪里颠簸着向对岸驶去的时候，感到一种由衷的欣喜。我解开军上衣的钮扣，迎着凉爽的晨风，仰望两岸巍峨的高山，俯看洒满阳光的江水，情不自禁地哼起渡金沙的歌曲来。

渡船划到北岸，停靠在陡峭的崖边。我们跳下船来，顺着石阶向上走，到石阶的最顶一层，迎面遇见红军总参谋长、渡河司令刘伯举同志和政委

陈同志。刘伯承同志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很好，掩护全军安全渡过了金沙江，这可是个很大的胜利啊！”他指点着眼前的金沙江，朗朗笑道，“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拦不住咱们红军，咱们全军都安全过来了。”

我们团过江以后，军团侦察连随后也都跟着过来了，江南岸的沙滩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渡河司令部便下令沉船。

说来也巧，我们刚刚凿沉这七条渡船，两架敌机就飞来了。不一会儿，敌机象发现什么目标似的，顺江向渡口轰炸、扫射起来。可这时我们的部队已沿着曲折的山路，向会理方向前进了。有的战士回过头看了看，打趣地说：“真是些不中用的东西，就是欢送，也该早点来呀！”

六 三过雪山

—

我们北渡金沙江之后，在会理休息数日，便跟随大部队继续北上。一路上，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下，斩关夺隘，抢险飞渡，顺利地迎过了彝族区，跨过了大渡河，一九三五年六月到达川西的宝兴县。这时，中央决定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命令我团开赴宝兴以北五十里的盐井坪，掩护中央红军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

盐井坪是个小小的山村，座落在深山谷里，两边都是一二十里高的大山，山上是茂比的原始森林。村子里散布着一片破破烂烂的茅棚和土屋，唯有一座砖瓦房高高地碰立着，特别显眼。

“那准保是地主狗豺狼的。你不用看别的，只要看那黑漆漆的大门就晓得了！”一个战士指着那幢瓦房说。

另一个战士点点头，又指向两边的森林说：“听说，这里面有老虎、豹子、猩猩，经常下山来伤害人畜哩。”

“可不，”我和他们走在一起，感叹地说，“村外有虎豹，村里有豺狼，这里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啊！”

村子里冷冷清清，鸡不鸣，狗不叫，很少有人走动，遇上的几个老人、小孩，也都离得远远的，用惊惧的目光看着我们；而那座瓦房，漆黑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一打听，果然是家地主，可人早已逃走了。我们住下以后，一面在村外构筑工事，一面在村里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战士们帮助老乡扫院、劈柴、担水；团政治处的同志又把那家地主的粮食、衣物拿出来，分给贫苦的农民。很快，老乡们认识到红军和“刘家”的军队不一样，真正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便和我们亲近了。

我们到盐井坪以后不几天，全军的大队人马络绎不绝地经过这里，向夹

金山方向前进。

战士们站在阵地上，眼看着浩浩荡荡向北开去的队伍，红旗招展，军号嘹亮，战马嘶鸣，显示出咱们中央红军的坚强实力，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然而，乡亲们听说我们红军要翻到雪山那边去，很多人都惊愕地摇着头说：“那怎么行？雪山是过不得的。”他们把雪山形容得非常可怕，说雪山是“神山”，山上冰天雪地，鸟兽绝迹，一会儿狂风大作，一会儿大雪纷飞，如果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大雪埋住，就会被狂风卷走。有的老年人说，“常言道，大雪山，大雪山，只见有人上山去，不见有人下山来你们千万不能上去啊！”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天下穷人的解放，莫说是雪山，就是刀山，也要过呀！”我们向乡亲们解释说。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笑着说：“其实，雪山没啥了不起，能过去。”

“是你！”侦察排长王志雄同志一看，这个小伙子原来是他们排的一家房东，平时以打猎为生，兼种地主的几亩地。我们队伍刚来的那阵儿，他整天不说一句话，如今看到我们处处为穷苦百姓着想，帮助乡亲们打土浚，闹翻身，终于开了口。王排长上前握住他粗大的手，高兴地问道：

“你翻过雪山吗？”

“翻过！”

“到时候，你能带我们过去吗？”

他点点头说，行，我给你们带路。说实在的，你们图的啥呀，还不是为了所有的穷人都解放。再说，你们来了给乡亲们做了这么多好事，我不送你们过去，心里也过意不去呀！”

后来，我们依照这个小伙子的建议，买了许多辣椒、大蒜、大葱，准备完成阻击任务后上山时吃，以抵御雪山上的寒气。

中央红军从盐井坪这个深山谷整整过了两天。第三天一大早，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混成第一旅跟踪而来。他们遇上了我们的坚决阻击，龟缩在离

我们阵地一里多地方构筑工事。从此，我们和敌人白天互相射击，夜晚各自修筑工事，彼此对峙着。

大约是战斗的第五天，我们接到军团首长打来的电报的在夹金山那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已胜利会师。你们已经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战士们听到这一消息，个个兴高采烈都说：“翻过大雪山，我们也能见到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了！”

天不亮，我们就从盐井坪出发了。经过七十余里的行军，赶到夹金山下，部队就地宿营。

次日清晨，战士们很早就来。我走出帐篷，抬头向山顶望去，只见白皑皑的一片，积雪在朝阳的照射下，闪耀着刺眼的光芒，夹金山的主峰，象一把铮亮的利剑，直插云霄。“这雪山就是高啊！”团部通信排的一个战士仰望着雪山说。

“是啊，”排长王玉山同志点点头，“今天我们就要从这翻过去！”

另一个战士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向雪山挑战似地说：“雪山呀雪山，你再高，也没有我这根棍子高。”

王玉山同志笑道：“难道你这是孙悟空的金箍棒，要多长就有多长吗？”

那个战士说：“排长，你不相信？那就等着瞧吧！”

吃完早饭，每人喝了一碗辣子汤，就开始爬山了。山上，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棵草，到处是高大的雪岩、峻峭的雪壁、深邃的雪壑，真是一片冰雪世界。山上本来有路，但几万红军通过这里，已经踏出一条弯曲而宽阔的雪路宣传队的几个同志在路边大声地鼓动说：“同志们，我们走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开辟的道路，是通向胜利的道路！大家加油啊！”

我和李屏仁同志跟响导走在队伍的前头。一路上，响导指东指西，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雪山的情况。他说，平时是没有人敢上山的，只有夏天，少数为了赚钱不要命的商人才用牲口驮着花布、茶叶、盐巴进山到藏族地区出售，往回返时再驮上狐皮、鹿茸、麝香等贵重物品，只要不冻死在山上，回来一卖，便大发横财。他还说，在山顶附近，有一座很小的喇嘛庙，

每个上山的人，几乎都要向它许愿，祈求佛爷的保佑，而后才过山。这时，李屏仁同志开玩笑说：“我们也要许愿吗？”

响导笑笑说：“你们大军都是神兵神将，用不着！”

“哈哈！神兵神将，那我就是真人铁拐李罗李屏仁同志挥着手中的拐棍，笑了起来。

越往上爬，气温越低。寒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雪粒打在脸上，象刀割似地疼痛。我们身上穿的都是草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有的同志把毯子裹在身上，也无济于事，仍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特别是一双脚，长时间在冰雪里行走，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帮帮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我问一个战士疼不疼，他说：“起初还有点疼，现在麻木了，也不觉得疼了。”

再往上走，空气更加稀薄，胸口就象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透不过气来，两条腿也象灌了铅似的沉蜚，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化费很大的气力，连着走几步心就跳得格外厉害，甚至头昏目眩，仿佛整个雪山也都晃动起来。李屏仁同志的腿负过伤，平地行军都有些拐，如今爬山更是困难了。他拴着根木棍，一步一喘，一颠一颠地跟着大家往上爬。我见他脸色苍白，便问道：

“老李，怎么样，找两个同志扶你走吧？”

“不要。”他赶紧举起手里的木棍，装出很轻松的样子，

“你看，我有三条腿哩！”可是话音刚落，脚下一滑，就跌了一跤。同志们连忙把他拉起来，他还挣扎着要自己走，然而通信排的两个同志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扶着，把他架走了。

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推着拉着往上爬，与雪山进行着英勇的搏斗。一营长彭少青同志挑着一连炊事班长老刘的那付油盐担子，一步一步往上迈，老刘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跟着，直嚷嚷：“营长，我能挑，给我吧！”

我见他追得气喘吁吁，便说：“老刘，你别追了，这是什么时候呀！”

他也实在赶不动了，只得放慢步子，但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政委，

你别看我年纪大，我能和小伙子抗一阵哩！”

旁边的一个战士笑笑说：“老班长，咱们来比吧？”

老刘并不弱，说：“行啊！你提什么条件？我可不服这个老，但是，一连连长制止了他们的竞赛，说：“你们要比，过了雪山再赛吧！”

快接近山顶时，山势更加险峻。风大，路滑，经常有人跌倒，甚至从雪坡上滚下来。不少同志已精疲力竭，走几步，就呼呼直喘，只想坐下来歇歇。有的说：“我的心快要跳出来了，让我坐一会儿吧！”但是一坐下后，就再也起不来了。‘后来遇到这种情况，旁边的同志总是温和而又严肃地说：

“不能坐，来，我扶着你，慢慢走。”团宣传队的几个同志却仍然很活跃，支撑着疲乏的舟子，用嘶哑的声音不断地喊着鼓动口号：

“同志们，加油！快到山顶了！”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在路的两旁，可以看到一个个隆起的雪堆，我们知道，这里埋着兄弟部队在雪山上倒下去的同志。这些雪堆，使我们感到沉痛，同时又使我们警惕起来，仿佛那些牺牲的战友在对我们说：可不能松劲呀，一定要拿出身上所有的力气，咬紧牙关，坚持到底，战胜这冷酷无情的大雪山！

中午，部队终于登上了山顶。高高的大雪山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战士们欢呼起来。欢呼声响彻冰山雪岭，在山谷间久久地回荡着。通信排的那个战士举起手中的木棍，对王玉山同志大声嚷道：“排长，你看，雪山高，还是我的棍子高呀？”逗得大家都笑了。



我和李屏仁同志并肩站着，举目远眺，只见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四周冰峰笔立，雪山环抱，山谷间云海连缩，云涛汹涌，真象到了神话中的琼玉世界。

“啊！好看极啦！”我情不自禁地赞叹道。

李屏仁同志笑笑说：“这样的奇妙风光，只有历尽千辛万苦的红军战士，才能欣赏到啊！现在的武汉、南京，热得象个大火炉，人们吃着西瓜还出汗呢！”

在山顶走一里多路，经过那座颓败的小喇嘛庙，就开始下山了。下山不象上山那样吃力，路也近得多，因为山那边是一片高原。战士们十分活跃，队伍里扬起了一阵阵歌声。炊事班长老刘从彭营长肩上接过那付油盐担子，迈着轻快的步子，笑嘻嘻地对旁边那个战士说：“小伙子，咱们比赛吧！”

又走了五六里，积雪逐渐少了，山坡上沟壑纵横，矮树丛生，一群群浑身长着长毛的牛，有的低头吃草，有的追逐嬉戏。许多同志惊奇地问：“这是什么家伙？”响导告诉我们：“这就是藏民的牦牛。”

下山以后，我们按照军团部早先的指示，顺着河沟，到达维南岑的一个村庄去宿营。有的同志边走边回头看看背后的大雪山，喜笑颜开地说：“再见啦，夹金山！”

二

傍晚，透过高原上的矮树林，在苍茫的疆色中，我们看到一座很大的村庄。“到宿营地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正要进村，远村头上歇着一匹战马，军团部的一个骑兵通信员已在等待我们。他见了李屏仁同志和我，立即拿出军团首长的一封信来。李屏仁同志一边拆信，一边笑着说：

“首长准是叫我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随全军继续前进！”

“也可能要我们整顿军容，准备和四方面军会合。”我也高兴地估计着。

打开信一看，情况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信中说：奉军委电令，为了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信后，迅速返回夹金山南，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尾随的敌人。

这一任务来得太突然了！部队好不容易才翻过雪山，现在马上又要返回去，大家的思想能不能搞得通呢？但是，这是为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为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能够充裕地休整以便北上抗日啊！我们相信，只要把任务的重大意义讲清楚！大指战员是会排除万难，去坚决完成的。于是，我们住下以后，立即召集全团排以上干部进行动员。会上，李屏仁同胃志传达了军团首长的命令。我着重把这次任务的意义讲了讲，强调说：“三大纪律八项意是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一切行动听指挥，才能夺取革命事业的胜利。我们必须作服从命令的模范，执行纪律的模范！”我们讲过之后，干部们不仅没有丝裹抵触和畏难情绪，而且当场纷纷表示：“愉快接受命令，坚决完成任务！”

开完干部会，我们团的几个领导同志就分头下去了战士们有什么反映。

我首先来到一连。这里的同志们已派好房子，铺好床铺。有的在扫院子；有的在洗脸、洗脚；有的在修补草鞋；

有的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议论着。一个战士大声地说：“你们说，四方面军的同志和咱们是不是一个样子？”

“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怎么不一样？”另一个战士回答说。

“四方面军的同志英勇善战，为了迎接咱们，他们打了不少大胜仗！”又一个战士插了一句。

我见他们说得这样热闹，便凑过去，说：“你们想见四方面军的同志吗？”

“是啊！政委，我们早就想见了，在山那边就想见他们了！”大家马上把我围起来，七嘴八舌地向我打听四方面军的情况。

我笑笑说：“你们会见到的。不过，暂时还见不到。”

“为啥呢？”

我便把明天要返回夹金山南的任务给大家讲了，接着说：“同志们，任务是很光荣的，也是很艰巨的，我们要发扬吃大苦、耐大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完成好这一任务。一些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同志，就留在这里，不要过去了。”

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战士们也非常惊诧，大家部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说什么好。突然，一个班长在后面大声地说：“政委，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这句话象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层层浪花，大家马上热烈地议论开来：

“对！坚决完成任务，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夹金山有什么了不起，再来回过它几趟也不怕！”

“好哇！盐井坪老乡说，只见有人上山去，不见有人下，山来。这回我们过来又过去，要给他们开开眼界啦！”

“政委同志，我请求让我和大家一同回去，我回身一看，原来是炊事班长老刘，他不知什么时候也挤在人群里了。他大概怕我不同意，又没头没脑地补充说：“今天那付油盐担子，要不是营长抢去挑，我照样能挑过雪山！”

我本想劝他留下，但看他要求得如此恳切，便没有明确地答复，只说让他们连长、指导员考虑决定。可是，当我离开时，却听他在背后大声地对同志们说：“这是为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为了十几万红军的安全，这样光荣的任务我能不参加？再说，我不过去，你们吃什么呀？”

我又到了二连和三连，连里都已开过支委会，并向战士们动员过了，大家正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的：有的擦拭武器，有的检查弹药，有的捆绑东西

天渐渐黑了，团侦察排接受了打前站的任务，他们把刚打开的背包重新打了起来，只互相依靠着合了合眼，下半夜就跟着排长王志雄同志和响导动身往回返了。

第二天拂晓，在“再过夹金山，守住盐井坪”的响亮口号下，部队又一次向雪山进军。我一眼就在队伍里雾现了炊事班长老刘，他挑着油盐担子，走得飞快，从我身旁经过时，笑嘻嘻地说：“政委，我们连长、指导员叫我给说服啦！”

行军的速度很快，上午八九点钟，我们就登上了山顶。

这时候，面着浓球，浓儿变成牛毛细雨忽儿又变成鹅毛雪片，大家的衣服、帽子全格了，寒风一吹，立刻结上了一层薄冰。

“冷吗？”我问一个战士。

“心里挺热的。”他简短地回答。

“好！快走！”

但下山时，却遇到了难题。道路本来曲折陡峭，加上雾气降在雪上又冻了一层冰，变得更加光滑难行。许多同志稍一疏忽，就跌个仰面朝天，有的同志口口声声叫别人小心，自己也滚倒在雪地上了。队伍的前前后后，不时地传来滑倒跌跤的声音。行军的速度减慢了。李屏仁同志看到这情形，拄着棍子焦急地说：“这怎么行，到天黑也下不了山呀！”走在旁边的二营长饶子健同志，正要说什么，突然脚下一滑，刺溜一声，滑下去十几丈远。大家正为他担心，他却慢慢地站起身来，抬头向我们看了看，高声嚷道：“溜吧！溜着下来，这样快呀！”他这一喊，提醒了大家，几个战士马上把枪抱在怀里，往下一坐，嗤地滑下去了。

于是，大家都学习他们用滑雪的办法下山。垫着斗笠的，垫着毯子的，或者就垫一双草鞋的，坐着的，蹲着的，各种姿态都有，滑呀，滑呀，二齐向山下滑去。有些人互相撞上了，翻滚在雪地里，哈哈大笑把对方搀扶起来，又继续往下滑。有的人耳朵冻疼了，手冻僵了，呵呵气，搓一搓，又鼓足勇气滑起来。在白茫茫的雪山上，数不清的黑点，流星似地向下滑行，好象从雪山顶上，突然泻下一股湍急的人流！这真是神兵自天而降，锐不可挡啊！

两个多小时，部队就来到山脚下了。许多同志滚得从头到脚都是雪，

有的衣服拉破了，有的脸颊跌肿了，大家互相一看，不禁大笑起来。这时，我通知各连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检查、擦拭武器，吃点干粮；准备继续前进，迎接新的战斗。

部队在山脚下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插盐井坪。一路没有停留，翻过一座座山岗，穿过一条条峡谷，天黑时，盐井坪的灯光已隐约可见。侦察排长王志雄同志迎上前来，报告说：“咱们走后，据说敌人怕红军有埋伏，一直没有敢上来，现在阵地还是空着的呢这一意外情况，使部队前进的速度更加快了。

三

在盐井坪，我们又和敌人对峙着，白天打仗，黑夜休战，他们不进攻，我们也不出击，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我方没有任何伤亡。

一天下午，李屏仁同志拿着一份电报，兴冲冲地走来，连声说：“好消息！好消息！”我接过电报一看，内容是：最近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了会议，会议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使中国革命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雀以至全中国的胜利。电报并指示我们：你团接此电后，应立即翻过夹金山，经达到想功待命。

“是好消息吧？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就是说，很快我们要打到黄河边上去了。”李屏仁同志见我看完电报，兴奋地说。

我点点头，说：“太好了！两支主力红军挥师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真英明啊！”

从我们第一次过雪山那天算起，正好是整整十天，我们又要第三次翻越夹金山了。那个响导又跑来要求仍让他带路，李屏仁同志说：“走了两趟，

路熟了，你不必再过去了。”

他却说：“雪山的天气是孩子的脸，一天十八变！说不定会遇上大风雪，你们要迷路的。”

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便说：“那我们三过雪山，你不是要过四次吗？”

他却笑笑说：“不，我也只过三次，我要参加红军！”

李屏仁同志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高兴地说：“好哇！我们欢迎！”

那天，我们仍顺着前两次的路线走，一路很顺利。途中，团供给处又发给大家一些辣椒、蒜头。我们仍是在山脚下宿营。第二天一早，部队就上山了，由于有前两次的经验，大家走得不紧不慢，感到比第一次轻快得多。但是，离山顶不远时，山后突然涌出一块乌云，响导瞅了瞅，神情紧张地说：“糟了！要来暴风雪了！”

“真的吗？”李屏仁同志赶紧问道。

“错不了，你看这块乌云。”他十分肯定地回答。

我们抬头一望，只见乌云正在迅速扩大，便立即通知部队，要大家作好抵抗暴风雪的准备。有的战士却不大相信，漫不在意地说：“谁开玩笑吧？这么大的太阳，一丝丝风也没有，怎么会有暴风雪呢？”

可是，这块乌云逐渐扩大，扩大，顷刻盖住了半边天。天昏了，地暗了，雪山也改变了刚才的容貌，变得阴森可怕。突然，山间长啸一声，狂风猛地向大家扑来，好多同志背上的斗笠，飞到半天空，又落到几十丈深的雪沟里去了。不一会儿，狂风就卷着暴雪，铺天盖地地涌来。整个雪山，呼啸着，咆哮着，如千军呐喊，万马奔腾，真是瘆人。人往前走，狂风象只无形的巨手把人们挡住；稍抬起头，雪粒便刷刷地迎面射来。有的同志大声叫道：

“我迈不开步子啦！”

“拉住！大家紧紧拉住！”同志们互相鼓励着。

战士们五六个人，挽着手，躬着腰，互相拉着、推着、顶着，慢慢地向前移动。可是，一遇到凶猛的旋风，又走不动了。为了防止被旋风卷走，

五六个人结成一个蘑菇形的人环，低着头，蹲在地上不动。一路上，大家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抵抗一阵又一阵的旋风。在这千年不化的雪山上，无数个蘑菇形的人环，象一朵朵迎着暴风雪开放的雪莲，闪耀着群众的智慧，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尽管这样，有的同志还是倒下去了，但是大家不退缩，不屈服，同雪山上的风暴英勇顽强地搏斗着！

部队登上山顶的时候，暴风雪逐渐减弱，但每个人都已精疲力竭，要不是互相搀扶，准会有更多的人倒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突然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惊呼。我抬头一看，前面路旁围着一堆人，心想不好，急忙赶上前去，只见一连炊事班长老刘脸色灰白，躺在雪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了。

“赶快叫医生来！”我对站在老刘身旁的一连指导员说。

“去叫了。”指导员对我说，“哎！真想不到，刚才还好好的，起暴风雪那阵，别人要挑他的担子，他还不愿意，快到山顶时，他就气喘得不行，一到山顶就坐下，坐下后就躺倒昏迷不醒，再也起不来了。”

医生赶来，经过一番抢救，又痛心地摇摇头。一连指导员弯下身子，大声叫道：“老刘！老刘！”开始老刘没有任何反应，后来才微微睁开两眼，牵动了一下嘴唇，小声说道：“指导员，我对不起党，没有能够坚持。”

“老刘，不要紧的，你会好的！”我安慰说。

他强睁着眼，转向我说：“政委，我不行了，过不去了。”突然，他一只手颤抖着伸进口袋，拿出一个手绢包，塞到指导员的手里，而后微微一笑，断断续续地说：“同志们，跟着毛主席前进！”北上抗日说完，就紧闭了双眼。虽然同志们大声呼喊，他却再也不吱声了。

打开手绢包，里面有两张用旧了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钞票和一块银元，还有一张小纸条，上面有两行模糊的铅笔字：

“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我接过这个还留着老班长体温的手绢包，象是接过一团火，一阵心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知道，这样的纸条，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

战斗最残酷的时候,很多革员身上都有。我也曾好几次从牺牲的战友身上发现过这样的纸条。但我没有想到,老刘竟把它保存得这样长久,而在这长征途中,在雪山的狂风暴雪中交出了它!我双手捧着这个小小的手绢包,回想长征以来,老刘始终勤勤恳恳,英勇战斗,对同志是那样关心,对群众是那样热情,对工作又是那样负责直到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肩膀上还挑着一付重担!我凝视着这个小小的手绢包,觉得手里捧的不是普通的两张票子和一块银元,而是捧着老刘同志的一颗心,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革命赤诚的心啊!

暴风雪已经过去。云层间射出了金色的阳光,雪山变得异常肃穆庄严,好象也在为老刘的牺牲表示哀悼!

队伍不断地从我们身旁走过,不时听到悲哀的叹息:

“老班长牺牲了是老刘同志,老刘牺牲了。”

“呜呜呜”一直站在老班长身旁的一个年轻炊事员,突然失声痛哭起来,好几个同志也抹着眼泪。

老刘却一动不动地躺着,消瘦的脸上露出安详的笑容,象是熟睡了。

我从悲痛中清醒过来,叫几个战士在路旁挖了个雪坑,把老刘用军毯盖好,安葬了。大家脱下军帽,低头向那堆晶莹洁白的雪墓静默致哀,然后才陆续离开。我回过身来,见那个年轻的炊事员擦干泪水,从地上挑起老班长从江西挑到这里的那付油盐担子,迈着坚定的步子,继续前进了。

当晚,部队在达维宿营。一到驻地,军团供给部就给我们送来很多酥油、炒面,还有一百多套四方面军慰劳的灰布草军衣。部队在达维休息一天,又向懋功进发了。

七 草地折回

—

敌人骑兵不可怕，
瞄准马儿把它打，
目标愈大愈好打，
一枪一个打倒它！
我们笑哈哈，
我们笑哈哈！

.....

在宽阔、碧绿的草滩上，响起了雄壮、嘹亮的歌声。一队队红军战士，顶着烈日和酷暑，忽儿瞄准射击，忽儿持枪跃进，紧张地进行着操练。

那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下旬，我们正在马尔康一带休整、训练。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为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红军应集中主力北上，开辟川陕甘革命根据地，肩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重任。同志们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北上抗日，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兵热潮。因为要继续北上，必须随时准备和敌人的骑兵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因此，如何打敌人的骑兵，就成了军事训练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天，我和李屏仁同志到军团长振堂同志那里请示工作，他让我们坐下后，又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打敌人骑兵的战术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不然，今后过草地遇上敌人的骑兵，是要吃亏的。”

“这两天我们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李屏仁同志说。

“好啊！你们琢磨出个道道来没有？”军团长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突然停下，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口气说，“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失去指挥的局面，这当然对我们十分不利；

但这里还有有利的方面，那就是敌人骑着马，目标大。俗话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集中火力，先干掉它领头的几匹马，后面的敌人稍一停顿，我们就能够发扬火力，迅速把敌人的气焰压下去！’

说到这里，军团长双手用力一按，就象一下子把敌军压在自己的面前。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点点头，笑了起来。

不几天，部队普遍开展了打骑兵的训练，上上下下，搞得热火朝天。那支《红军打骑兵歌》，也很快在部队里唱开了。

与此同时，我们又组织一些同志在驻地附近筹集粮食，积极做过草地的物质准备。大家事先认真地学习了红军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在收购粮食时，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不得强购，严禁私自收买逃跑群众的粮食；除非在绝对无办法的情况下才能收割麦子，但只收熟不收青，先割头人土司的，后割群众的，收割后一定要留下钱。”在实际工作中，同志们严格执行这一政策，比较顺利地收购了足够的粮食。这时，只等毛主席、党中央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草地北上了。

然而，当时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张国焘，却认为“长征是失败了”，革命“现在是两个高潮之间”的“总退却”阶段，因而竭力反对红军北上，主张向中国的西部边远地区退却逃跑。是北上抗日，还是南下逃跑？这成了毛主席、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焦点。

八月上旬的一天，我们接到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军团部开会，听军团首长传达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的精神。我们很快来到开会地点藏民房子里，见来开会的同志们有的坐在铺上，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垫着块石头坐在地上，挤得满满一屋。当时军团政委李卓然同志已经调离，由代理政委曾日山同志向大家作传达。虽然室内有些闷热，但曾政委传达的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却象阵阵清风，沁人心脾。

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认为，虽然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遭受到严重损失，但是中国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并未低落，而且在继续发展。尤其是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毛主席

指挥我们打了胜仗，革命形势很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两大主力红军交流了革命战争的经验，统一了指挥，战斗力也大大增强了。这一切，必将会大大振奋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增强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

这时，我瞅了瞅到会的同志，一个个乐滋滋的，有的聚精会神地听报告，有的低着头刷刷地记笔记。大家都为革命的大好形势而感到欢欣鼓舞啊！

曾政委正要往下说，一直在埋头看文件的董振堂同志忽然抬起头来，说：“这里我要插一句，中央要求我们越是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越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的倾向，都是有害于红军，有利于敌人的。四方面军大指战员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长处，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可我们有的同志看到人家的一点缺点，就说起风凉话来了，这是不利于团结的，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

曾政委接着又说：“中央认为，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这个方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这种动摇还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不能作出正确的估计，怀疑革命形势的存在，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说到这里，曾政委突然提高声调，斩钉截铁地说，“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的中心任务之一。”

曾政委这几句话，激荡着我们的心。大家虽然相视不语，但似乎都体会到其中的份量，揣测到党内存在着新的分歧，斗争仍在继续着，思想上开始引起了警惕。然而，我们并没有想到，经过党的毛儿盖会议，惯于耍两面派手法的张国焘虽然表面上赞成北上抗日的方针，却又在背地里捣开鬼了。

最后，曾政委看了看大家，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我们面前还有很多、甚至是很严重的困难，首先是敌人不会放松对我们的进攻，另外前面

的草地也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甚至还会出现其它的干扰。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就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

最后几句话,他说得特别响奔、有力,到会的同志都深受鼓舞。我和李屏仁同志交递了一下眼色,发出了内心的欢笑。我们仿佛见到了革命高潮的来临,似乎我们一走出草地,就要跃马横刀驰骋”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

曾政委讲完以后,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又作了简短的指示,提醒大家一定要作好过草地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说:“草地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有的地方是一片沼泽,气候变化无常,我们决不能麻痹大意!”接着哗又询问部队打骑兵的训练情况。李屏仁同志作了简要汇报,说:“大家都在认真地训练,巴不得马上同敌人骑兵干上几仗。现在整天唱着我们笑哈哈,我们笑哈哈的歌子,信心可足哩!”

军团长听了,点点头,露出满意的微笑。

二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当时的计划是: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军、三十军为右路,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腊子口到甘南;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还有当时窃取红军总政委重要职务的张国焘等,率领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为左路,由卓克基出发,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会合,然后一同北上。

我们三十七团担任左路军北上的前卫。八月底,到达了阿坝。

阿坝,分上阿坝、中阿坝、下阿坝。中阿坝最大,那里的喇嘛寺金碧辉煌,巍然耸立,可容纳一两千个喇嘛唸经。喇嘛寺的周围,有做各种买卖

的店铺，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藏族同胞在街头来来往往，十分热闹。

我们在阿坝休息四五天，补充了干粮，继续前进。向东走出去不到二十里，迎面就是渺无人烟的大草地了。

草地，真是草的汪洋大海，灰濛濛，白茫茫，雾气腾腾，浩淼无边，要不是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线起伏的山峦，真无法辨认出那是草天相接的地方。草长得极茂盛，有的没过人顶，有的漫腰齐胸。下面水沟交错。弯的是片沼泽，水和泥土淤积呈黑色，在烈日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

“这草地多么平，多么大啊！土真肥啊！”生长在那“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籍战士，惊讶地赞叹起来。

“革命成功以后，到这儿来办农场，那才好哪！”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老战士，兴致勃勃地说，“到那时候，拖拉机轰隆隆一响，开出一片黑油油的庄稼地，种水稻、种小麦都行，保证年年丰收！”

大家正说得有劲，一个战士突然脚下一软，只听得噗哧一声，半截腿陷入淤泥里去了。他赶紧往外拔，可是越拔越陷。旁边的人急忙伸手去拉，猛一用力，拉的人也陷了进去。两个人一块在泥里挣扎着，其他同志一看不妙，急中生智，忙解下几条绑腿，把一端丢给他们两个，缠在腰间，然后，大家象拉纤似的撬往上拽，才把他们拽了上来。

从此以后，大家都警惕了，在水多泥烂的地段，便选择草厚的地方走，从一个草垛子跨到另一个草垛子，象走跳棋似的，绕着弯一蹦一跳地前进。

傍晚，草地笼罩着浓重的雾凇。部队在一处稍高的平地上宿营。这里有十几间用牛屎垒起的房子，是牧民们临时躲避风雨用的，住不了多少人，于是部队便搭起了帐篷。一时，到处飘动着篝火，扬起一阵阵歌声和笑语，荒凉寂寞的草地，破天荒地变得热闹起来。

过了一会儿，天突然变了。一阵冷飕飕的大风刮来，天空雷电交加，掉下豆粒大的雨点，霎时间就变成瓢泼似的暴雨，把火全浇灭了。外面哗哗地下着雨，帐篷里也嘀嘀嗒嗒地漏着水。同志们挤在帐篷里，怕把弹药

和干粮弄湿了，便有的顶着斗笠，有的撑开雨伞，背糍背地坐着，把弹药和干粮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

我和李屏仁同志在宿营地检查，一遍，然后回到了一间牛屎垒的房子里。这时，牛屎泥巴被暴雨完全浸湿了，象烂浆糊似的，一块一块地往下掉，掉在身上，冰凉冰凉的，又臭又脏。牛屎泥巴掉在警卫员李云脸上了，他急忙用手去抹，抹得一脸黑。李屏仁同志笑笑说：“小李啊，你真爱漂亮，还往脸上擦香粉哪！”说得李云同志哭笑不得。

暴雨一连下了三个多小时，到半夜才停。雨过以后，下弦月从云层间露出来，草地上到处哗哗流水，弥漫着雾气，十分寒冷。大家的衣服、毯子都湿了，又无法生火，只得几个人挤在一起，互相以体温取暖。

第二天，太阳从草地的边沿上升起，象一团火，烧红了半边天。大家吃过干粮，拔起帐篷就出发了。

草地到处是水，有些地方水深没膝。我们头顶太阳，脚踩水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没想到太阳一晒，水面上泛起一层污秽浑浊的泡沫，我们的脚泡在那烂泥汤里，久而久之，痒得钻心，饶破了就会红肿溃烂。原来这水有毒，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的同志走着走着，渴得嗓子冒烟，便从地下舀起一缸子水来，刚想喝，一闻那股恶腥腥的臭味，又不一得不把它倒掉。

这天，我和军团保卫局科员刘保山同志并肩走在一起。我们俩是兴国同乡，他又当过我们团的特派员，彼此十熟悉。我知道，最近他患疟疾，身体很虚弱，这一次，他怕草地行军掉队，主动要求跟我们团先走，得到了上级的同意，才赶到一起了。

我们俩边走边谈。开始，他的情绪很好，和我谈这谈那，有说有笑。他说：“走了这么多的地方，还是咱们兴国好。”常年的青松翠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老百姓待红军象亲人一样唉，要是什么时候能再回到江西根据地，那有多好哇！”

我笑着说：“会回去的，总有一天会回去的！”

“陕北一定也是个好地方。”他又兴奋地说，“老根据地的群众就是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到陕北以后，我一定先把病治好，身体练得棒棒的，不然，路都走不动，怎么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可是，在泥水里走了二十多里路，他的话渐渐少了，气喘吁吁，浑身直冒虚汗。我问他是不是走不动了，他为难地说：“老谢，你们先走吧！我慢慢在后面跟上来。”

“那怎么行？你骑我的牲口走！”我不由分说地把他扶上了马背。

到下午”刘保山同志坐在马背上也支持不住了，东倒西歪，脸色煞白，直喘粗气，他突然对我说：“老谢，你当然知道，我多么希望走出草地，能再见到毛主席，跟毛主席干革命啊！可是我如今身体这样不争气，能出得了草地吗？”

我连忙安慰他：“这么多的难关都闯过来了，草地也难不住我们，很快就会通过的。我们一出草地，就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陕北根据地就不远了。”

“对！走出草地，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我们一定要走到的！”他的眼睛骤然明亮起来，抬起头，直望着远方，不再说别的话。

可是，在过一条小河的时候，发生了意外的不幸。刘保山同志骑着牲口走到河中间，马突然被水里的礁石绊了一下，他摔倒在水里。他拖着无力的身子在水里挣扎着，刚要站起来，倒了下去。我们赶紧把他救上河岸，他却已昏迷不醒，奄奄一息了。

我蹲在他的身旁，眼看着残酷的草地要夺去战友的生命，心里就象刀绞一般。多么好的同志，多么坚强的共产党员！他一心想走出草地，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如今却在草地里倒下了！

“老刘，老刘，你醒醒！”我在他耳边呼唤着。他微微睁开两眼，深情地看着我，喃喃地说：“走出草地，向毛主席问好！”说完，刘保山同志就和我们永别了。李云同志蹲在一旁，失声痛哭起来，许多同志也都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我慢慢地站起身来默默地伫立着，心里说：“老刘，你安息吧，你没有实现的志愿，我们一定要完成。我们一定战胜一切困难，走出草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下，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那条小河边，我们掩埋了刘保山同志。随后，大象擦干脸上的泪水，又迈开大步，追赶前面的队伍。

三

太阳西斜时，部队行进到噶曲河边。

噶曲河，我们原来了解是一条很浅的可以徒涉的河流，但由于昨夜的暴雨，现在正涨着大水，河面有半里多宽，河水浑浊，流速甚急，就象一条凶猛的巨蟒，在碧绿的草地中游动。

我们询问通司怎样过河。通司说：“这里现在过不去。只要顺河向上走，有半天路程，那里可以徒涉；要不，就在这里等上两天，水很快会退下去的，到那时再过。”

我们团的几个干部商量了一下，认为如果在这儿等上两天，把干粮吃完就不好办，只有改变一下行军路线，从上游涉水过河，但需要请示上级批准后才能行动。于是我们便停下了。

当天傍晚，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穿着一身藏民用羊毛织的粗布军衣，手里拄根木棍，徒步来到我们团。我们领他到团部帐篷里休息，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他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笑道：“这杯开水，能值四两银子！”

我知道他这是针对行军途中草地里污水不能饮用的情况开玩笑说的，于是也笑着说：“现在噶曲河里水大得很，可以尽我们喝个痛快。”

“噶曲河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走，去看看！”他说着，就站起身来，走出帐篷。

刘总参谋长走到河边，凝视着滚滚的河水，默默地站了很久，然后折根

小树枝丢到水里。那树枝落到水面，就象箭飞似地顺水而去。他突然转身问道：“有人下过水吗？”

李屏仁同志回答说：“我们一到，就叫几个会水的同志下去试了一下，河中间很深，一人一手还出不了水面。”

“到处都是这样吗？”他又问。

“这一带都是这样。据通司说，上游比较浅，可以徒涉。”李屏仁同志回答。

“坪们去把通司请来。”他又向河里丢根树枝，一直望着那树枝被冲得很远很远。

通司来了。刘总参谋长便问道：“你说，这水要多长时间才能退下去？”

通司回答说：“再有两天就差不多了。”

“明天下午能过河吗？”

“不行，最快也得后天中午。”

“你说上游可以徒涉，离这儿有多远，

“大约有半天路程。”

“五十里？”

“没有，四十里不到，三十六七里的样子。”

总参谋长细心地问了这些以后，又在河边来回走着，察看河滩上水文的痕迹，判断河水涨落情况，最后和我们回到团部帐篷。坐下后，他又询问部队的思想情绪怎样，草地行军有什么困难。我们汇报说：虽然草地行军十分艰苦，但干部、战士思想上都明确北上抗日是毛主席、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所以大家有信心、有决心克服困难，希望早日走出草地，和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的右路军会合，然后共同北上。刘总参谋长听了，点点头说：“战胜草地，北上抗日，这是全军绝大部分同志的共同愿望。但是有的人却认为茫茫草地，无法通过，连噶曲河涨水也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了。我来一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嘛！”他停了一会，又指示我们说，“部队暂时在这里休息，注意水情变化，等候总部的决定！”说完，就站起身出了帐

筵，大步向总部驻地的方向走去。

夕阳的余晖把草地染成一片绯红。我们望着刘总参谋长远去的背影，心里很不平静。从刘总参谋长的话里，我们已经听出，有的人至今仍然不想北上，并在寻找种种借口，反对通过草地。我们心里说：“看来在草地里，不仅有自然界的风雨，还有人们思想上的风风雨雨呢！”

刘总参谋长回去不久，又派通信员送来一封信。他在信中再次指示我们：要密切注意水情的变化，及时向上级报告，同时，也要做绕道从上游徒涉的准备。看了这我们知道北上的行动没变化，那个通信员又说：“朱总司令怎么也找不到了！”

李屏仁同志关切地说：“总司令没有表，那可不方便哪！”

“朱总司令还不让告诉别人哩！”

“那怎么行？总司令要指挥全军行军、作战，怎么能离得了表？”李屏仁同志越琢磨越觉得不得劲。

我们正为这事着急，一营长彭少青同志恰好到团部来请尹工作，他听说后，指着自己的手表说：“我的这块表，还是江西第四次反‘围剿’的战利品，送给总司令用吧！”

可不，彭营长平日十分珍惜的这块三大针的手表，是上级发的。它不仅能准确地计算分秒，而且能指示日子，如果给总司令用，当然比较合适。我便说：“那你自己不是没有了吗？”

“我当营长，有没有表关系不大。可朱总司令指挥着全军，随时都要掌握时间，不能没有表呀他毫不犹豫地手腕上取下表来，交给李屏仁同志，脸上浮现出欢快的笑容，仿佛交出的不是一块表，而是内心对党、对革命的一片赤诚。我们便马上写了封信，连同给朱总司令的表一起让通信员带了回去。

噶曲河在耳边喧闹了一夜。次日早晨，乌云比布，天空阴沉，我们跑到河边，见河水退下去许多，昨天离岸很远的河滩，现在已露出水面了。李屏仁同志抬头看看天，焦急地说：“又要下雨了，我们应该抢在下雨之前过

河。”

可是，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接到军团部转左路军总部的道命令：部队立即返回阿坝待命；三十七团担任后卫。这一意外情况，我们开始简直不敢相信，特别是接到总参谋长要我们“密切注意水情变化”的信后，就觉得北上是不会有什麼变化了，在李屏仁同志直愣愣地看着这份“命令”，嚷道：“这是为什么？过了噶曲河，到班佑只有三天路程，就能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为什么不继续前进呢？”

然而，眼前是一分写得明明白白的命令立即返回阿坝待命！

听说要往回走，大家心里凉了半截。战士们默默地收拾着东西，间或投来疑惑的目光，似乎是问：“咱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有的则公开问道：“难道咱们不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啦？”“毛主席、党中央向前进，咱们为什么向后转？”

听着干部、战士的议论，我的脑子里也象一团乱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想起出发之前曾日山政委传达土央毛儿盖会议时的话：“右倾机会主义的劫摇是当前最大的危险。”我们现在往回走，和中央指出的有没有关系呢？我又想起昨天刘总参谋长的话：“有的人却认为茫茫草地，无法通过。”这“有的人”，决不是一般的干部和战士啊！当然，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张国焘搞的鬼；也不知道，就是他公开拒绝接受党中央的指示，违反党纪，分裂红军，抱肖命令左路军南下；更不知道他密电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妄图胁迫方面军南下，说什么如不服从就“彻底解决”，丧心病狂地要力挺毛主席党中央。面当时，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现了张国焘的这份密电，马上骑马去见毛主席，作了报告。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了粉碎张国焘的罪恶阴谋，当即在巴西召开了治局会议，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便上山找粮食为名今连夜把部队带走，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了。

往回返时，我们大家心情都很沉重，道路也好像变得加漫长、难走，何况这是根本无法辨认出道路的水草地啊！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已经疲乏

了，老天更不作美，一阵狂风刮过，下起了冰雹，最大的有鸡蛋那么大。同志们赶紧顶毯子、背包、脸盆等物，抵御冰雹的袭击。我的那匹牲口，冰雹打蒙了，在原地直打磨磨转，不肯往前走。半个小时以后，冰雹又变成了雪片，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战士气得骂起来：“他妈的！这鬼天也和老子作起对来啦！”

乌云翻滚，雪打风吹，我们的队伍艰难地向阿坝方向前进着。

四

九月中旬，我们在上阿坝住了两天，接到总部通知：营以上干部到中阿坝的喇嘛寺去开会。

那天一大早，我们团的营以上干部向中阿坝走去。一路上，大家议论说，这回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可能要给大家讲话了。因为，部队从草地折回，干部、战士思想都不通，纷纷提出：为什么不过噶曲河？为什么不跟毛主席、党中央北上？为什么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也不明白，当然更无法给同志们讲清楚。所以我们急切地希望首长能够讲明情况，解开大家思想上的疙瘩。

可是，我们走进喇嘛寺的大殿——这里已被布置成临时会场，迎面就看见粗圆柱上有两条非常刺眼的标语，一条是攻击北上抗日的，诬蔑北上是什么“逃跑主义”，另一条是鼓吹“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的。看到这两条标语，我们直发愣，你看我，我看你，惊异得说不出话来，越发不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事！

宣布开会了。主席台上突然出现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分两边站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不一会，张国焘就急匆匆地出场了。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他，原来是个大胖子，长着满腮的黄胡茬，穿了一身油腻发亮的军装。

“同志们——”张国焘拉长了嗓子，装腔作势地说，“我不得不向大家

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就是我们红军现在只剩下十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的？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他说到这里，露出满嘴黄牙，得意地笑着，那笑声听了使人噁心。接着，他又唾沫四溅地攻击说：“要北上，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不冻死也会饿死，不饿死也会拖死，最后到了陕北，只能剩下几个中央委员逃到苏联去避难……”

张国焘的无耻诽谤，引起了台下一阵骚动。不少同志交头接耳地议论，有的同志紧握双拳，怒目而视，脸气得通红。因为，这样公开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我们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张国焘可能感到他讲话的效果不妙，就使出了他那挑拨离间、威胁恫吓的伎俩，把话锋一转，直指着我们五军团的干部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分子啊？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就没有机会主义的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的思想？我不相信！”

听到这些辱骂中伤的话，五军团的干部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李屏仁同志把帽沿一拉，戴得更紧，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把头一埋，情不自禁地起我们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以及长征路上，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一、三、五、八、九军团几个部队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打仗时互相支援，训练时互相学习，就象亲兄弟一样，那是多么幸福啊！可眼下，张国焘却什么也不顾了，如此对待我们红军战士这时我又骤然想起：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现在在哪里呢？他们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这样讲的。

然而，我寻遍了台上台下，却看不见他们。正在纳闷，我发现朱总司令的爱人康克清同志就坐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听得有人小声地问她：

“总司令呢？”

“没有来。”康克清同志小声地回答说。

“他病了吗？”

“没有，他身体很好，你们放心吧！”

从简短的对话里，我隐隐约约地领会到，张国焘此时的所作所为，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是抵制和反对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我心里说：“我们虽然脱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但是有毛主席、党中央委派的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领导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就有希望”

“我们要建立川康根据地！”台上一句声嘶力竭的叫喊，打断了我的沉思，抬头一看，见张国焘正挥动拳头狂叫着，“川康地区，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是有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的。因此，南下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对南下的决定，不允许有任何的怀疑和动摇！凡是有北上逃跑错误思想的人，都要迅速转变过来，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要给予纪律制裁！”

这时，李屏仁同志槌槌我，小声地说：“开头是扣帽子，现在要打棍子了。”我听得后面一个同志也不满地说：“不靠说服靠压服，压不服就”他虽然没有说下去，但我们知道他要说的是“压不服就打服”，所以几个人都轻蔑地笑了。

“阿坝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每次，我们都是憋着一肚子气进去，又憋了一肚子气出来。大家心里直嘀咕：“看你张国焘怎么表演！”至于被他恶意嘲笑为“机会主义”的五星军帽，我们却更觉得它可爱，它使我们时时刻刻想到毛主席，想到党中央，想到要永远保持和珍惜红军的荣誉。

阿坝分裂会议后不久，我们就接到臭名昭著的“阿坝会议决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反对所谓北上逃跑、鼓吹坚决南下之类的反党滥调，还要求立即向部队进行传达。那天上午，我们团的几个干部和军团组织科长袁子钦同志正在一家藏民房子里开会，看到文件，大家的肺都要气炸了。李屏仁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谁传达？反正我是坚决不传达。”

“哼！谁传达他那个东西！”其他同志都这样说。

这时，袁子钦同志装了一锅旱烟，擦根火柴，正要点烟抽，李屏仁同志突然把火柴抓过来，让火苗对着那份文件。文件被点燃了，顷刻化为灰烬，落进了火塘。

五

九月下旬，张国焘强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继续南下，说是去“开辟川康根据地”，“到天全、芦山吃大米。”

我们人往南走，心却向北，时时刻刻想着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以及一、三军团的北上。那时五军团有部电台，还一直和党中央保持着联系，我们每次到军团部去，总要悄悄地向军团组织科长袁子钦同志打听：“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到哪里了？”头一次，他小声而兴奋地告诉我们：

“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出草地啦！”后来他又告诉我们“中央红军最近一举攻克天险腊子口，打了个漂亮仗。”他还说：“中央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要咱们迅速北上哩！”这些消息，我们听了是多么兴奋啊！可是，没有多久，电台和中央联系的事被张国焘发现了，他说我们是“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下令把电台的密码没收了。

一天，部队行军来到一个地势稍高的草滩，我们远远就望见一片帐篷，许多红军战士正迎着我们走来。渐渐地，帽子上的红五星也能看清了，我们就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

“九军团的。你们是五军团的吧？你们辛苦了，欢迎欢迎！”他们说着一齐鼓起掌来。

九军团的同志们热情地把我们接到帐篷前。在那里，他们已准备了许多炒面，烧了大锅开水，象接待亲人似的，招呼我们休息，吃饭，喝水九军团由于是左路军的后卫部队，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草地，就南下了。见到他们一个个服装整齐，精神饱满，我们很受鼓舞。在草滩上，两支兄弟部

队的同志们象久别重逢的战友一样，围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起来：

“党中央、毛主席和一、三军团的同志们哪里去了？”

“他们北上了！听说已经走出草地，还打了大胜仗哩！”

“那我们为什么要往回走？”

“唉！谁知道呀！”

同志们说到这里，都不愿再说下去，只是把无限向往、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北方

部队继续南下，到了川康边境的绰木碉。这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野心彻底暴露出来了。十月五日，他非法成立伪中央和伪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为主席。他还把他任职的伪文件印发下来，要我们向部队传达。

我们看着这个文件，越看越上火，眼都气红了。

“岂有此理！”一营长彭少青同志拍着桌子，跳了起来，“谁给张国焘这样的权利！我们都知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北上了，怎么这里又冒出来一个中央！这不是公开唱对台戏吗？这是哪家的中央？咱不认得它！”他说着，把那份文件撕得粉碎。

的确，这时五军团的干部、战士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不满情绪，已越来越强烈，就象一座火山，几乎要到爆发的程度了。有些同志曾提出：“我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还有的同志甚至说：“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不让我们北上，就跟他干！他妈的，难道咱们还怕他不成！”

就在我们焦急、气愤而又束手无策的紧要时刻，朱总司令到五军团来了。一天下午，我们来到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住的屋子，只见里面坐满了营以上干部，朱总司令坐在靠窗的一张凳子上，正和军团长低声地交谈着。

我找地方坐下以后，抬头凝视着朱总司令慈祥的面容，不禁心里一热，眼睛湿润了，第一次见到总司令的动人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是一九三〇年七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率领红军来到兴国，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

当毛主席给大家讲话时，他始终站在毛主席的身旁。他身材魁梧，军服整齐，肩背竹斗笠，腰插小手枪，十分威武。然而，在他微黑的脸上总是露着笑容，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可现在，朱总司令瘦多了，两鬓间增添了星星白发，额上也多了好几道很深的皱纹，显得有些苍老。我们知道，这些日子，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也是遭受无情的打击和迫害呀！我们在南下途中就曾听说，张国焘行军时不仅一人占了十几匹牲口，满包大箱地驮着东西，而且竟指使人把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仅有的两匹牲口抢走了，后来朱总司令对着张国焘的亲信正义凛然地说：“我是党中央任命的总司令，我的马你们没有权利牵走！”张国焘一伙才不得不把马又送了回来。现在，我们亲眼见到朱总司令日显苍老的面容，更唤起了对总司令的敬爱之情，也更激起了对张国焘骄横跋扈的无比愤恨！

军团长董振堂同志见人已到齐，便请朱总司令讲话。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后，迅速安静下来。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大家，和大家谈谈了。同志们都好吧？”

听到总司令的亲切问候，同志们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个同志大声地说：“我们都很好，总司令你要注意身体啊！”

“你们看，我不是好好朱总司令笑了笑，接着又说，“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取得很大的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经指出：南下是绝路，无论就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来说，都是对我们极端不利的。可是有人却说北上逃跑，只有南下才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的，现在不是已经有许多事实说明这个问题了么！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道路的。但是现在有人还在坚持错误，我们就要坚决斗争，对有些同志则要耐心说服，作必要的等待。我们党内总是讲道理的，是非总是能辨别清楚的。要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拥护毛主席、拥护党中央的，反对的是极少数；有一些同志则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觉悟的过程，我们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了。”

一缕阳光从窗口照射进来，室内显得更加明亮。大家望猜朱总司令坚

毅沉着的神色，听着他明彻深邃的话语，心胸顿时豁然开朗起来。许多同志频频地点头，眼里噙着泪花，脸上露出了欢笑。

“在敌人面前，我们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在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毫不含糊；但是在兄弟部队之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不要斤斤计较。”朱总司令微微扬着两道浓眉，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多少高山大河都过来了，那么大的困难都能克服，那么凶狠的敌人都能战胜，难道眼前的困难就克服不了？”

是啊！长征以来，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朱总司令和红军！大指战员并肩战斗，战胜了多少艰难险阻啊！我还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渡赤水河之前，在土城和敌人打了一仗。就在那次战斗的一天傍晚，朱总司令突然来到我们团指挥所，亲切地询问部队的情况，仔细地观察敌人的阵地，他用的望远镜特别长，可以靶敌人在远处山上的活动看得一清二楚。他帮助我们精确地分析了对面敌人的动向，嘱咐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打好，坚决守住阵地！”正是在朱总司令的直接关怀下，那次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今天，总司令又带领我们进行新的战斗，克服新的困难，我们怎么能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呢？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异常寂静，朱总司令的感情似乎也很激动，沉默了一阵，才继续说：“同志们一定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不能盲动，红军和红军冲突起来，那意味着对革命犯罪！破坏团结的只是个别人，他们正巴不得咱们打起来呢，我们千万不要上个别人的当。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比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很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勇善战，吃苦耐劳，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和他们搞团结。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毛主席说，团结就是力量。你们五军团善守能攻，有许多优点，但也有缺点，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要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革命才能胜利。”

朱总司令的这些话，真是字字千钧，句句在理，十分中肯、透彻，到会

的同志一边侧耳倾听，一边用心思索，决心铭记在心，坚决照着去做，一定要为毛主席争气，让朱总司令放心！

最后，朱总司令以高昂的语调，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度过目前这个困难的时刻，只要我们坚持原则，按照毛主席的方针办事，胜利就是我们的！大家有这个信心没有？”

“有！”同志们把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坚定信念，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凝聚成这一宏亮、有力的声音，向敬爱的朱总司令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一营长彭少青同志霍地站起身，大着嗓门说：“总司令，你放心我们一定听你的话”他拭着眼泪，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军团长董振堂同志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他最后站起来说：“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然后，他又转向大家，说：“总司令的这些话，我们应该牢记含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此后，五军团又继续南下了。

八 高原风寒

—

部队沿着大金川南下以后，张国焘驱使四方面军的主力经绥靖、丹巴、懋功，翻过夹金山，到天全、芦山一带“开辟川康根据地”去了。五军团被留在后方丹巴县，担任警戒，以对付康定方向的敌人。

这时，张国焘继续推行他的分裂主义路线，精心策划对五军团的所谓“改造”。他把军团代理政委曾日山同志调走，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团政委。曾日山政委是个很好的领导，作风深入，平易近人，能密切联系群众，在战士、干部中很有威信。他后来在西路军失败时，壮烈牺牲了。而黄超呢，是个没有得到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原是张国焘的秘书长，既不会指挥打仗，又不会做政治工作，只会跟着张国焘干坏事，搞阴谋诡计；此人长得又黄又瘦，大家在背后都叫他“鸦片鬼”。张国焘为了进一步控制五军团，除了改变军团的领导成分外，还挖空心思对五军团的部队进行了调整。他把三十九团和四方面军兄弟部队的一个团加以对调，同时，又命令我们三十七团离开丹巴，住到丹巴东南一百三十余里的牦牛村，去扼守一座名叫大炮山的荒凉雪山。

还在南下途中，李屏仁同志就调任军团参谋长，吴克华同志从三十九团调来我团任团长。吴克华同志性格活跃、乐观，充满朝气，说起话来富有幽默感。我们一起工作，彼此信任，十分融洽。一天上午，军团部把我们两人叫去，由军团长董振堂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进驻牦牛村的任务。

军团长布置任务时，黄超一直在翻阅手里的一份文件，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接着便咿哩哇啦指示开了：“让你们单独远出执行任务，这是张主席对你们的信任，你们要做好工作，不要辜负了张主席的信任！”

他一口一个“张主席”，就是指张国焘，我们听了感到十分刺耳，当时谁也没有吭声，室内一直长时间的沉默着。

最后，还是董振堂同志打破了尴尬的局面，关切地说：“大炮山是座很荒凉的雪山，有几家老百姓也都是藏民。你们去了以后，一定会有不少困难，生活上也将会更加艰苦。希望你们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把艰苦作为对我们革命意志的考验和锻炼，保持和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我相信同志们会圆满地完成任务的。”

吴克华同志回答说：“首长放心，我们都有这个思想准备，坚决完成任务说完，我们就出来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吴克华同志，你说，为什么草草把咱们放在那个地方呢？”

他耸耸双肩，比划着手势说：“是怕咱们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又要犯‘右倾逃跑的错误，大概放在那里他们比较放心吧！”

“哼！‘鸦片鬼还说是对咱们的信任哩！”我愤慨地说。

“不管怎样，让咱们呆在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经高原的风寒，尝尝野菜的苦味，这也是革命过程中的一种锻炼！”吴克华同志说。

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我笑道：“可不！他们想拖垮整死我们，其结果只会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

我们催马前进，大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也响起了爽朗的笑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团就离开丹巴县城，沿着一条伸向西南方向的河谷往前走。河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大山，山上古树参天，是这一带有名的原始森林，越往前走，山越高，路越陡，有的地方头上的青天也变得狭窄起来，使人感到好象走进了一条倾斜的巷道。这一带，除了离丹巴六十余里的东谷有一座喇嘛寺和十几户藏民外，沿途就再也没有什么人家了。有的同志说：“说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搞革命，建立根据地，你看，地倒有的是，就是没有人啊！”

我们走了整整两天，才在一座大山脚下发现一个住着二十多户人家的村庄。通司指着说：“那就是牦牛村。”吴克华同志仔细地看了一阵，点点头说：“噢！在大森林的边沿上，有一簇簇房子，的确象一只伏在山坡上吃草的牦牛。这个村名起得真妙呀！”

部队进村,村里到处寂静无声,遇不见一个人,象是走进了一座空寨。通司指着村头上的两家铺子,说:“这是汉人开的。”我们见大门紧闭着,便从门缝往里看,只见地上堆着一些废旧的纸箱和破盆烂罐,原来店主已带着东西躲避了。有的同志开玩笑说:“这里的老乡在和我们唱空城计哪!”

“他们怎么事先就知道有部队要来呢?”我感到十分奇怪。

通司把我们带到村后的山坡上,指着部队来的方向叫我们看,我们才明白了。原来这儿地势高,一眼可以望出去很远,大概我们还在十几里以外,他们就已经发觉了。我们看到村庄四周,山坡上的一块块梯田里,青稞、豌豆都已熟透,但是没有人去收割。我们当即商量,要完成扼守大炮山的任务,必须争取群众,有了群众,一切事情才好办,而且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于是决定,首先帮助老乡进行秋收,以实际行动来缩短我们和群众之间的距离。

次日,通司向那些留在家里的藏族老大爷、老大妈讲了这件事情、以后,部队就分别到各家地里帮助收割庄稼。但是,那些藏族老人由于过去受民族压迫太深,根本不相信汉人的军队会帮他们干活,所以非常害怕,有的坐立不安,有的嘴里嘟嘟噜噜地唸经请佛爷保佑。后来,战士们把一捆捆青稞、豌豆送到他们家里,他们的疑虑才渐渐打消。也有的把佛珠一丢,请战士们坐,并端出酥油茶来招待,战士们都非常客气地谢绝了。

收割完庄稼,部队又高高兴兴地帮助老乡到山上砍柴,到沟里背水,打扫院子,修房屋,垫畜圈……那些藏族老人在一旁惊奇地看着。

一个五六十岁的老阿爸,身上的衣服十分破烂,看样子是个穷苦人,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我们跟前,通过通司问道:“你们这些汉人军队,为啥要给我们藏民干活呢?”

我们是红军,和藏民是一家人,是为穷人闹翻身、谋解放的队伍!”我们高兴地给他解释说。

“闹翻身、谋解放?”老阿爸显然听不明白。

我们便耐心地向他解释:“红军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汉族的穷苦人和

藏族的穷苦人是一家人，是兄弟，都受蒋介石那帮官僚军阀的压迫，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噢！是为受苦人的，天下有这样的军队吗？”老阿爸半信半疑地说。

这时，我们越发体会到，在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党的主张，讲解革命道理，要困难得多。世世代代的民族隔阂，象一道无形的鸿沟横在我们和群众之间。要填平这道鸿沟，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是，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去克服。所以，我们继续做各种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渐渐地，有些藏族同胞感到我们和国民党的军队确实不同，愿意和我们接近了；跑到山上去的群众，也陆续回到村里。两家开铺子的汉人，最后挑着担子回来，见到我们还抱歉地说：“同志，真是对不住，我们不知道是红军来了，还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来了呢！”

二

部队到牦牛村后不久，我们就研究决定，三个营轮流去大炮山担任警戒，十天半月轮换一次。为了加强对值班部队的领导，团长、参谋长和我三人作了分工：我负责一营，团长吴克华同志负责二营，参谋长孟焕章同志负责三营。当时，大家开玩笑说：“好！这叫分工负责，谁出了问题，就打谁的屁股！”

这一天，我跟一营从牦牛村出发，继续顺着大山中间的河谷往南走，向大炮山前进。

队伍在崎岖的山路上走着。一边是清沏的河水，潺潺流着；一边是高大的松树、柏树、枫树和杨树，迎风摇曳，有些地方长着茂密的竹林，竹子有碗口那么粗。一路上，不时地可以看到雉鸡飞腾，野兔奔窜，鹿群在河边喝水……风景确实动人。

大约走了七十多里，到了河流的尽头，迎面耸立着一座高山，那就是大炮山。抬头望去，只见遍山都是乌黑的森林，光秃秃的山顶，复盖着白皑皑的积

雪，象是戴了一顶白帽的巨人。有的同志笑着说：“这哪象大炮，明明象一个白头老人嘛，应该叫它‘白头老人山’哪！”

山坡上有一座营房，据说过去是国民党的警戒部队住的。门窗颓败，墙壁驳落，已长久不住人了。我们便在这座破营房里住下来，同时决定派一个连到山顶值班，监视山那边的敌人。营房和山顶相距十余里，却是两个世界，因为山顶在雪线以上，冰雪终年不化，气温很低，冻得伸不出手。战士们刨开坚冰和冻土，搭起了工事和掩蔽部，在冰天雪地里过起穴居生活来。

向南望去，见山下有一座很大的村庄，炊烟四起，雾气腾腾。仔细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村子里到处都有敌人，还可以看到村庄前面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就是从康定到炉霍、甘孜的驿道，常有驮了东西的马帮经过，马帮后面，都跟着一小队荷枪的敌人。

“据藏族同胞说，这些马帮大多是国民党当官的做的大买卖。”一个班长开了腔。

“咱们下去干他一下，让那些国民党官老爷去尝尝折本的滋味！”一个排长说。

“要有好吃的，还可以改善一下咱们的生活。”一个战士附和着。

我和他们开玩笑：“怎么，刚占了山头，就要人家的买路钱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时，一连长提议：“我们刚来山上，一方面要筑好工事，一方面要了解敌情。这几天是不是下去一些人，趁敌人没有防备，打它个措手不及，抓两个‘舌头’回来，了解一些情况。”

我很赞成他的意见，建议他们先召开支委会，把各方面的工作仔细安排一下，并说：“要派人下山，事不宜迟，最好就在今天夜间。”

夜晚，月色朦胧，山上的积雪反射着寒光。根据支部的决定，一连长带着一个排准备下山了。我嘱咐他们说：“动作要隐蔽、迅速，捉到舌头就回来，不要和敌人纠缠，一连长点点头，很快就消失在黑暗里。

两个多小时后，山下火光闪闪，枪声大作。山上的同志们都羡慕地说：“嘿！”

干上啦，干上啦！”天快亮了，我们估计一连长他们应该早已撤出战斗，可是山下的枪声不但不见稀落，反而象爆豆子似的越来越猛。大家正在疑惑，忽听得有人说：“连长他们回来啦！”不一会，一连长兴高彩烈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声地报告说：“政委，胜利完成任务，全部安全返回，抓到两个俘虏！”

“怎么山下的枪声还这样比？”我问道。

“他们有的是子弹，打了给自己壮胆呗”一连长笑道。

这时，外面有人大喝一声：“进去！”只见两个国民党士兵面黄似蜡，浑身发抖，胆颤心惊地走进掩蔽部来。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一连长问道。

“长官，我们是李抱冰五十三师的。”

李抱冰这个名字，是很熟悉的，和我们也算是老对头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时，他就紧紧追赶我们，一直追到雪山脚下，眼巴巴地看着红军过了雪山，才无可奈何地停下。如今我们从草地南下，真也是冤家路窄，又碰上了。

“你们山下有多少人？”我继续问。“一个团，长官。”

“都是从湖南来的？”

哪知道这一问，两个俘虏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诉开苦了。他们说：自打从湖南来到这里，吃不上大米，生活不习惯，病号又多，当兵的天天想家，说是“受了当官的欺骗，有家都回不成，听说红军又回来了，大家更是提心吊胆，连觉都睡不着……”

“你们知道山上来了红军？”我打断他们的话，追问道。

“不知道。我们当官的说，那雪山上住不得人，住在那里，不饿死也会冻死，遇到暴风雪都得冻成冰棍。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象天兵天将似的，会从雪山上下来。”

“你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多着哩！你在岗亭里打呼噜，就没有梦到会当俘虏吧！”一连长说得大家都笑了，两个俘虏也苦笑起来。

上山后不几天，我们果然遇到一场暴风雪。

那天上午，天空阴云密布，西北风越刮越紧，在山谷里发出呜呜的吼叫。不一会，棉花朵大的雪片趁着风势，象湍急的瀑布直泻下来。顿时蔽天遮地，白茫茫一片浑沌，十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战士们身上没有棉衣，只有一件羊皮背心，站岗的哨兵才有皮大衣穿。暴风雪袭来，寒气逼人，冷风刺骨，大家没有办法，只得蹲在冰窖一样的工事里，围着火，一步都不离开。外面风雪怒吼，面前的一堆柴火也显得暗淡无光，没有多大热气似的。

暴风雪一直不停，我们和山下断绝了联系。严重的是山下送不来粮食。我们断炊了。大家只好用茶缸子化一些雪水喝。然而喝得肚子里咕咕直响，也顶不了啥事。

“咱们讲故事吧！听故事能忘记肚子饿。”在一连连部的工事里，有人提议说。

“好，欢迎政委给大家讲一个！”不知谁说了一句，同志们就鼓起掌来。

“你们要听什么故事呢？”我笑笑说，“我要讲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你们就是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急渡湘江，同志们靠一双铁脚板，一夜行走一百四十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三次过乌江，每次都是同志们拆的浮桥；在遵义会议的光辉照耀下，大家在黔北苦战七昼夜，拖住敌人九个团，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重占桐梓、遵义的战略行动渡金沙江时，五军团在江南岸坚守九天九夜，最后是同志们沉的船；再就是十天三过夹金山，胜利地完成了掩护全军安全休整的任务”

这些不都是很生动的故事吗？长征以来，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用自己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创造了多少惊天动地的英雄故事！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带着一、三军团的同志们北上了，又打了许多大胜仗，他们正在继续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我说到这里，想起“鸦片鬼”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接着又说，“现在咱们的处境是很困难，那些背鞋主席、党中央路线的人，想把我们放在这座山上困死、饿死，叫敌人消灭我们。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没啥了不起，我们决不向任何困难低头！”一个同志激动地说。

“我们虽然远离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要保持红军的革命传统，和一切艰难困苦作坚决的斗争！”另一个同志补充道。

“对，我们要战斗下去，要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身边，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第三个同志也接着说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激昂。渐渐地，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外面呼啸的狂风大雪。

三

我们在大炮山上，迎来了一九三五年的十月革命节。那是一月六日上午，我和一营长彭少青同志以及连里的几个干部在山下的营房里开会，忽然有人说：“哎呀！明天是什么日子？明天就是十一月七日了！”

“可不是，是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我计算了一下，笑道。“那咱们怎么庆祝呢？”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开了。

按照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的惯例，每逢十月革命节，总要开个庆祝大会，部队改善一次生活，以激励同志们为中国的革命运动英勇斗争的决心。但现在我们远离党中央，远离毛主席，在这深山野林里，部队的粮食都是糲粬，唯一的菜就是萝卜干，怎么举行庆祝活动，又怎么改善生活呢？有人这样一提，大家倒感到为难了。

正在这时，警卫员李云同志手里捧着一包东西，兴冲冲地跑进来，说：“你们看，这里的冬笋高大！”

大家一看，果然，几只象牙似的冬笋，又粗又长，十分鲜嫩。我问：“从哪儿弄来的？”他说：“那边竹林里有的是，要挖多少有多少。”彭少青营长听了，一拍大腿说：“还愁什么？这冬笋就是过节的上等菜。”大家也那高兴起来，当即决定动员留在营房的人员都去挖冬笋。

同志们扛镐拿锹，兴高彩烈地到竹林里挖冬笋。正挖得起劲的时候，突然

前面传来“砰砰”两声枪响。大家以为有了敌人，都习惯地抓起武器，作战斗的准备。

“不——要——误——会！”前面竹林里传来喊声，“是我们的人打野羊开的枪！”

不一会儿，两个战士一人背着一只野羊，高高兴兴地从河沟那边跑来，走到竹林里，把肩上的猎物往地上一扔。同志们立即围拢来，只见两只野羊又大又肥，每一只足有百十斤重。有的人上去摸摸弄弄，不住嘴地夸奖：“嘿！好家伙，好大的个儿，好肥的膘啊！”

“同志们！这是马克思、列宁送来的慰劳品呀，老人家知道我们斗争艰苦，需要改善生活，庆祝十月革命节，就叫我们吃冬笋嫩羊肉！”彭少青同志这么一说，逗得战士们哄然大笑。

十月革命节的晚上，我们在空场上燃起篝火，举行了个简草而有意义的庆祝会。会上，我作了简短的讲话，主要是讲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以及当年列宁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如何同阶级敌人、党内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十月革命给咱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中国的劳苦大众闹翻身求解放从此就有了希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同志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的前途，要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争取中国革命早日胜利！我讲完后，大家便十个一伙，八个一堆，围着篝火，喝着开水，兴高采烈地漫谈起来。同志们越谈话越多，谈着谈着，逐渐集中到大家平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上来了：

“党中央、毛主席他们现在到达哪里了？该到陕北根据地了吧！”

“一定是早到了。在毛主席的指挥下，一、三军团的老大哥一路上打了许多大胜仗，说不定现在正和陕北军民一起联欢呢！”

“哎！要是咱们党中央、毛主席一起北上，那该多好啊！”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里？我们什么时候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我们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一定多打胜仗，为毛主席争气！”

我听着同志们的议论，抬头仰望天上的北斗，不禁陷入了遐想：毛主席、

周副主席和一、三军团的同志们，此刻，你们在哪里？尽管你们在进行着紧张的战斗，但今天晚上一定也和我们一样在举行庆祝集会吧？你们可知道，在偏僻的康藏高原，在荒凉的雪山脚下，一群远离你们的红军战士，正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日日夜夜地思念着你们啊！

夜，渐渐深了。从雪山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刺人肌骨，但一堆堆篝火，却烧得更红、更旺……

自从五军团电台的密码被张国焘没收以后，我们几乎得不到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一点消息。但是，这样反而更增强了同志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关切和怀念。又过了一段时间，军团政治部给我们发来了四方面军政治部出版的小报《红色战场》，有几期上连续刊载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北上的胜利消息。小报上说，红一、三军团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自从九月中旬由川甘边出发，经过四十天的艰苦转战，沿途俘敌三千以上，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于十月间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了。小报还说，红军在陕北会师后，又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不断壮大，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看到这些胜利消息，我们真是高兴啊！

那些日子，不论干部、战士，几个人凑在一起，谈的都是关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红军在陕北打胜仗的消息。同志们把报纸读了一遍又一遍，好象永远也读不够似的。有的干部说：“张国焘说红军北上，不冻死也会拖死，最后剩几个中央委员逃到苏联去避难，事实又怎样呢？事实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

四

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旬，红五军团奉命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军第五军。不久，我突然接到调离三十七团，到四十五团去工作的命令。

那天，我离开三十七团，告别了长征以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来到丹

巴县城——军团部所在地。张国焘的亲信黄超见我来了，却一反常态，异乎寻常地客气，又是请我坐，又是给我倒水，甚至拍着我的肩膀说：“这次调动，是对你的重用，四十五团是个大团，是个主力团，可以更好地发挥你的作用。”还说了一些其他恭维的话，最后问道，“你有什么意见？”

我淡淡地回答说：“组织上不是已经决定了吗？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好好好！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是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他还要说下去，一个参谋有事把他叫出去了。

自从我进屋，军团长董振堂同志一直没有作声。黄超走后，我便问道：“军团长有什么指示？”

他站起身来，在屋里走了几步，语意深长地说：“你要坚强一些，要经得起考验，要保持五军团的好作风。四方面军的大干部、战士是好的，他们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希望你谦虚、谨慎，和他们搞好团结……”

军团长的话没有说完，见黄超进来，就把话突然收住了。

四十五团驻在卓克基。军团司令部让我带一个班，携带一挺轻机枪和一支自动步枪，到该团去报到。团里的同志们听说新来的政委原是五军团的，都很高兴。第土天，在全团的干部大会上，团长叶从本同志讲了话，对我表示欢迎。他特别强调说：“政委同志原是一方面军的，受毛主席的直接教育多，咱们今后可以请政委把毛主席怎么教育的，原原本本地传给咱们。政委还给我们捎来了机关枪和自动步枪。这可是好东西，咱们要练好本领，多打胜仗啊！”

叶团长朴实而热情的话，使我很受鼓舞。我也站起来表示，一定虚心学习四方面军同志们的优良作风，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我刚讲完，大家就围上来参观武器，有的提议：“这玩艺儿怎么使用，让政委同志教教咱们吧！”于是，我讲解了使用要领，并作了示范表演。叶团长在一旁笑着说：“今天开的是欢迎会，怎么叫政委讲起课来了？以后再教嘛！”可是，不一会儿，他自己也忍耐不住，抓起机枪练习起瞄准来了。

晚上，叶团长向我介绍了部队和驻地的情况。他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附近的藏民受了反动头人土司的欺骗，很多人都逃走了，没有逃走的也不怎么

接近我们。一到夜间，就有不少藏民带着土枪，在四周的山上，拼命叫唤，也不下山来，真是气人啊！现在，部队的困难比较多，特别是缺乏粮食。听到这些情况，我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无论是给养、居民等条件，都是对我们很不利的！”

“可不是！在这里都快把人憋死了他不满地说，接着又兴奋地问我你见过毛主席吗？听说毛主席经常亲自指挥打仗，是真的吗？”

我告诉他：“中央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以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许多胜仗，都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毛主席不仅指挥红军，而且还能想方设法调动敌人，连蒋介石有时也不得不听从毛主席的指挥，乖乖地按照我们的意图来行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现在到了陕北，毛主席又指挥红军打了大胜仗，革命形势发展得可快哩！”

叶团长听得入神，不住嘴地赞叹，并问道：“毛主席对部队的要求，一定也是很严的吧！”

“是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主席亲手为红军制定的。”我越说越兴奋，便小声地给他唱了一段，然后又说，“毛主席还教导我们，红军的纪律不是靠强迫命令，更不是靠打骂体罚，而是大干部、战士的高度自觉性。”

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在一起谈了很多。最后叶团长说，“老谢，我是雇农出身，大老粗，嘴上说不出许多道道，但心里有数，我总觉得毛主席是对的，我们红军要听毛主席的话。你以后就多给干部、战士讲讲毛主席的指示，开导开导大家！”

从此以后，团里不论是开大会，开小会，叶团长总是先让我讲话。有时我们俩到连队去，和战士们在一起闲谈，他也主动倡议，清政委讲段毛主席亲自指挥战斗的故事好不好？”“再讲一段朱总司令挑粮食的故事好不好？”我一讲开，人越围越多，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流露出无限向往的神惜。此时，我也更深切地感受到，红四方面军的大干部和战士，和一方面军的同志们一样，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们是坚决要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张国焘的所作所为，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

我在四十五团工作的时间不长。几个月以后，由于三十七团缺少政委，又把我调回三十七团了。临走那天，叶从本同志拉着我的手，惋惜地说：“你看，咱俩刚熟悉，你又要走了，真是舍不得啊！”我笑着说：“我到你们这儿来，好象住了一期训练班，向你们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后我们要继续互相帮助，并肩战斗！”

我离开四十五团，从卓克基往南走，一路上心想：三十七团的战友们现在仍扼守大炮山，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北上啊！

九 胜利北上

—

咆哮的大金川，象一匹脱缰的烈马，穿过崇山峻岭，日夜奔腾。江的两岸，山高林比，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地方。我们离开丹巴县，沿着江边悬崖上的小路北上，一边是峻峭的高山，一边是陡削的绝壁，底下是滔滔的江水，道路十分艰险难走。

但是，部队的情绪是高涨的。自从部队从草地南下以后，同志们早也盼，晚也盼，就是盼望能够重新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这半年多来，我们经历了多么曲折的道路，付出了多么惨重的牺牲啊！

一九三六年春，张国焘的所谓“创造川康根据地”的南下方针就完全失败了。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受到了薛岳、周浑元、杨森、邓锡候等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的多路围攻，仗越打越大，部队损失严重。南下时有八万余人，此时减员一半，只有四万多人了。部队被迫撤向道孚、甘孜、炉霍一带。当时张国焘仍旧企图向青海的西宁方向逃跑。但是，在事实的教育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这种一味向边陲偏僻地区逃跑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北上和毛主席、党中央会合，才是唯一的出路。正在这时，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历尽艰辛，来到甘孜地区。

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四方面军会合后，进一步增强了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朱总司令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坚持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纷纷要求北上抗日，致使张国焘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于是，二、四方面军各部就陆续北上，向草地进军。我们团也踏上了第三次过草地的艰难征程。

然而，这时最大的困难，还不是山路崎岖，行军困难，而是部队已没有一点

粮食可吃了。从丹巴至绥靖，我们沿途只得以野菜、野果充饥。大家满希望到绥靖能搞到一些粮食，但是很快又失望了。原来绥靖也是个地瘠民贫的苦地方，这里的机关、医院，很久以前就已断粮。虽然城外有很多梨树，但在一个多月前，梨子还只比枣儿大一点，就被医院买去给伤病员吃。听说那些天，伤病员紧皱眉头，吃着又涩又苦的生梨，还连声称赞“好吃好吃”呢！如今他们也是整天吃野菜啊！

当饥饿严重威胁着部队时，敌人又顺着大金川上来了。我们团和三十九团又赶到绥靖南面二十多里的山上迎击敌人。三十九团在河东打邓锡侯的部队；我们团在河西打李抱冰的部队，一时，大金川两岸枪炮声遥相呼应，气氛十分紧张。

战士们没有饭吃，饿着肚子打仗，是够艰难的。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我们都在阵地上，绥靖城里突然派了人来，

说：“同志们辛苦啦，城里给大家送干粮来了。”

这时吴克华同志已经调走，三营长李连祥同志提升为团长。他说：“别来开玩笑啊！你们机关、医院早已没有粮食，伤病员都吃野菜，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团长同志，你不信？看，那不是已经来啦！”那人站起身，指着后山说。

我们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大帮人打着一面红旗，挑着箩筐，正向我们走来。

“真的送干粮来了！”喜讯在阵地上迅速传开。

我们叫通信排长王玉山带着全排的同志们前往接应。不一会儿，王玉山他们把箩筐全抬到阵地上。李连祥同志从箩筐里拿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闻了闻，高兴地说：“太好了。野菜、草籽蒸的窝窝，好香啊！”

我们立即分发下去，一个人两个。大家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一下子有两个窝窝，怎么不喜出望外呢？虽然是野菜、草籽做的，但此时此地吃着，似乎比白面馍馍还要香甜哩！送干粮的同志看战士们得津津有味，便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只管打仗，多消灭敌人。现在后方机关、医院的所有人员，连轻伤

员在内，都动员起来了：挖野菜、采草籽。保证今后同志们有窝窝吃，决不让大家空着肚子打仗！”

他们这样一讲，大家深受感动。李连祥同志站起来大声地说：“我们一定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后方同志们的支援！”

正在这时，前面敌人阵地上的喇叭筒里，无耻地向我们喊起话来：“共军弟兄们！你们不要打了。我们这里有大米饭吃，有洋布衣服穿，又有钱花，你们过来吧！”

听到敌人的喊话，战士们一个个气得火冒三丈，有的举起枪就要射击。“慢点！”团宣传队的同志说着，拿起喊话筒对敌人喊道：“白军士兵们！我们打仗，是为了穷苦人得解放，你们打仗是为了谁呀？你们的父母在家受剥削、受压迫，你们为啥替蒋介石卖命？快起来打死你们当官的，回家去吧！”

“他妈的！别听共产党的宣传！”大概是白军军官在吼叫。

于是，双方又互相猛烈地射击起来。战士们一边打枪，一边愤怒地呼喊：“消灭这伙强盗！”“消灭敌人，用胜利来感谢后方同志们的支援！”

我们和敌人对峙了六七天。这些“吃大米、穿洋布”的，虽然人多，武器好，但一次次进攻都被我们这些吃野菜、草籽窝窝的人打退了。最后一天上午，敌人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发动了一次集团冲锋。我们不但粉碎了他们的进攻：而且趁机来了个反冲击，一下子追出去十多里，把敌人打个落花流水。

打退了敌人，我们团和三十九团就从绥靖出发，经过马尔康，向草地方向前进。一路上，我们看到路旁的树木上，民房的墙壁上，还留有去年中央红军贴的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这一条条标语，有的虽已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但是，它却象一支支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催促着我们加快步伐，踏着毛主席的足迹前进！

一天，部队到了黑水附近，停在大路上休息。大路旁边，有一片碧绿的草滩，突兀着一块大岩石，衬托着蔚蓝的天空，十分壮观。我和李连祥两人还没有走到跟前，就远远地看见石上写着“北上抗日”四个大字。这字，写得苍劲有力，象雕刻在岩石上一般。我们两人久久地看着看着，不约而同地扑上前去，

摸抚着这块巨石，眼泪刷地淌了下来。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啊！去年这时，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这里北上，我们却在张国焘的逼迫下，掉头南下了。一年来，部队经历多少曲折艰难，受到多么大的挫折！今天，我们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踏着毛主席走过的道路，重新北上。看到这令人醒目的四个大字，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决心克服前面的千难万险，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为中国革命事业继续战斗！

为了对部队进行教育，我们通知各营，把干部、战士集合在巨石面，进行现场动员。我说：“这石上‘北上抗日’四个大字，是去年中央红军路过这里时写的。他们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早已长征到陕北，打了许多胜仗，打出了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与此相反，南下没有出路，南下是绝路，一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又重新北上，走上了去年毛主席、党中央走过的道路。顺着这条道路走，我们就一定能走到毛主席身边，走上抗日前线，走向胜利！”

李连祥同志接着大声地说：“同志们！我们要沿着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

在激昂的口号声中，队伍继续前进了。

过了黑水、芦花，在去毛儿盖的路上，我们又遇到一件非常意外的事。那天晌午，部队正停在一条河边休息，突然，从旁边树林里蹿出一个头发很长、藏民打扮的人，上前来，一把抱住我们的一个战士。同志们大吃一惊，他却哈哈大笑，接着从怀里掏出一顶红军帽子，大声地说：“同志们！我可盼到你们了，我也是红军啊！”说着，呜呜地哭开了。

大家更加惊奇，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一问，他才详细地谈了自己的经历。原来，他是红一军团的一个司号员，去年部队长征路过这里时，因照顾同班生病的战友，两人掉了队，在路上不幸被土司的反动武装抓去，当了土司家的奴隶。在那挨打挨骂的日子里，他俩日日夜夜惦记着部队，思念着毛主席，暗中商量如何逃跑。有一次，他俩逃了出来，可是当天下午就被土司的骑兵抓了回去。抓回去就是一顿毒打，那个战士有病，当场就被活活打死了。留下他一个

物。他听了心中暗毒，趁黑夜逃跑出来，一直藏在树林子里，寻找自己的部队。他说：“离开部队这一年，我就象没有爹娘的孩子，泪水只能往肚里流啊！当我一眼看见自己的队伍，看见同志们帽子上的红星，我又想哭又想笑，别说心里多激动啦！”

他的遭遇，同志们听了十分同情。大家对反动土司更加憎恨。李连祥同志安慰他说：“你总算逃出了狼窝虎口！”

又回到咱们革命队伍里来了。我们要记住这笔血泪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消灭一切压迫、剥削人民的坏蛋！”

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最大的困难，仍旧是缺乏粮食。我们经过的地方，反动头人土司丧胁着大部分群众，远远地逃走了。有些藏民发现我们是红军，便主动接近我们，告诉我们去年红军经过这里的一些情况。但他们都是穷苦人，没有粮食接济我们。

一次，我们住在一个藏族老阿爸家里。那个老阿爸开始很害怕，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后来他又仔细看了看我们，象突然发现什么似的，指着我们帽子上的红星，十分惊喜地说你们是红军？”

“是啊，老阿爸，我们就是红军。”我和蔼地回答说。他立刻握住我的手，喃喃说道：“啊！红军是最好的汉地捧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见上面有一行端端正正的铅笔字：“红军和藏民是一家人。”

老阿爸接着就告诉我，去年，红军也曾住过这里。当时，村上的许多人听说来了很多汉人的军队，都吓得逃走了；老阿爸因为有病，躺在床上没有走。可是，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当兵的汉人进村以后，既不抢东西，也不乱打枪，一个个都和蔼可亲，还帮助乡亲们打扫院子，背柴背水，细心照料没有带走的牛羊。有一次，有个当兵的医生来到老阿爸家里，那医生只十七八岁，背着一皮包，亲切地向老阿爸问寒问暖。老阿爸望着那医生帽子上的五角红星，愣了愣，说：“你们是……”“我们是红军！”医生说着，发现老阿爸有病，马上就给他诊断，服药，还帮助他烧水做饭，体贴入微地照顾他。老阿爸的病很快就好了。他想去把村里的人找回来，但红军却要离开这里。临出发时，老阿爸要红军医生

留下自己的名字。那医生想了想，就从口袋里摸出铅笔，在这张纸条上写了一行字，笑吟吟地对老阿爸说：“鱼和水最亲，红军和藏民是一家人啊！”

听完老阿爸的叙述，我很受感动，又仔细地看了看红军医生写给老阿爸的那张字条，对老阿爸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打仗的，藏族和汉族的穷苦人是一家人。”老阿爸听了很高兴，见我们没有粮食，只是以野菜充饥，一定要弄些东西给我们吃。但是，他家里四壁空空，自己也是饿得面黄肌瘦，我们怎么忍心吃他家的东西呢？所以，还是婉言谢绝了。

部队进入草地之前，由于长时间以野菜代粮，战士们的体力越来越差。我们开会研究，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筹集一些粮食，让大家吃几顿饱饭，以便通过茫茫的水草地。但是，团供给处的同志出去筹粮，每次都是空着手去，空着手回。怎么办呢？我们只得打地里庄稼的主意了。那时青稞正在灌浆，粒子还不很饱满，但它总是真正的粮食啊！请示上级同意后，供给处就派人和藏民商量，出钱买他们长在地里的青稞，然后叫部队去收割。同志们听说有青稞麦吃，非常高兴，都跑到指定的田里去摘麦穗，拿回来放在火上烤，烤熟了，就用手把麦粒搓下来，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塞。虽然麦粒没有磨碎，有的烤糊了，有的还是生的，但是，大家吃得特别香。

二

部队离开毛儿盖不久，就来到草地边沿了。我们极目望去，只见草连着天，天连着草，雾气沉沉，灰蒙蒙一片。我久久地凝望着，不禁想起去年，我们从阿坝第一次进入草地后，军团保卫局科员刘保山同志怀着未能跟随毛主席北上抗日的遗恨，在草地里倒下了。那时同志们是一个心思北上啊！可是到了噶曲河，却来了个草地折回，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当我们返回何坝，越走离毛主席、党中央越远的时候，两条腿象灌了铅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心里是多么难受！今天，我们要第三次过草地了，虽然饥饿严重地威胁着大家，但我们是找毛主席

席去，找党中央去，心里格外高兴，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拦不住我们前进的脚步啊！

我们团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草地了。去年中央红军经过时踩出的路，还依稀可辨。我们就顺着这条路前进。一路上，部队的情绪很高，红旗呼啦啦飘，歌声此起彼伏。团宣传队的同志们鼓动着大家，不时地喊道：“毛主席、党中央在盼望咱们呢，快点走呀！我们只要不怕饥饿，不怕疲劳，互相帮助，去战胜困难，就一定会胜利地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

当时，团政治处为了鼓励大家和大自然作斗争，安全、胜利地通过草地，还出了手抄的“行军小报”，给各营一份。内容主要是表扬一些行军情绪高，团结互助好，歌唱得多的同志和掉队少的草位。形式多样，有快板、短文、歌曲等草地行军中，小报从前头往后传，传到哪个班，哪个班就选派一个有文化的同志念给户家听。大家听到班里同志大着嗓门念完快板，又唱起山歌，十分高兴，有时一遍不行，还要来两遍三遍。随着小报从前往后，笑声和掌声也跟着从前头传到后尾。最后，那张报纸被揉得字迹都无法辨认了。

晚上宿营时，同志们到处找野菜，但野菜却很少。大概是由于去年红军打这里过，把野菜都挖光了。眼看又要断炊，我和李连祥团长便到军团部，向军团首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董振堂同志沉思很久，然后说：“今后宿营要尽量避开去年部队的宿营点，这样野菜可能好采些；同时还要注意发现一些新的可吃的野菜。”接着他又说，“最近我尝了两种野菜，是过去没有吃过的，味道很好。可见能吃的野菜一定还有，要发动群众多想些办法。”

我们正要起身告辞，警卫员给军团首长端来一小盆野菜糊糊汤，接着又拿来四个热气腾腾的野菜、青稞窝窝。我们知道，这是四位军团首长的晚饭，已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我们起身要往外走，军团长却把我们叫住：“不能走，一起吃了饭再走！”

“不啦！我们回去再吃。”

“你们回去吃什么？”董振堂同志几乎是生气了。副军团长罗南辉同志也上来拉住我们，强迫我们坐下，叫警卫员再拿碗筷来。

碗筷拿来了，董振堂同志亲自把野菜糊糊匀成六碗，把四个窝窝掰成份，然后笑着招呼大家说：“吃吧！东西不多，垫垫肚子，舍吃饱只有等走出草地了。”

我拿起筷子，看看军团首长和蔼的面容，听着他们亲切的话语，深深感到这碗里的野菜汤，手里的窝窝头，凝结着深厚的阶级情谊和同志间的友爱！

进草地后，越往前走，气候越恶劣，道路越泥泞，困难也越多。同志们感到饥饿难忍，身体虚弱也一天比一天突出。这时，队伍里开始出现掉队的同志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草地中行军掉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孤草草地落在这漫无边际的大草原里，很快就会迷失方向，不冻死也会饿死，想独自走半草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通知各连，一定要加强同志间的团结互助，做到不拉下一个阶级兄弟！

那天下午，我和警卫员李云同志牵了牲口，带着一个病号，走在队伍的后头。正走着，遇到一个班长和一个战士坐在路旁，而部队已经渐渐向前走远了。

“你们怎么啦？”我上前问道。

“政委，他走不动了。我们歇一会儿。”班长说着，又回头问那个战士，“好一些吗？咱们慢慢走吧！”

那个战士看看我们，摇摇头说：“我实在没有一点力气了。不要管我，你们先走吧！”

我走到他跟前，鼓励道：同志，别泄气么！平时我们说要北上找毛主席，找党中央，不怕一切困难，怎么眼前的困难就克服不了？要坚持，咬着牙坚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站起来，让你们班长扶着，慢慢也朝前走！”

他看着我们期待的目光，感动地点点头，鼓起勇气站起来，可是刚站直身子，只觉得一阵头昏目眩，又沉重地坐下了。他哭着说：“我的心是坚决的，可是我的身体……”我们都很着急，连马背上的病号也挣扎着要下来，把牲口让他骑。警卫员李云同志说：“他这是饿的，我这儿还，有两个野菜窝窝。”说着，从挎包里拿了出来，送到他的面前，叫他赶快吃下去。开始，那个战士不肯接，说：“我吃了也没有用，还是留着吧！”可是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接了过去，几口就吞下了。过了不一会，他就象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觉得头也不

昏，眼也不花，身上也有劲了。终于，他自己站起身来，催促班长说：“现在好了，咱们赶队伍去吧！”

我在后面走着，看着那个战士的背影，陷入了沉思：饥饿，饥饿，饥饿对我们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应该怎么和它作斗争呢？不然，许多同志是无法走出草地的呀！

草地的天气，真是变幻莫测。那天，我们早上出发时还晴空万里，走了不到二十里路，乌云布满了天空，风飏飏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

草地在晴天都是灰蒙蒙的，此时，更是白茫茫的一片。

地是湿淋淋的，草是湿淋淋的，我们身上的衣服也都是湿淋淋的。冷风吹来，浑身打颤。饥寒交迫之苦，真是无以复加了。

队伍顶风冒雨，在泥浆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进着。许多同志互相搀扶着走路。这时前面有人提醒，把火柴和盐巴藏好，别叫雨水淋湿了。我想起李云同志身上也有一小块盐巴，便赶忙问道：“小李，你把盐巴放好了吗？”

他说：“放好了，放在装文件的皮包里，淋不着。”

原来好多天了，我们没有盐吃。喝水，水是淡的；吃野菜，野菜是淡的。嘴里无味，身上无力，很是难受。大家想吃点盐，甚至比想吃粮食还想得厉害。行军中，经常可以听到有人说：“要是有几颗盐粒含在嘴里，那该有多美啊！”当时在草地里，对红军战士来说，吃几颗盐粒也成了一种奢望。

小李身上的那块盐巴，还是在绥靖时买的，一直舍不得吃，现在简直成了宝贝。有时宿营以后，我们煮熟一锅野菜，有人提议：“今天改善一下，放点盐吧！”小李才从挎包里掏出个小纸包，取出盐块，在锅内转上两三圈，然后赶快收藏起来。野菜汤里能尝到一点咸味，大家就觉格外味美可口，算是打了一次“牙祭”。

中午，雨仍然下个不停。部队在草地里休息。由于没有干柴，生不了火，喝不上开水，同志们只是背靠背地坐着，听任雨水顺着帽沿、脸颊往下流。

我和李连祥同志坐下不大一会，三营营长谭庆云同志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又有一个战士昏倒过去，抢救也不见效，看来不行了。”我们听了一怔，忙站

起身，叫他领我们去看。在一片小高地上，围着的一群人中间，一个战士脸色灰白，直直地躺着，手里仍紧紧地握着一杆枪，张着嘴，好象是向我们要吃的东西，又好象是有话要对我们说，但是，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

疾病、饥饿、寒冷，又夺去了一个战友的生命；残酷的草地，又吞噬了我们的一个阶级兄弟！我们脱下军帽，悲痛地低下了头，泪水和雨水一起流着……我心里说：如果不是张国焘率队南下逃跑，我们也不会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呀！

在下午的行军途中，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牺牲的战士的形象，深深感到当前饥饿的严重性。我知道，进入草地以来，大家几乎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掉了。本来，不少同志头上有一顶遮阳挡雨的皮斗笠，脚上有一块包脚板的牛皮。现在，皮斗笠和包脚的牛皮，连同腰上的皮带，都已煮着吃掉了。昨天晚上，警卫员李云同志把我们几个团领导的皮腰带都收去了。他先是在火上烤，烤得嗤嗤冒油，发出一股恶心的油漆味，然后就放在水里煮，煮烂以后，切成小块，分给每个人。

我暗暗思忖着：进入草地以来，我们团已倒下了十多个同志，现在我们正在草地深处，出草地还得几天路程，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病号会不断增加，还会有一些同志无法走出草地。这时，走在我旁边的李连祥同志突然对我说：“老谢，咱们宰掉几头牦牛吧！”

原来，一直默默地走路的团长，心里也在琢磨着这个问题。我抬头看看前面一头驮帐篷的牦牛，那牲口瘦得皮包骨头，有气无力地一步一步朝前走。我想：也只有这一个办法了，但又犹豫地说：“把牲口杀掉，帐篷怎么办？”

他却胸有成竹：“不要多杀，一个营杀一头，丢掉几顶帐篷影响不大，当前是解决吃的问题要紧啊！”

我想不出别的法子，只得点头同意，并说：“杀了牦牛以后，对一些病号、身体特别虚弱的同志要适当照顾，让他们多吃点。”

李连祥同志十分赞成，接着又把我们的意见和参谋长、政治处主任说了一下，便通知下去了。

傍晚，部队在一块高地上宿营。雨已不下，天渐渐放晴，草地上到处有哗

哗的流水声。在一条小河边，我们组织人员宰了四头牦牛，把牛肉、牛皮和牛血都分到各个连队。战士们听说有牛肉吃，喜出望外，不顾疲劳，捡回很多柴禾，挖了不少野菜。天色渐渐暗下来，大家把柴火烧得旺旺的，一边煮分到的牛肉，一边烘烤淋湿的衣服。一时间，到处散发出喷香的牛肉味。这香味，对我们说，是多么诱人啊！

夜深了，我和团长到各连去看时，战士们不仅吃光了牛肉，而且把骨头也啃得干干净净，连汤也喝得一点不剩了。饥饿暂时得到了缓和，同志们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篝火，讲故事、说笑话，情绪十分活跃。

三

草地行军的第六天，我们忽然接到军团部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今晚宿营，可能同二方面军的兄弟部队会合，你们应做好准备，热情地欢迎英勇善战的红二方面军！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在部队里传开了。战士们抑制不住兴奋、喜悦的心情，一边走路，一边七嘴八舌地谈论着这个喜讯。

“同志们！快走啊，到前面去迎接二方面军老大哥，走慢了让人家来迎接我们，就不好啦！”

“我们能不能见到贺龙总指挥？”

“就是见到了，我们也认不出来呀！”

“贺龙同志好认得很！听人说，他有一撮小胡子，可威风哩！据说他是一把菜刀闹起革命的……”

听着战士们的议论，我心里想：最近几个月来，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引下，二方面军横扫湘、鄂、川、黔、滇、康数省，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终于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甘孜会合时，我们在丹巴，没有见到二方面军的同志，但也隐隐约约听说上面斗争很激烈，二方面军的领

导不怕欺，不怕压，坚决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对张国焘派去的人说：“不要告诉我，们别的，只要告诉我们怎么过草地，怎么北上！”正是在二方面军的有力促进、推动和四方面军！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才迅速实现了这次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今天，在北上途中，在宽阔的草地上，我们要和亲人相会了，应该怎样向劳苦功高的二方面军老大哥表示我们的敬佩和感激之情呢？

那天，部队只走了五十多里，太阳还很高，就在一个山包下宿营了。宿营时，为了使部队军容整齐，我们把全团各式各样的帐篷进行了调整：有的连全是白布帐篷，有的连全是帆布帐篷，还有的连一式是牛毛毡帐篷。团司令部把宿营地区也作了划分，连组成一个小方块，营组成一个大方块，全团就象一座四四方方的军营。连与连、营与营之间，战士们铲去杂草，修了纵横交错的人行道，有的在路两边还挖了流水沟。

团长李连祥、参谋长孟焕章和我三人，登上小山包，向宿营地一望，只见绿油油的草滩上出现了一座整齐的军营，西斜的阳光照射着每一顶帐篷，白的雪白，黄的筵黄，黑的墨黑，色彩分明，十分好看。

“这才象个欢迎兄弟部队的样子！”李连祥同志满窑地说。

我笑着说：“营区这样整齐、威风，谁能看得出这是一支严重饥饿的队伍呢！”

战士们搭好帐篷后，除留少数人在家烧水外，都很远的地方挖野菜、采草好去了。可是，大家从四面八方回到宿营地时，除了带回大批野菜外，许多同志手里还拿着一束束色泽鲜艳的野花，有的笑嘻嘻地说：“这草地上的鲜花，是献给二方面军老大哥最有意义的礼物！”

是啊，草地，不仅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草滩，也是色彩斑斓的大花坪，几乎各种颜色的花都有，万紫千红，开得蓬蓬勃勃。如今，将草地上的鲜花献给英雄的兄弟部队，是再好不过的了。

太阳落山了。苍茫的暮色降临草地。营区里，到处燃着篝火，升腾着青烟，战士们都忙着煮野菜、炒草籽。草籽炒熟了，香味随着晚风飘得很远、很远。

有的战士开玩笑说：“等会见了二方面军老大哥，就说：你们辛苦了，没啥招待的，只有红烧革命菜，焦炒野芝麻，大家请吃吧！”说得许多同志都笑了。

我们几次翘首眺望，都没有看见兄弟部队的影子。有些性急的同志提议派人出去联络，但在这茫茫的草地上，前没有村，后没有店，到哪儿去寻找他们呢？过了一会，我们接到军团部的通知，说今天不能会合了。原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出发，要走十几天草地。此时，他们和我们还差一天的路程哩！

天色越来越暗，星星在远空眨着眼睛，寒风呼呼地吹着。篝火烧得更旺了，火苗不停地跳动，每堆篝火四周都围满了人。大家的心也都象跳动着的篝火，热烈、兴奋而欢乐。今天，虽然没有能够同二方面军兄弟部队会合，但我们正并肩北上，相距已经很近，见面的日子不会远了。

第七天下午，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

我们走到草地的边沿，发现天空有鸟雀飞鸣，地上有牛羊吃草，远处有村庄人烟，生气盎然。看到这一切，我们那种高悦的心情，就象长久漂泊在海洋上的船员，一下发现了陆地似的，都要跳出来了！同志们三人一群，四人一伙，紧紧地抱在一起，跳跃着，欢呼着：“我们终于战胜了草地，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要回到毛主席、党中央的身边了，在欢乐的人群中，那个在草地掉队的战士，拉着他的班长的手，激动得几乎哭出声来：“我们真出草地啦？”

那班长凝视着远方，深情地说，是啊，草地被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来啦！”

各连都把自己的战旗打开，在灿烂的阳光，迎着从北方吹来的和风，徐徐飘动。红旗漫卷，军号嘹亮，大家迈着矫健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踏上新的征途。

四

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出腊子口，到了悬窝，先头部队准备了大批的炒面、

土豆，我们这才吃上两个月来的第一顿饱饭。到这时，我们终于摆脱了饥饿的严重威胁。

一天，我们团作为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在西安兰州公路上的骑营子执行面任务。下午，电话里传来了军团长董振堂同志激动的声音：“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咱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已经在会宁县城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定要打好仗，多消灭敌人，用实际行动来庆祝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同时，他又通知我们：“敌人毛炳文整编师九个团已经紧紧跟了上来，明天早上可能进到你部驻地，你们团的任务是在马家营子至华家岭之间，用运动防御的方法，坚决阻击敌人，以掩护主力部队的会合和休整。”

马家营子到华家岭有二三十公里，公路两边都是光秃秃的荒山，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在这里阻击数量比我们多九倍的敌人，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大会师的胜利消息鼓舞着每个同志，在“打好会师后第一仗”的响亮口号下，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连夜构筑野战工事，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翌日清晨，我们团二营的部队埋伏在马家营子两侧的山上，盯着南面的公路。不一会儿，公路尽头尘土飞扬，敌人的先头部队来了。他们自恃人多，气焰十分嚣张，成四路纵队沿公路开进，似乎没怎么戒备。我们等敌人进到马家营子以后，两侧山上突然开火，枪弹象旋风似地扫去。敌人当即躺倒一片，其他的赶忙散开伏在街道两边，盲目地射击。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响彻长空，随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战士们潮水般地冲下山，扑向敌人。敌人乱了阵脚，慌慌忙忙顺公路向南逃去，来不及逃跑的都举手缴枪，乖乖地当了俘虏。不到二十分钟，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干净利落地结束了。

二营押着三十多个俘虏，撤到北面公路右侧的山上隐蔽起来。一营和三营成了第一梯队，在马家营子以北公路两侧的阵地上，等候敌人。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等了好久，还不见敌人的影子。

公路上空空荡荡，四周一片沉寂。

忽然，远方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一架、两架、三架……五架敌机贴着公路从南面飞来，一到马家营子上空就疯狂地扫射、投弹。接着，空中又响起了

尖细刺耳的炮弹啸音，地面一阵巨响，镇子附近腾起了团团浓烟。霎时，马家营子被淹没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敌人的飞机、大炮轰击一阵以后，步兵沿着公路上来，很快组成战斗队形发起了攻击。他们冲进锁子，没有遇到抵抗，便气势汹汹地继续北进，来到我们团一、三营的阵地前面。敌人越来越近了。一、三营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突然一齐开火，打得敌人象蛆虫似地乱作一团，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纷纷卧倒，胡乱地射击。接着我们又是一阵狠揍，敌人再也招架不住，爬起来掉头就逃，退回马家营子去了。

愚笨的敌人碰了两个钉子后，才弄清我们阵地的位置。

这回，它们的飞机、大炮，象发了疯似的对我们狂轰滥炸起来。在没有一点遮挡的光山上，这对我们的威胁很大。特别是敌人飞机，欺负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战士们急了，就站起身子，用机枪、步枪对敌机开火。我站在团指挥所，见一架敌机朝着我们俯冲过来，扔下两颗炸弹。我刚喊了声“卧倒”，炸弹就在指挥所一前一后发出了锐耳欲聋的巨响，冲天的砂石尘土掉下来，几乎把我们埋住。我从土里爬起来，见团长李连祥同志满身满脸都是泥，便问道怎么

样，伤着没有？”

他一边抹脸上的灰土，一边怒视远去的敌机，骂道：“他妈的，掘土翻地倒挺有能耐！”

“糟糕！通三营的电话线炸断了。”团参谋长报告说。

“通信排，赶快查线李连祥同志的话音刚落，一个电话员就跳出工事，跑下山接线去了。”

团参谋长是个刚从四方面军调来的同志，瘦高个子，长长的脸，二十三四岁，平时说话不多，打仗却很勇敢。此刻，他主动提出：让他到公路那边的三营阵地去，如果联络中断，他就指挥三营作战。我们同意了。他到三营以后，正赶上敌人发起新的攻击。没多久，他打来电话说：“敌人被我们压制住了，我们准备出击一下。”

“好！”团长回答说。

不一会，三营的阵地传来了冲杀的声音，从望远镜里看去，见战士们跳出战壕，追着敌人射击。山坡上火光闪闪，硝烟滚滚，敌人支持不住，垮了下去。

但是，在这次反冲击中，团参谋长却中弹牺牲了。他为长征的最后胜利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几乎在这同时，从后面军团指挥部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副军团长罗南辉同志在指挥作战时，敌机扔下一颗炸弹，他躲避不及，光荣牺牲！

不幸的消息象一团团烈火，烧灼着干部、战士的心。大家十分悲痛，对敌人也更加仇恨。在战斗中，同志们愤怒地高呼道：“狠狠打，为牺牲的烈士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

一颗颗子弹，凝聚着同志们满腔的仇恨，雨点般地射向了敌人。

敌人的多次攻击，都没有能够得逞。中午，敌人调整了部署，集中大量兵力向公路右侧的一营阵地进行轮番的集团冲锋。一营的同志们打得十分顽强，每次都等敌人前进到离前沿只几十公尺的地方，才猛烈地开火。后来，敌人又投入了更多的兵力，由当官的在后面督战，整营整连地向他们冲击。这时，李连祥同志几次在电话里问：

“要不要让二营上来！”

“我们能顶住！”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坚定地回答。

突然，一股敌人迂回过来，从侧后方向他们进行攻击，一营面临着三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在这危急时刻，李连祥同志抓起电话对着话筒果断地下达命令：“二营出击！消灭一营侧后的敌人！”二营的同志们一听到出击的命令，便旋风般地冲杀过去，很快把侧面的敌人打退了。与此同时，一营也肯次击退了从正面进攻的敌人……

就这样，在马家营子到华家岭的公路两侧，我们顽强地抗击敌人，激战了整整一天，给敌人以重大杀伤，胜利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阻击任务。

入夜，三十九团接防以后，我们离开阵地，经过华家岭，顺公路向会宁方向前进。

月色朦胧，秋风阵阵，黄土高原的深秋之夜特别凉爽。走了二十多里，见

前边路旁停着一支部队。很快传来了军团长董振堂同志的声音：“是三十七团吗？”

“是！是三十七团。”李连祥同志和我快步上前，向军长作了报告。

“部队都撤下来了吗？”军团长关切地问道。

“都撤下来了。”李连祥同志回答说。

“伤亡大不大？”

“伤亡不大，可是，我们的参谋长牺牲了！”李连祥同志说。

我们虽已在电话里向军团长报告过，但他听下仍很难过，沉默了一阵，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不过，他的血没有白流，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咱们三十七团，从长征开始就一直担任后卫，打到长征结束，保持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军团长的表扬，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我说：“据那些俘虏说，敌人原来以为我们这些才从草地出来的红军，早已精疲力竭，象一只刚过冬的牛羊，是不堪一击的……”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红军出了草地仍然是猛虎啊！”军团长笑着接过话题，大声地说，“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怎么知道，红军重新北上，踏上了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象猛虎添翼了呢！事实说明，敌人才是红军虎口下的羊群呢！”

军团长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是啊，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在我们通过草地的艰苦日子里，在红二、四方面军走出草地后同张国焘新的分裂阴谋作斗争中，都不断地给予了重要的指示和深切的关怀。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四方面军胜利到达包座时，中央就来电祝贺，并指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州西）固线，北出发生困难。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朱总司令和任弼时等同志当天就联名复电，说明等兵力稍集结后就继续前进，大约在八月中旬，主力就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毛主席、党中央接到这一复电后，很快又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

全根据地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些亲切指示，对指引我们沿着正确的道路北上，对提高！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啊！毛主席、党中央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还及时派出一方面军一部，在聂荣臻、左权等同志的率领下，向西挺进至西兰公路以北地区，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攻占了会宁县城。十月十日，一、二、四方面军这三大主力红军经过了历时两年的万里长征，终于在会宁胜利大会师了！……想起这些，联想到我们后卫部队今天取得的胜利，这都是由于毛主席的方针、路线的正确指引才取得的啊！

第二天傍晚，我们进入了会宁城。会宁，到处还洋溢着大会师的胜利气氛，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贴着“庆祝二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大会师胜利万岁”的标语。我和李连祥同志特意走到市中心的一座二层楼前，参观了一番。据说三个方面军就是在这里会合的。现在这座楼房人们称它为“红军楼”。我们两个在街道上走着，心头充满着胜利的喜悦，耳畔似乎还萦回着会师时的胜利欢呼呢！

部队在会宁住下以后，接到一份军团政治部的通知。通知说：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这里会合后，主力已经北上，你部明天行军，可能会遇到友军的后卫部队，到那时应该主动让路，热情迎送，要有礼貌，讲究军容……我们把通知向部队作了传达，同志们更是欢欣鼓舞，有的忙着打草鞋，补衣服，有的赶紧理发，洗脸。大家说：“我们要和兄弟部队并肩前进，去见毛主席，去见党中央！”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太阳从东方升起，会宁的城楼披上了金色的光。我们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浩浩荡荡地走出了会宁城。

出城不多远，我们就遇到一支兄弟部队。他们打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从另一条大路上走过来，战士们全都穿上了新的灰布军衣，整齐而威武。我们站在路边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二方面军。”顿时，战士们热烈欢呼起来。二方面军老大哥，我们终于在这里见面了！记得在艰难的草地行军途中，我们就盼望和你们会合，这个愿望今天实现了。如果不是行军赶

路，我们真想和你们坐在一起，谈上几天几夜，谈个痛快啊！二方面军的战友们一边前进，一边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振臂高呼：“向二方面军战友们学习！向二方面军战友们致敬！”他们也喊着向五军团学习、致敬的口号，大步向前走去。

走了十多里，又遇到一支兄弟部队，有一千多人，装备特别好，每个连有五六挺机枪；战士们身上的子弹带都撑得鼓鼓的。原来他们是一方面军的，也是高举着红旗，昂首阔步地前进。

“是江西老表吧？”有的战士笑着问道。

“是啊！你们是哪个部队？”对方笑着说。

“我们是五军团的。”

“好啊！老表，你们五军团辛苦啦！”

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战士们互相问候，热烈鼓掌，有的同志情不自禁地拥上前去，紧紧地握手拥抱，流出了喜悦的泪水……是啊！过去咱们在一起行军、作战，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自从草地分开后，一年过去了，这一年时间，我们在荒凉的雪山上，在泥泞的草地里，朝思暮想，有时做梦也梦见你们啊！现在，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怎不叫人高兴呢。

多么幸运啊！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我们接连遇到两支兄弟部队。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并肩前进，共同战斗的生动景象，如此鲜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兴奋、激动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

我们跟随着兄弟部队的坚强铁流，作为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合的光荣后卫，迈着矫健的步伐，继续前进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号召，召唤着我们向新的胜利进军。没过多久，我们就见到了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的贺电。中央向全体红军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并且指出：

我们这一抗日前进阵地之会合，证明强盗的侵略是快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人的信心了。……

我们即刻就要进入新阶段了，也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争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联合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中央的贺电，眼前似乎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前景：旭日东升，霞光万道，红军亲比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正跃马横刀，奋勇争先，杀上了烽火连天的战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经历了极其不平凡的光荣的战斗道路。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光辉灿烂的一页。每当我想起这段战斗生活，想起红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革命先烈的英勇牺牲，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它写出来，以纪念牺牲的烈士，激励我们活着的人“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历史。长征的胜利生动地表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党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无往而不胜；反之，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从长征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丰功伟绩，反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但是由于自己水平不高，经历的事情有限，写得不仅很不够，甚至会有错误，希望同志们予以批评指正。

英明的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我们党同王洪文、张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的生死搏斗中，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

夺权的阴谋，实现了毛主席要解决“四人帮”问题的遗愿，取得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长期以来，“四人帮”这伙新老反革命分子结成的黑帮，极端仇视革命，疯狂反对我们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恶毒攻击纪念长征是什么“为老家伙评功摆好”。我们必须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肃清其一切流毒，在胡耀邦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抓纲治国，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这本书是根据我在红军一方面军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的生活片断写的长征故事。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一些在五军团工作过的老首长、老战友，在百忙中帮我审阅书稿，提了不少宝贵意见；李翔同志等帮助我查找资料，加工整理，作了很大的努力，在这表示深切的感谢！

作者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